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

金冲及

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刻之一。它的形成过程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新中国的诞生简单地看成只是把一块块解放区政权连成一片。事实上，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并经过通盘筹划，把新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原则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留下充裕的时间给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去作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夜那些日子里，整个局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进，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作出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

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紧迫的状况下有条不紊地把一切处理好，在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准备，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这样不寻常的时刻，对毛泽东说来，似乎倒使他那过人的才智发挥得比平时更加充分，更加得心应手，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个人间奇迹。

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前景，难以在近期实现。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准确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

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他从这个变化中，又从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广大中间群众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极端重要的结论。两天后，由他改定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

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开宗明义作出的断语。他在会议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作出这个断语的根据：“二十年来未

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从这个判断出发，这次会议的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毛泽东在会议结论里说：“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历史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并不是谁都能很快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实质的。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这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从这时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对新中国的构想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20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立刻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0多年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

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

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话，把这项新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到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想得更深更远。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在未来，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历来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回答说：“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是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来的。他先分析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几个部分，接着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这时插了一些话，意思是：在现阶段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有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这就把问题说得更完整了。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显然，毛泽东谈这个问题，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来着眼的，是从中国国内社会关系这个层面来分析矛盾的。这是他在几年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当时，他把这个过渡时期的时间估计得比较长，还要一二十年，后来却把这个看法改变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这个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进行过讨论。但为了慎重，会议没有立刻对它作出结论。毛泽东在总结时说：“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张闻天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他们这个报告中说：“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

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后加以肯定。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成分所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

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是领导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利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富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是一项重

大决策，也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富裕强盛国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已大体上得到解决。1949年1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显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经建方针，九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九月讨论的相符。”

这些基本方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而在建国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充分协商并丰富补充后，用《共同纲领》这种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终于形成一幅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完整的蓝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审慎探讨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仓促提出的。

三、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思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是指国家体制，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是“统一战线”，但当时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很复杂，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写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三三制”的政权。因为这些根据地几乎都在农村，“三三制”所包括的除工农外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就是一些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地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关系重新破裂。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曾考虑重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他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但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他们政治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充分注意到的，主张应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工作。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对人民民主专政作出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并确定下来的，是毛泽东。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报告是在党内讲的。同年年底，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便向全国人

民公开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就用明确而概括的语言把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创出来的东西。它极有利于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而把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并且正确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那样地广泛，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它的巩固和稳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完整了。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指导原则，在以后不曾有过改变。

但如何在中国国土上建立起这种政权构成形式，在实践中仍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就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块根据地到大片解放区，由局部政权到全国政权，并适应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这不仅要考虑专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定，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体现了新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会来行使这种权力；又保证国家机关能迅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工作，不致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这里要特别提到，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试验失败的教训，在九月会议上肯定地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就必须当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它在新中国诞生一年前就决定下来了。但在这以后，仍有极少数对中国实际国情懵然无知而只醉心于照搬某些外国模式的人，反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此时此刻，重温一下40多年前毛泽东说过的这段话，确实使人感到更有兴味。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0多个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经过长时间发展所形成的重要特点。在建党初期到30年代中期，由于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实行民族自决、由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但随着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的加深，这个看法逐渐改变。1938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5月，由毛泽东主要起草并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写道：“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新中国诞生前夜，周恩来向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特别提到：“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他详细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后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在政协所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四、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基本格局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决不是依靠小生产所能建设起来的，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生产。旧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内。新中国的根本任务既然将由革命转入建设，自然就要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条迂回的道路：它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党的工作重心只能转入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乡村中去，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又只能是暂时的。

毛泽东看得很远。他认定新中国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并且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又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根据当时准备对日本大举反攻的形势，他又多次说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转折点的到来，这种新的历史局面使毛泽东期待已久的战略重点的转移开始有可能实现。它要求党下大决心一反20年来的做法，把先乡村后城市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1948年2月，中共中央从陕北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提醒各地要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责成各地领导机关对本地区内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逐一作出工作总结，限三至四个月内电告中央。这项措施，显然是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进行准备。

明确地规定“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是当前任务的是1948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加强城市和工业管理工作。当时解放区许多地方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流行着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幻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因为党长期生活在乡村，许多一直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完全不熟悉城市，也不懂得现代化的大生产，常用农民小生产者的观点来

看待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过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区别所在，在这次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潮。他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很清楚，毛泽东一直认为决不能离开工业化来谈社会主义，并且把那种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出发所提出的农业社会主义斥为是反动的、破坏生产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都是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民粹主义的。这种说法实在同事实相去甚远。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突出主题。毛泽东为这次全会改定的公报说：“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重心转移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是什么？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公报明确地写道：“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当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毛泽东在城市工作中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又突出地抓住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就抓住了要害中的要害。

毛泽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看作党在新时期工作的中心环节。他用鲜明的语言警告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他看来，只有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中心环节，其他千头万绪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新政权才能站住脚跟，革命胜利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八大路线得以提出的思想脉络。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农村？不是。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粮食，城市人民也无法生存下去。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继续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这样，新社会才能稳定地、总量均衡地、持续地向前发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中写道：“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毛泽东将辩证法在城乡关系、工农业关系上的运用，也是他以后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个战略方针的先导。

这以后不久，鉴于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又确定一些新区的工作重点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放在农村，以便发动群众，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先决条件。这自然不是违背而正是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方针。

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基本原则的思考

外交工作主要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中国共产党一向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曾同不少外国人士有过接触，积累了初步的经验。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已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那时在解放区没有建立中央政府，也没有外国政府设立的外交机构，因此，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外交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一些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城市相继解放，在将要解放的地区和城市中还遇到更多外国侨民以至设立在当地的外国领事馆。这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1948年初发出指示：“只要他们承认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法令条例，即容许他们继续居留于我解放区，进行业务或其他正常活动，并受我民主政府之保护。”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新中国即将诞生。如何确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自然被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承认他们，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外交关系，只是保护侨民。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也着重谈到外交问题。他说：“总的观念：百年受压迫，站起来了，民主联合。这个承认，那个承认，是旧观念。有些气概，才能摆好。”对具体政策，他说：“外交关系不承认为好。”“外贸关系一件件作，不受束缚。”“总之，有利的解决，不成熟的过一下解决。”

会后10来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两段重要的话：“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些主张的根本点，就是中国人民一定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旧外交关系，将这些国家的原有外交人员只当作侨民加以保护，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要求他们新的基础上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样做，可以使新中国在外交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不受任何过去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也有利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南京解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着不走。这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黄华可与司徒见面”，应该向司徒“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对于（司徒的秘书）傅径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不久，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黄华在6月28日同司徒见面，“他说他接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如果我希望访问燕京大学，他们会欢迎我到北

平的。” 司徒雷登本人似乎倾向于作这样的访问，但因遭到美国国务院反对而作罢。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 28 周年的日子，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含糊地宣布新中国必须“一边倒”。他所说的“一边倒”，不是指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新中国的发展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当时，国际上正出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美国政府不但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并仍在企图威胁、孤立以至扼杀新中国。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宣布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独立的根本利益。“一边倒”决不等于依附某种外国势力。有着高度民族自尊自信并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从来没有含糊过，更没有屈从过，这已为历史事实所充分证实了。

到新中国诞生前夜，由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把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以纲领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六、结束语

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年毛泽东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以宏大的气魄迎接新中国诞生所做的一切，回顾起来依然令人为之神往。

领导的重要表现是有预见，要在走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许多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匆忙地甚至轻率地作出一些不正确的决定，它们所造成的恶果将十分严重。

毛泽东是善于掌握时机的大师。他目光犀利，反应敏捷，决策果断，善于透过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看清楚历史潮流的趋向。1947 年最后一个季度，尽管还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他却判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开始筹划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和三大战役这个战略决战的号角吹响同时，他主持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在党的领导核心中对新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为了慎重又不立刻加以公布。三大战役刚结束，他便立刻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随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它的基本内容，事实证明是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这一切，都不失时机地进行得那样井井有条，一环紧扣一环，仿佛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在毛泽东一生中，可算是得意之笔。

当然，对新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样完整的设计，决不可能由任何人先验地或一次地完成。为此，中国共产党曾进行长时期的探索。这像是一场不停顿的接力跑。毛泽东从来不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曾要求与会同志阅读：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全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四节第二、四项，第五节，第六节；《新民主主义论》第六章；《论联合政

府》第四章（“我们的一般纲领”）等。七届二中全会时，他又叮嘱：将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与会同志，“以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他又不囿于已有的看法，而是随时仔细观察并研究正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国情，坚持把客观实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因而在认识上有许多新的突破。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这时在认识上最重要的突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在九月政治局会议时说：“六大大会的决议基本是对的，其中有错误。”在六大决议中，没有提到没收官僚资本，对政权性质的规定是工农民主专政。毛泽东说：“1928年六大时，中国官僚资本尚未形成到这个样子。中国资本的集中，官僚资本的形成，主要是在最后二十年中，所以当时未提出是有原因的。”他又说：“那时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在政权中根本不要它。现在是有一条比较缓和，有一条比较过去激烈。”他不只是提出许多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对实际工作的进行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做的中间应该注意些什么。没有这些界限分明的具体政策规定，即便基本方针正确，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起来仍可能会走样。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适时地发出的一系列具体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实际工作的强有力领导。他自己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必要，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原来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注意到：对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的确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毫无疑问地居于主导的地位，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又分别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有力地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功勋将永远不会磨灭。他被称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人，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电，1947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1947年10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9月8日。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讲话时的插话，1948年9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1948年9月13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948年9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1月6日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毛泽东给吴玉章的信，1947年11月18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72页，第1375页，第1475页，第1238页，第1347页，第1428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中共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1948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1949年5月10日。司徒

雷登致国务卿，1949年6月30日，见《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306页。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参考文件目录》，1948年9月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1949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8年9月8日。

强国富民道路的开拓与发展 ——学习毛泽东经济思想

刘国光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这炮火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沦入屈辱、痛苦、贫困的悲惨境地，同时，也使中国人觉醒和奋起。自那时起，一批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上下求索，勇敢抗争，不懈奋斗，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痛苦的挫折。中国社会在血与火中发生着剧烈的变动，长期处在混乱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有了正确的领导力量，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革命胜利以后，又向着更高的目标奋斗。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毕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切，都与毛泽东这个伟大人物紧密相连。在此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回顾总结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对这位历史巨人的缅怀和纪念。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困境，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也没有提出真正能够救国富民的“良方”。中国社会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这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并依据对这种性质的科学把握，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有步骤的革命改造的理论；是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形成一个什么经济形态和这个形态如何向更高的形态转化的理论，是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展的，是在与“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成长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是要按照社会自身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此，要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化和发展，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而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条唯一正确的认识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认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到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总结了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成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有了完整的科学认识和表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支配。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

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是自然经济基础的破坏，还是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使早已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正常地发展壮大，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近代中国便逐步演变为一个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又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而且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运用各种手段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中国社会形态的这种性质和状况，决定了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和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规律。他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的强国富民之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因而在确定这一革命的阶段性和对象时，是严格依据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想，都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酝酿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萌发后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正反两个方面思想材料的积累，到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逐步走向成熟。三大经济纲领的提出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经过长期发展走向成熟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三大经济纲领从总政策的高度克服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和右的、

特别是不断冒出的“左”的倾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一基本经济思想和基本经济政策，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早已提出并实践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种经济上基础性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反动的旧政治、腐朽的旧文化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且开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道路。它为中国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使资本的产生、生存和运行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过去虽然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让资本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发展的基本思想，并且也确定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资本要“节制”、要收归国有的政策，但对特定形态的大资本与一般中小资本在性质上的区别，认识上还不具体。在三大经济纲领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性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不同作用，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政策。官僚资本是一种垄断性、买办性、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又是和独裁政权结合在一起实行超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资本。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一经济纲领，就是根据官僚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依据“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提出的，是从整体上铲除腐朽的生产关系、扭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纲领。由于其对象本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的多重联系和特定性质，它具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向未来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集中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有着没有充分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即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新式民主革命后的结果。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经济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国家经营，即由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和经营，这种经济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营也已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私人经营，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劳动人民个体经营。此外，还有国家和私人合作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的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构想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实现，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充分展开，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

实践，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是非资本主义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二

革命胜利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就提出的一个设想，这是他的革命转变理论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地方。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对于决定和支配这一转变的条件，毛泽东也很早就从原则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在1935年12月就指出：“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分析了旧中国经济中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指出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认为我国建国后应该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创造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对实现转变的经济条件的认识和把握，虽然不能说非常具体，但有实现工业化这个有实在内容和客观标准的基本内涵，应该说是已经有相当实在和具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这种认识和把握是严格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至于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人都预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或20年。

到1952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预计的目标，经济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加以解决。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分化的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題。而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经历几个回合，斗争并未结束而是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了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和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中限制资本主义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预计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了。原来的设想是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若干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总路线的提出使原来的理论设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

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是两翼，是为实现工业化服务的。完成这个过程当时预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时间，加上 3 年恢复时期，共 18 年。这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 15 年或 20 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步骤和方法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把拥有 5 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伟大社会变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后，很快就又将他们引上互助合作之路，是从使农业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相配合、使农民的小生产逐步走上大生产从而由贫穷走向富裕这一目的出发的，也是从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更有效地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从而消灭城乡的剥削制度出发的。这个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公有制的基本出发点，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战略部署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确立的。

在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对待个体农民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示范和社会帮助的途径，实行自愿原则，创造出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对小农经济和农民的性质和趋向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领导农民创造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循序渐进的过渡形式，并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初级社这个过渡形式更具有中国特色，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等特点，是自然而不强制地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不足之处是，上述循序渐进的正确原则和做法没能贯彻始终。1955 年夏季以后，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后，没有坚持逐步前进的方针，而是急于求成，出现了“左”的错误。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由低到高的三种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同农业合作化进程和出现的倾向类似，也是起初步伐稳健，后期出现了一些毛病，主要是集中过多、社过大，没有顾及手工业分散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过的的一种代价较小的、较为理想的方式。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列宁的政策，列宁的赎买设想未能实现。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条件下和平地改造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我们党历来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剥削工人阶级和拥护《共同纲领》与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在人民民主政权和国营经济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加之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了。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明确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低级的是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的是个别企业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 1956 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由工缴费、四马分肥到定息、高薪等一系列赎买形式，同时实行企业的改

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既把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又把剥削者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速度过快；过分强调集中，不适当地“裁并改合”；大批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被当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卷入公私合营，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

当我们回顾建国初期这一段发展路程时，确实感到在这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与步骤的理论设想发生了某些变化，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改造的实际进度也大大加快。根据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标准，生产关系的改变步伐应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可是实际进程却是生产关系的改造进程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在性质上并未发生冲突，而社会主义改造从总趋势上也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的。况且当时的客观环境也在促使加快改造的步伐。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不能不说是生产力标准的某些偏离。从理论根源上讲，毛泽东已经由在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时严格依据生产力的要求、坚持生产力标准开始变得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有些把握不准。这是今天才能看得较为清楚的一点，它也是我们总结整个理论发展过程的一条基本线索。当然，全面地看，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在保持了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并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情况下，顺利地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巨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三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开启。建设我们党多年为之奋斗、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这是使全党振奋、令人民鼓舞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和发展，必然要走过一段成就与失误并存的崎岖道路。

在理论创造上极具独创性的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是，很快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论十大关系》是在确定了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背景下，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和复杂经济关系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虽然还是初步的、总括的，逻辑和层次还不太分明，但是其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十大关系的前三条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已开始涉及到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后五条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毛泽东自己认为，从提出十大关系起，

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开始反映中国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在自身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不仅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矛盾，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些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质和矛

盾的把握上，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特征。毛泽东肯定了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这一思想为以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这个总方法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就是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和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是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就更重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而不能像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他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1）。另一方面强调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从农轻重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来真正发展重工业。他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是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2）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一五”期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农业增产比较大的年份，第二年工业的发展就较快，财政收入就较高，为国家提供的资金积累也较多，否则，结果就相反；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一再证明这一点。最近，中央强调要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要确立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地位，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也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企业关系的精辟见解。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

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3）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对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14）但是企业的性质和权益到底应该怎样确立才恰当，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的经验不多，还要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基本机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时，建议各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5）毛泽东自己带头读书，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冷静深入地思考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针对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思想，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首先，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和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出发，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着重论证了保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城乡经济联系的唯一形式，是使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道路这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由国家无偿地调拨农民的产品，又没有充分的工业品去满足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削农民，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阻碍生产的发展和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毛泽东并不局限于从两种不同所有制这个层次去认识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源，他还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可惜没有再作进一步的阐发。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心存疑虑。毛泽东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顾虑提出：“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但是，“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它是需要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对于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有，就限制它。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这里实际上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而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从商品生产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方面，来认识其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的论断。他严肃地告诫全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这些论述，讲得非常生动、鲜明和深刻。这反映了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思考中曾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命运和作用的认识有所突破。令人遗憾的是，

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高度，却没能坚持和继续发展下去，而另一种思路却逐步扩大和发展起来。

从前面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的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已经有所淡化；而到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更出现了偏重生产关系方面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曾在 1962 年 1 月说过：“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16）当这种思路进一步发展到对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忧虑，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7 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思想。这种“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完全中断。

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偏离、失误和一度发生的中断，就使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把我们国家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迅速强盛和富足起来的美好愿望的实现遇到了挫折。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提出的战略目标。在 1954 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毛泽东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即到 2000 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956 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把第一阶段的任务具体化了，即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发生了 1958 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和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党和毛泽东追求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 1964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 1975 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又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一战略目标。他说：“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发人深思的是，在这 20 年里，虽然经济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总的来讲，却是处于发展迟缓和徘徊的状态，这个宏伟战略目标没有如期一步步实现。

四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剔除“左”的错误，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进一步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

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7）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重新恢复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观察和判断一切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指导下，全面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又到十四大，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也是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在一些理论基本点上的重新确立和更为明确、坚定。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所谓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在理论上不能把书本当教条，在实践经验上不能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出发点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伟大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去探索，去创造。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的要从基本国情出发的思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道路，正是由于坚持了从基本国情出发这一原则，由此正确把握了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跨越阶段的“左”的失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冷静客观把握和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现在，经过探索中的曲折，我们客观冷静地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要有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因此，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个基本阶段。

在根本任务问题上，以更大的理论坚定性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生产力标准，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换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发展生产力，把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确定为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就决定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归根到底，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方面，更为集中和概括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

以上这些当然都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重要、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时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成为痼疾，腐败现象滋生，各种弊端日益严重。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曾经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却日趋严重地出现了“左”的偏差。他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解决问题，结果原有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使整个社会蒙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邓小平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具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家，以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科学的求实精神和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为在我国革除弊端、复兴发展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中国社会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0）“除了走改革的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21）。

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经济规律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科学地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重要而深刻的基本命题。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并进一步作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具体环节上，又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这种不完善的方面还没有作出准确具体的界定。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使得这一蕴涵着改革的思路未能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推迟了中国体制改革这一迫切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

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且把这种改革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的全面、具体、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上。他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矛盾。因此，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22）。这种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就在于僵化的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制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滋生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消极现象，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在。当从这样的理论深度，如实地承认我国传统体制中存在着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状况，科学地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理论命题时，就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不仅打通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之路，而且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康庄大道。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改革实践所提供的新鲜丰富的理论养料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冲破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世界上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理论基点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在再认识过程中，我们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抛弃了过去曾经产生过极大危害的“左”的唯意志论，冷静地审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这种发展的理论集中点是对新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摆脱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开始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 1992 年初南巡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跃进。这样，党的十四大就有可能在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总体目标，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各个方面重新认识的理论结合体。10 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探索的理论成果都包容在这个目标模式中，充实着目标模式的内容。最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将这一长期探索的成果，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总体框架的阐述中，为今后改革的深化开展提供了指导的蓝图，并决定着这个模式的属性和运行方向。

如前所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早已确定的战

略目标。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有坚强的决心，而且更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需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作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高速度”、“高指标”，虽然表现了强烈的愿望和决心，但由于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体制保证，由于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干扰，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不可能得到落实，预想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长达20年的波动和徘徊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确立了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体制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邓小平都作出了重大的杰出的贡献。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总体构想。这就是第一步，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前面的基础上，再用30年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14年的改革，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80年代我们已经提前实现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90年代我们正在奋力向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前进，并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都是在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新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这一理论将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最终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第626页，第628页，第1254—125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第1254—125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

(11)(12)(13)(14)(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第796页，第721页，第797页，第729页，第727页，第829页。

(1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17)(18)(19)(2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372页，第150页，第35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

(21)1985年10月23日，新华社讯

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思路

钟哲明

毛泽东，这位斯诺认为“看上去很像林肯”，晚年却自称生就一张“大中华脸”的世界伟人，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又于1956年开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思路或思想火花，以正确理解它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后继承和发展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否定格式一律， 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特点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当时苏联推行“统一的社会主义式样论”或“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同马列主义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由于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并通过特殊表现出来，因而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特色。《共产党宣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宣言”的某些部分便带有德国的特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俄国特色一目了然。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可见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绝不是“统一式样论”、“单一模式论”，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特点论、各国特色论。

毛泽东比陈独秀、王明等高明，正在于他不改“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的初衷，不抄袭欧美，不照搬苏联。早在20年代末，他提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1938年他倡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1956年他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贯坚持的中国特点论的总结。

坚持中国特点论，就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同样，边建设边探索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规律，也不能不经历类似的层次和过程。建国初学习苏联，使我们一开头就从第二层次研究“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1956年否定格式一律的“统一式样论”，是要更好地在第三层次上探索“更加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从

第一层次研究“一般”建设规律，落脚点仍是第三层次。

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加注重中国和整个时代的特点，继续运用“古今中外法”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年初找华北九省的书记和中央34个部的部长来汇报和讨论问题，1961年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主持三个组去三省调查。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他晚年的失误，恰同缺少调查、疏远群众有关。而年老体衰和“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的客观情势也对他不无影响。

国内外有人问：坚持中国特点论的毛泽东，为什么1949年号召“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呢？南京一解放，司徒雷登就说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联系西方的封锁禁运和斯大林心存疑虑，不难理解当时“一边倒”是“必须”的。它意味政治上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而另一脚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从来认为“走什么路”同“怎么样走”，是两个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问题。斯大林怀疑他是“铁托第二”，另有人说他搞民族主义，都是不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格式（模式）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将列宁说的“走向”与“走法”混为一谈。毛泽东始终不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必由之路同民族特点统一起来，这就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分道扬镳，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苏联领导人的高压，他宁可决裂，也不走老路、不当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继续新的探索。邓小平弘扬这种精神，在80年代初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几年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什么对中国“不灵”？“奥秘”之一正在于此。

鉴戒苏联经验，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明义：“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强调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新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公开阐述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随后又构思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便是它的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首先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经验相联系的。

他历来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反对提“技术一边倒”。以苏为戒，也不是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大跃进”的失误后，他发觉对苏联的经验破得太多，又带头读书包括学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后来还说苏联的领导变了，我们仍要学习苏联党

和人民的好经验。这种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反对完全以“风”为准、好走极端的“风派”，主张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以苏为戒，不等于对苏联的一切鉴别得那么清楚；探索新路，更非不会再有弯曲。他看到苏联20年中钢只增加1400万吨，思索中国是否可以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冬受苏联宣布15年超过美国、内部规定从1959年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以及集体农庄并大后很多事情好办了一类“经验”的影响，他提出中国15年超过英国，并随即发动“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1958年因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致使中苏关系闹翻后，他那样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尔后又那样激烈反对修正主义，动因固然复杂，但不愿国穷受压，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这些因素，的确起了重大作用。

可是经济上以苏为戒，另辟途径，引发了“三年困难”；政治上以苏为戒，“反修防修”，导致了“十年内乱”。说明历史走“S”路，由合力促成而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欲速不达，求直反曲。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但只有自己经过多年开车包括翻车的实践，“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才能驾轻车而就熟路，从必然走向自由。可见师人之长或戒人之短，既要“知彼”更要“知己”。敢走新路的大抵是强者，尽管一次成功的少，而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又同如何看待“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1956年1月他开始用“穷”与“白”表述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时，就说它“有两面性”。以后多次说它是“两条缺点”，又是“两条优点”；是“坏事”，也是“好事”。意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民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穷国将变为富国”。

他对这一转变的艰巨性曾估计不足，但并未将穷与白简单说成“优点”。1957年2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他讲“富的革命就困难”，是要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革命的影响和腐蚀作用。认为中国“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仍是就富的“二重性”而言，并无怕富乐贫的意思。

正是他，1955年提出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956年又将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百年奋斗的长远目标，并把它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从地球上开除“球籍”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联系起来。早在1944年就强调区别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而1957年冬嚼了卫士带回的黑窝头竟为农村的贫困难过得流泪的毛泽东，绝不想搞贫穷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渴望广大群众早日脱贫，夙夜求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正是要更快地使祖国富强、人民富裕而又避免蜕变腐化和两极分化。

面对世界之最的众多人口，他不苟同于“人越多国越穷，国越穷人越多”的恶性循环论，也不像美国艾奇逊那样把它看作“不堪负担的压力”或赫鲁晓夫那样骂它不过是核战争中的“炮灰”。他认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1）。唯其困难，他先主张“饭匀着吃”，50年代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大跃进”中一看“人手”不够，又片面颂扬“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致使我国人口严重失控。但在经济落后而首先进入社会

主义的东方大国，他不怨天尤人，也不拿原则作交易，锐意进取，要依靠“一穷二白”的“六亿人口”改变“六亿人口”的“一穷二白”。这种自立自强的骨气和改造中国的志气是很可宝贵的。为此：

他提出想问题、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教育人民为了集体、后代、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着眼于我国是农业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说工业总产值即使占工农业总产值70%，也不像苏联那样宣布实现了工业化，而应在长时期内叫做工农业国。强调“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不同意苏联那种不重视农业、不相信农民和竭泽而渔的政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他提出“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2），并构思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指出对它还要看几年。但实践中急于求成。总结教训后，强调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经济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就是生产也好，建设也好，若干年比较低，若干年比较高，这么波浪式地发展。经过几年调整并鉴于世界科技迅猛发展，1964年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对比1958年的“小土群”和“放卫星”，这是他对“大跃进”的重新解释。纵观全过程，毛泽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出了问题，调整总结，挫而不折，继续奋进的大视野、大毅力是令人敬佩的。

他认定“六亿人口”是我们的“本钱”，说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他探索新路，强调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却又从坚持群众路线，发展到一切大搞群众运动，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也肯定它有“两重性”，并为此同哲学家李达辩论一场。类似这些真理过了头就变为谬误的事，的确带有“左”的特征，但不能由此断言他是唯意志论者。因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源于缺乏经验；不少问题“始作俑者”是他，发现最早、纠正最快最坚决的也是他。而总结后形成的共识如：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读书调查；相信人民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冷与热结合；虚与实结合；政治与经济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等等，至今仍熠熠生辉。

黑格尔说人们并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确实，经过“大试验”，交过“高学费”，历尽磨练，有了比较的中国人民，今天更聪明更坚强了。这就是历史上一种形式的支付，常带来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吧！。

突破苏联模式，

求索新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思路。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揭示的十对矛盾，说到底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同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当时我国是区别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着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较早的。从这年春到1966年夏，时断时续地有过三次改革探索。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论述和设想。

经济方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私营大厂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突破了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部分非公有制存在。当时这是需要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的。

在分配问题上，他对“资产阶级法权”有过误解。但不满意苏联过分强调物质鼓励，提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和“钱能通神”，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1958年向地方分权，企业下放多了快了，造成混乱，有点半无政府主义，便适当收。1966年3月又说收多了，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这种“分”与“集”、“放”与“收”的反复，表明对原体制的改革尚未找到真正的症结。但他强调企业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国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所有权不能变，“独立性”只能在经营权方面，实际上触及到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他认为公有制建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由他制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有的西方国家仍在研究。1964年他赞同试办工业托拉斯，说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要按经济法则办事，按经济渠道办事。

在计划工作上，他开始突破苏联所谓计划就是客观比例反映，就是指令性计划，就是法律等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的计划。吸取“大跃进”中基本上没有宏观控制的教训，他强调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重点地协调发展。

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他1958年一度困惑。随后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主张和做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并用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则进一步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提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都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这些都很有见地。

他说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国原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这些论述很精辟，仍有现实性。但他将价值规律同计划需要相对立，这是不正确的。

政治方面，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进入社会主义后，其性质已是无产阶级专

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13）。

政府体制，继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苏联的“苏维埃”或西方的“三权鼎立”。同时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要精简机构，建议党政机构砍掉 2/3。国家结构，继续实行同民族区域自治结合的单一制。1958 年 3 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苏联俄罗斯族占 50%，少数民族占 50%；而中国汉族占 94%，少数民族占 6%，所以不能搞加盟共和国。但 1956 年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4）。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政党体制，提出“搞两个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不是西方的两党制，也不是苏联那样把其他政党搞光，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的一党制。

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苏东剧变而我国稳定的事实表明，上述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

为了改变政治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要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不至于出现地区割据。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共八大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并准备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这是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终身任职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最早酝酿。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他中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一人称霸，不让他人讲话，听不得相反意见，难免要跨台，要“别姬”。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建立。这就从政体上把问题说深讲透了。

总结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多次尖锐批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三风五气，猫鼠关系，做官当老爷等严重脱离群众、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现象。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制定了学习、整风、干部下放、将军当兵、调查蹲点、参加体力劳动等制度。这些反腐防变措施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党风、社会风气比较正。

思想文化方面，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鉴于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和行政粗暴干涉学术问题，他认为：“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6）。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又论证要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宣布领导我们国家应当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发扬民主。

对外开放方面，《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当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囿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是不愿提或不敢提的。他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要坚决抵制和

批判西方“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反对“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奴隶思想和“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1958年他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和压力，难以全面实现。但他仍不放过一切同外国经商、交往和寻找突破口的机会。1964年他表示只要日本企业家愿意，他们可以来大陆投资设厂、开矿。70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阻隔中美20多年的屏障，使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和更快奔向现代化。他从来认为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社会主义“是国际的”，没有也不会“终生搞自我孤立和闭关锁国”。

毛泽东通过上述设想和变革，试图消除苏联僵化体制的影响，探求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7）。在阐发这些思路时，又总结概括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18），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高瞻远瞩，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

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他还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中进行改进和调整。其思路有些实现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中途改变，有的始终停留在字面上。特别是“文革”搞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更远离了改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经过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和万千气象。

坚持两线作战，更新社会主义理论观念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同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更新紧密相联的。进入社会主义后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使他深感不开动脑筋、活跃思想，不突破旧观念、形成新理论是不行的。他长期批判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地看到俄国人“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19），这意味什么，交走向何方？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便增写了对“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批判内容。这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反思传统理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

他的重大思考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如何处理？

苏联的历史经验，波匈事件和我国某些地方的“闹事”，冲击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的理论。由毛泽东主持讨论，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同年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1957年1月他在一个会议上又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这些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20）。《正处》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说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3条中有“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的规定，联

系“生产力起来造反”的提法，实际上开始思索社会主义下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这样，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力量、社会改革和根本任务等，提出了和斯大林不大一样并为当时苏联官方所不容的看法，揭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篇章。

1956年12月4日他致黄炎培的信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从政治上区分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解决。《正处》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一次把这一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又说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就否定了斯大林不讲同一性，不承认互相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发展了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1）的论述。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避免斯大林理论上否认矛盾而实践中混淆矛盾的错误。考虑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和大量存在，而我们又经验不足，他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提起一切工作的纲”。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时，一度把总路线的文字表述改写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思路和提法是很可贵的。

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他指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像苏东国家那样只讲“利益一致”而忽略了群众的正当利益。必须正确处理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学会“治天下”即建设人民国家的本领。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尖锐批评有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学说，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可惜“文革”中他自相背离了。正确理论提出不易，任何情况下都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可能更难啊！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总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1957年1月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对立的阶级，有阶级斗争（22）。《正处》发表时增写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否定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谬说。又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联系后来的苏东剧变看，他这一论断是有远见的。但前进中他犯了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错误。他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对立出发，指出美国军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社会主义各国的；杜勒斯还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全人类的解放。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只讲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和赫鲁晓夫断言资本主义包围不再存在等观点，提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问题。

他的重大思考之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处于

什么发展阶段？

他原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属“小过渡”论。后来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4)。相应的时间为15年，50—75年，100多年。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他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稿和《正处》中都有“过渡时期”的提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和领导人讲话中也都未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这样做，不仅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且想避免苏联过早宣布过渡时期完结，新经济政策结束而带来的诸多弊端和问题。

1958年1月，他有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25)的新提法。读《教科书》时更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样，他就采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标准，转为“中过渡”论了。

可是，什么叫彻底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呢？他看到斯大林1936年宣布剥削阶级消灭，1937年又杀了那么多人，认为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还是让它先吊着，不忙宣布为好。我国1958年的遇挫，使他深感建设不易，“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向共产主义过渡更不能轻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和20年内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更使他思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四个“达到”(26)的过渡阶段，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达到”没有？当今国内外条件下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成共产主义吗？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写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两个过渡的“大过渡”论面世了。当时竟以为这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标准，同“全民国家”和超越阶段等错误划清界限。

从“小过渡”到“中过渡”再到“大过渡”的思路，反映毛泽东等第一代探索者经历的曲折、艰辛和传统观念、历史条件对他们的影响、限制；也透露他们已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的差异性、一国或几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和长期性。本想坚持马列并反对一种错误倾向，却走到另一极端：过渡时期越推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越拉越长，再当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便导致“天下大乱”了。

但是，毛泽东1956年起始终认定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并未“搞错”。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社会有“第一阶段”、“高级阶段”。列宁1920年提作“低级阶段”、“中级阶段”、“最高阶段”。他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把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成分叫做“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中国情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这是创见。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可理解为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今天以1956年为过渡时期终点和初级阶段起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已达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壮丽一生的后期，主要献给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

的探索事业。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才有第二、第三……。最近全国总工会一调查中有问：“你最崇拜哪种类型的人？”人数最多的回答是：“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27）。但他同一切先行者一样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探索中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交织。我们应如邓小平讲的恢复他“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能战胜困难险阻，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第45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第479—480页。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11）

（13）（14）（15）（18）（23）《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2页，第794页，第782页，第734页，第733页，第757页，第789页，第785页。（12）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

（1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17）1957年3月写的讲话提纲。（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20）（22）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21）《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

（2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25）毛泽东：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7）1993年1月21日《光明日报》。

（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与不足

宗寒

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天，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切身经验中得出的共同结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世界东方这样一个落后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今天，由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社会大大前进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更丰富和全面了。但是，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他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这些失误在经过认真总结之后也已成为我们的财富。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主要是科学、正确、必须肯定、今后需要继续坚持的东西；有一些是在当时条件下是比较正确的，而条件变化了就变为不够完整、不够正确的东西；还有一些是本来就不正确，应该否定的东西，这都是值得我们回溯和探索的。

一、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思想，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已不是什么问题，但在建国以前，甚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却不是这样。人们都知道，近百年来，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为了找到一条救治贫穷落后旧中国的出路，向西方学，向日本学，什么书都拿来读一读，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和壮烈的牺牲，但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了。这就是，旧中国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要走共产主义道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透彻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实践表明，毛泽东“两步走”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作了科学解剖，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结论，但是他没有、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对每一个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具体回答。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俄国这个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

它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与苏联不同，生产力水平比苏联低得多，列宁也不能具体回答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问题是毛泽东解决的。他没有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和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走第一步不容易，走第二步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太久太重了，不推翻三座大山，人们实在活不下去，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步骤都是比较清楚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建立就不那么十分清楚。如怎样对待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比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怎样对待汪洋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等等，开始都不是很有数。更加困难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后，要不要走第二步，中国是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有人对资本主义抱着幻想，提出必须“确保私有财产”，不必对民族资本进行限制改造；有人认为还是应该把“德先生、赛先生”放在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的事”。毛泽东在关键关头，严厉地批评了这些糊涂思想，顶住了这种种名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逆流，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大声疾呼：“我抗这个潮流”！他批评一些共产党员“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企图把中国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况看，都是一些人脱离中国现实的幻想。1958年，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深刻地剖析了这一问题，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有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在正确揭示建国后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建国初期，虽然由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但是私营经济还是我国经济的主体。194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48.7%，个体手工业占23%，合计占71.7%，社会还是过渡性质的，既可向资本主义发展，又可向社会主义发展。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适时地提出，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1952年，根据他的建议，党中央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到1957年底，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分别下降到占0.1%和0.8%，而全民所有制工业上升到占53.8%，

合营和合作工业占 35.3%。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在我国基本上得到了确立。

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来说是一件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所有制的变革是根本性的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人们之间通过物的占有而发生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不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动摇和铲除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意味着占人类近 1/5 的亿万劳动者，第一次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此可以不再任人奴役和剥削，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再由于失去生产资料任人随意支配，而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和社会的需要，安排和支配自己的劳动了。

所有制的变化决定着分配关系的变化，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与自己的剩余劳动被少数人占有的关系，而原则上是社会范围和企业范围联合劳动的关系；国民收入和消费品的分配，不再由资本的意志和占有资本的多少决定，而是当家做主的劳动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他们自己劳动贡献的大小决定。这些都是对生产力及其运行的巨大的带根本性的解放，都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的动力和源泉。在新的生产关系确立时，它各方面还不完善，这种动力作用还发挥不出来；随着经验的积累，生产关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调整、改革和完善，它促进生产力的作用肯定会日益充分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所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不进行所有制的变革，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新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今天，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是客观规律，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

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重要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表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即使资本主义并不高度发达，只要条件具备，有党的正确领导，也能够而且客观上要求绕过痛苦的“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生产力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新的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摆脱少数剥削者的剥削和压迫，当家做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新制度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一整套适合国情的政策，是新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这些都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要求的表现。第二，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般规律，有特殊规律。“首先造成

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属于一般规律。特殊规律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因而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采取不同的道路和方法。毛泽东分析了这些矛盾的特点，如他对民族资本的两面性的分析，对中国农民的分析，都是马克思、列宁所没有涉及到的，或者涉及不多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贡献。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建立的步骤方法有独创性。比如对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三个步骤（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最后是全行业赎买，让资本家拿定息，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有出路，“高高兴兴”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造过程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波动，而是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的步骤开始也是稳妥的，只是后来才急躁冒进了。第四，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当发现问题，意识到走过头的时候，又及时地做了一些调整。如1958年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后，毛泽东发现所有制变得太快，在1959年郑州会议上，他提出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他说：“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搞几年再看。现在还不能过，将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另一种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又如发现养猪减少，农民对自留地有顾虑的时候，规定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规定自留地长期不动，等等。

当然，今天看，我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急了些，步子按理可以慢一些，走一步看一看，再前进会更好；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学苏联的一套，搞得很死。这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偏差有关，这个问题下面再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新中国建立后，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收官僚资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当时全国各地的劳资纠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激烈；新中国的工人深感自己的地位变了，不愿继续受资本家的剥削，私有制明显地阻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资本家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扰乱市场，干扰国民经济，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向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生政权的进攻。农村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财富和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卖地讨荒的农民越来越多。怎么办？让其自然发展下去，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还是采取适当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新生政权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当时的情况看，让资本家继续扩大剥削，让资本主义自发发展下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进行三大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形势使然，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毛泽东不过是正确地反映和集中了这种愿望和要求，并抓住时机实现了这种要求。我认为把走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毛泽东的空想”，是违背实际的。

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慢一点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是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吗？”事物的发展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与当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不一样。一个根本不同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那时恰恰相反。在当时情况下，不发展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你不吃掉它，它就会吃掉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很难设想有今天的公有制的主体

地位。不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巩固不下去，政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要部分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两重性，即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它不能离开而必须依靠国营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这说明，这种“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恐怕才真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怎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要探索

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作了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探索。

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缺乏经验。虽然有苏联的样子可供借鉴，但我国与苏联差别太大，不能照搬。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一分为二，进行分析。他也没有完全受经典作家一些个别论断的束缚，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力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并且他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以至后来成为“左”的路线的依据。但他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论断，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可贵的、有重要价值的，应该看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的理论。列宁进了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列宁没有对“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作具体分析。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不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

他先把“进入社会主义”与“建立社会主义”分开，又把“基本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分开。1956年他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们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有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没有了？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深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还不完全巩固”。尔后，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又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1）。他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阶段，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12）

他对诞生不久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剖析，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他说：“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13）。1958年他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又指出：“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14）。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又概括道：“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5）。他还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6）。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正好。”（17）“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8）。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不赞成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把社会主义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具有对抗性；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和剥削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一面和非对抗性的一面。他把工人阶级内部、农民内部、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等，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能够得到正确处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有不同的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一分析是极重要的，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又不断改革那些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的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得我们至今受益。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 生产和商品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价值决定只是在调节和分配劳动时间中起作用。列宁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步实践中得出结论：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正常的工农业品的商品交换是不能缺少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存在两种公有制形式，消费资料仍然是商品，但他又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的外壳，

价值规律只在一定的范围（主要是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不这么看，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了更大胆、完整、接近实际的论述。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原则区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经济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他认为，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商品生产，它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因此，“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要尽可能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同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认为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是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正确的，但不够完整。他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商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是很有远见的。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就是不可避免的，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他反对随意平调农民财产的“共产风”，尖锐地指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能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20）他又说：“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21）

他不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中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都起作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2）

但到了晚年，他又提出商品生产、八级工资制与资本主义差不多的思想，甚至提出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一方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把价值规律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来搞的。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解有一定的片面性。

（四）关于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3）。“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24）。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进一步申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他告诫我们：“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5）。他强调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他说，必须关心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任何政策方针都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1959年，当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省县两级有不同看法，而小队长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他坚决主张按小队长的意见办。他说：“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26）。又说：“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27）。城市也是这样，“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28）。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由群众路线来的。相信中国人民群众，必然相信能够依靠中国人自己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他看了河北省“穷棒子社”的材料，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29）又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主张，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经验”（30）。他认为落后国家通过自己动手赶上先进国家是个规律。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自己的努力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是这样，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全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以不依靠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31）

他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和向外国学习。他的一些极为精彩的观点，如“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也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2）。这些精辟思想至今脍炙人口。但由于受国际环境的限制，当时这些思想不可能完全付诸实践。

（五）关于经济体制

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解决后，解决好体制问题，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一件大事。他提出，所有制的革命“是有底的”，不能无限地改下去，但体制怎么管理，怎么解决其中的矛盾，“难说有什么底”。他说，“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33）他提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利益应作全面安排，统筹兼顾，不应只顾一头。“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34）。

他反对高度集中，提倡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他指出：“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的”（35）。“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36）“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37）。

他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如工业为主导、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企业并举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思想等等。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动员和团结了全国广大群众，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理论上的主要失误

正如所有革命领袖和伟大思想家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失误。有些失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判断，成为形成党的路线的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直接损失。值得研究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本质概括。我们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这种矛盾还可能激化，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继续解放生产力，坚持基本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生产关系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可以分为1958年前和1959年以后两个阶段。1958年前，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清醒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8）进行三大改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通过所有制的改造，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需要（39）。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0）。1958年，他全力以赴抓生产力，亲自抓工业，抓农业，抓国防，

抓“三线”建设，说“三线建设不好，我就睡不着觉”。他过问大江大河的治理，关心灾区；他指导密植、养殖、积肥，以至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仍然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可是从1959年夏天起，特别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及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形势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未能把正确的思想贯彻到底，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变，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不可能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把生产关系看成是高于一切、可以离开生产力状况而随意调整的东西。

他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的分析是透彻的，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也曾尽力做了符合实际的分析。例如，1959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他提出“开倒车”、“泼冷水”，反对急于过渡，反对贫富拉平，反对“共”农民的产。他提出切莫“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41），提出改变所有制，“（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人吃亏为原则”（42）。

但总的说来，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弄清楚，理解和处理有片面性。他把公有制的先进性绝对化，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固有的，不管客观条件如何，似乎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越高，变革得越快，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越纯，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对生产力水平低条件下的非公有经济缺乏分析，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一律不再适应生产力增长的要求。他出于对中国劳动群众早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希望尽快消灭一切私有制，最好一个早上就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

他没有充分意识到，任何社会形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都是具体的，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也是具体的。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比过去有了发展，但仍然落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有不同层次的。我国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又存在大量落后的半机械化劳动和手工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必须与这种状态相适应。他也没有科学地分析我国劳动者这一主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过高地估计了农民要求集体化的一面。他看到了农民要求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但认为集体经营的要求占主要地位，把正确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斥为“小脚女人”。这是他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急于将个体农业改为人民公社，认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认为在几年内可以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本原因。他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远离我国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要求，寻找适当的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和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他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研

究。总之，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是进步的生产关系。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公有化程度来评价生产关系的先进性，而只能用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这一主要的客观标准，来判断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

第三，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过高过急。

他为了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努力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他下去调查，找各部门请教，博览群书，从《资本论》到种籽学，生物学，地矿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读；他研究农业，研究工业，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电子、中子的结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60年的几年内，他写出了《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八字宪法》、《鞍钢宪法》、《工作方法六十条》、《党内通信》、《关于基本粒子的谈话》等著名篇章。这些充满辩证法和智慧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指导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今天读来也深切受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一再告诫我们要尊重而不要违背客观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他说：“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44）。1959年他很谦虚地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45）。

但是，他还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要求过高过急，发动了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理由只有一条：“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46），而没有考虑客观能力如何。他提出“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47）。还提出“七年内消灭文盲、四害，完成乡电话网”（48）。“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49），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做不到的。

四，理论问题十分重要

毛泽东理论上的某些失误，不会淹没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和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社会主义毕竟是崭新的事业，我们的新制度建立不久，缺乏经验，许多客观规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不应仅用个人品质、智慧来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正确一样，我们也不应该用个人品质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某些失误。他的一些失误带有明显的时代的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50）。由于“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客观条件”（51），

因而认识不周在所难免。

但是，他的有的失误按理说是可以避免的（如明显的高指标和急于过渡），或者可以较快纠正的，而没有避免和得到及时纠正，显然有别的原因。根本原因，还是违背了事实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不真正了解群众的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他对当时中国农民状况和要求的了解很不具体，仅凭主观愿望出发为群众谋福利，因而，许多判断不可能不带有主观随意性。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也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把国际的情况硬套到国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晚年他又听不进不同意见，促使他对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不正确的判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失误还告诉我们，理论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涉及全局、全社会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就更加重要。我们的党是执政党，理论对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有决定性影响。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正确的政策，能够正确的指导实践；错误的理论，形成错误的政策，会直接危害实践。不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还小些，涉及全局的理论影响的范围既大，影响时间又长，并且贯彻易（因为有行政手段），纠正难，危害甚大。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力争在重大原则的理论问题上不犯错误。有些问题由于矛盾未充分暴露，一时看不准，说不清楚，宁可放一放，或者不说死，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待比较成熟了再表示意见。

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也必将不断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丰富的经验和某些挫折都会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2）。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也应该抱这样的态度。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逝世 17 周年。这在两段时间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变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过去 28 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纠正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中失误的部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明显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发挥，说明正确的理论是多么重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工作的总指针，是指引我们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才能一方面同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同墨守成规、脱离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的观点划清界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大踏步地前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38 页。

（48）《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81—82 页，第 263、471 页。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

（13）（14）（16）（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70页，第340页，第373页，第51页，第388页。（15）（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23页，第41页。（31）（35）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20）（21）（26）（27）（28）（41）（42）（44）（45）（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39页，第63页，第104页，第111—112页，第124页，第167页，第67页，第180页，第34页，第523页，第32页。（11）（12）（22）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第165页，第174页。（17）（18）《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9）《（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959年3月）。（23）（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第1097页。（25）《介绍一个合作社》。（29）《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按语。（30）《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32）（34）《论十大关系》。（33）（37）《对冶金系统的指示》（1958年）。（36）《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3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4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页。（50）（5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页，第121页。（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到“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王廷科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却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就是这一过程的简明概括。当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开端。尽管毛泽东并未找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的探索求实精神却被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所继承和发展，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一、“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 采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如果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所以他主张要达到社会主义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素来是以坚持从实际出发，具有灵活性著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仍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在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等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向苏联学习；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确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了足够的“灵活性”。毛泽东说：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没有采用苏联没收的办法，把资本家赶走，而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消灭富农阶级的做法也和苏联不同，没有采用行政手段和暴力措施，而是创造了消灭富农阶级与改造富农分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同工同酬的劳动，把富农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从供销入手，多种形式，稳步前进。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实践中的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从而用新的经验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要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模式方面仍然是学习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即在工商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为特征的模式；在农业方面建立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模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认为，中国

搞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1954年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中国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他重申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总体上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在中国资本家还拿定息）。在分配中强调了公平却忽视了效率，而不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国民经济的产品分配纳入了中央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而不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第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方面，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无论是资源的筹集和配置的方式，还是投资重点、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都是照搬苏联经验，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举国上下，到处都响彻着“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宣传口号也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氛围下所掀起的学习热潮不能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教条主义倾向。结果，在很多领域和不少实际工作部门，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严重情况。正如毛泽东以后在成都会议（1958年3月）上所说：教条主义在许多地方占了上风，不管苏联做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言听计从。

本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就有过痛苦的教训，并从这些教训中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无分析无鉴别地接纳。为什么建国以后又坦然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建设中一度出现了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

这首先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中苏两国共产党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但是两国共产党在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强调“以俄为师”。毛泽东主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的选择这个层次上说，就是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一方面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某些理论认识。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只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式理解上，诸如只知道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却不了解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只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却不懂得需要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甚至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只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集中的计划经济，却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来获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

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于新中国成立的其他东欧国家也纷纷采纳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供选择和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苏联模式的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大体符合的，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式理解没有什么不同。因而苏联模式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效法的样板，成为毛泽东所要坚持的“原则性”。

还要看到，在 1948 年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运动，批判“走自己的道路”，把一切独立自主倾向指责为“民族主义的幻想”，进行政治谴责，从而制造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压力，以维护“苏联道路”的普遍意义。其后果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受到扼制；为迷信苏联，为教条主义的盛行制造了极不正常的气氛。

由于这种复杂原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实践到理论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对于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人是尊崇的。如毛泽东访苏曾请求斯大林派理论权威来中国帮助中国同志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表悼念文章说：“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既然苏联——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受到尊重，那么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经验，也就成为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榜样。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方面没有经验，只能仿效苏联，拿来再说。

建国前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既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不熟悉经济工作，也就谈不上自己的创造，只有先学习，“全部拿过来再说。”

要指出的是，学习苏联的初衷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在号召“学习苏联”时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前面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富强的渴求，对于国家建设获得成功的期望，便成为学习苏联的动因。因为苏联也是基于落后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考验，为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蹂躏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曾一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事实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所以“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自然选择。

第三，采纳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包围封锁，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的结果。

新中国诞生后，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孤立。新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受到西方国家在外交、经济和

军事上的严重封锁以至武力威胁。在世界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冷战逐步升级，意识形态的异同对国家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历史环境中，新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破击西方国家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确保国家安全，并从苏联那里取得支持和援助，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独特道路，斯大林曾怀疑中国革命是“铁托式的胜利”。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疑虑，维护大局所需要的中苏团结，就不能不公开宣布新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所以当建国前夕毛泽东号召“走俄国人的路”，同时便宣布了“一边倒”的国策。在政治上的“一边倒”，在经济上也就加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不抱敌视的态度，新中国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也许新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模式上会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在外交上也许不是“一边倒”，而是采取回旋余地更大的更为平衡的国际姿态。但事实并非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不但阻碍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交往，而且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上，也逼迫新中国只有向苏联学习，“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断然采纳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他说：“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曾试图改变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提出“以苏联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标志。

为什么在这时毛泽东要提出“以苏联为鉴”，进行自己的探索呢？

建国初期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五”计划时期，依靠正在形成的这种体制，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确实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复杂，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要求的多元化，这种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也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对于它的某些弊端，毛泽东等人即敏锐地有所觉察。“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1）可以说，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中国共产党人是发觉得最早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独特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既有过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痛苦教训，也有过从实际出发，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2）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所以他们很快就从建国初期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束缚中摆脱了出来，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并不完全成功，就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民主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自己来探索。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照搬照抄，言听计从，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传统不能不发生尖锐的矛盾，更是不能容许！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3）毛泽东的心情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由此可见，改变照搬照抄的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使人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严重后果，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14）。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了盖子，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人们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重新考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重新加以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便更加明确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之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5）。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便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又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以后又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6）。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7）。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但在公开发表时，由于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完全收进去，新近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对此作了补述（18）。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批评苏联体制的弊端开始的。为了从苏联体制的缺点错误中摆脱出来，走自己的道路，他既批评了苏联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批评了国内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并初步总结了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建设的布局和资源调配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条）。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他批评苏联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他提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论十大关系》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第二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三条）。提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能离开经济建设来片面地强调国防建设。

毛泽东提出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而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说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四条）。指出“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这显然是指高度集中的苏联管理体制的弊端，他提出要给工厂企业以一定“独立性”。关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他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那样的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五条），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很显然，毛泽东已经觉察到苏联管理体制中由于中央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从而损害了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缺乏活力的弊端；试图建立与苏联的管理体制有所不同的，能够调动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更为灵活的管理体制。

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第七条），明确宣布我国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讲话原稿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正是鉴于苏联的教训，同时也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才明确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八条），毛泽东作了“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估计，一反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估计。讲话原稿说：“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

教训，毛泽东宣布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在政治生活方面，还讨论了是非关系（第九条）。毛泽东提出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讲话原稿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在这里，已经孕育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六条），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他提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泽东所阐明的处理这些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初步提出了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方针，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比苏联更为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中外关系方面，《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中国和外国关系（第十条）。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毛泽东虽未点名，但显然是批评苏联领导人盲目排外、自我封闭的错误倾向。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要面向世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批评了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反对“贾桂思想”，号召“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走自尊自强的道路。

毛泽东提出这十大关系，无一不是同苏联作比较，试图在苏联道路之外，找到一条比苏联道路更好的更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便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尽管在1956年毛泽东还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有透彻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已经提出若干中肯的问题；尽管还未从总体模式上对苏联体制有什么突破，但是已经触及到苏联模式的若干重要方面。《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之后，试图从仿效苏联模式，“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积极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在当时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许多批评，在党的领导层中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到中共八大，全党的探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诸如“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李富春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开了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

三、“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开端，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全党上下在探索中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虽有发现，但并不等于在自己的实践中已经学会了避免类似的错误。所以当国际上出现反苏反共浪潮，国内出现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很快发生了逆转，使“八大”前后的有益探索受到冲击，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因而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以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严重挫折。“八大”前后的许多正确认识 and 主张，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加之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论战，中国党由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进而走向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长时期以来，苏联模式一直成为人们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终究没有摆脱苏联那种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得过多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缺乏活力的传统模式。毛泽东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迷信外国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却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的未尽事业及其探索精神，有继承，有发展，也有超越。

邓小平以其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极其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19）正是鉴于“搬用别国的模式”以及中国党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复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0）要适合中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亦即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50年代中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向。

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1）在这里，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划时代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飞跃。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方向这个层次上说，是指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层次上说，是指学习苏联，仿效苏联模式。归结起来，所谓“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这就把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混同了起来，把苏联模式视为各国普遍适用的共同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这就是不正确的了。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各国普遍适用的模式，并非一个中心、一条道路，列宁早就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有一致性、共同性，但是不同的国家是通过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发展道路来体现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根本上说，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如果套用一個统一的公式和固定的模式，必然脱离本国实际而遭受挫折，实践证明是不能成功的。唯有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寓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所谓“走自己的道路”，就是指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摒弃照搬照抄别国模式的错误做法。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照搬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模式，寓社会主义的共性于“有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

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联为鉴戒”，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从总体上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找到了新的实现形式：第一，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和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第三，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在经济格局方面，突破了关起门来搞建设，发展单一的内向型经济的传统格局，确立了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的新格局。

显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这条道路的开创，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持和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自己的道路”，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及预见，毛泽东也未能解决的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9页，第831页。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页，第464页。

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加的。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见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见1953年3月9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1481页，第1471—1473页。

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1955年底毛泽东即提出“以苏联为鉴”的问题，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2页。

(12) (20) (2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8页，第149页，第371—372页。

(1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

(14) 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49页。

(15)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44页。以下引文出此，不另加注。

(16)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17)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18) 补述内容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7—490页。以下引述出此，不另加庄。

(19)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33页。

我国建立公有制 经济的回顾与思考

何敏智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开创了一个伟大的辉煌壮丽的时代。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我们的国家在过去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最近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又取得了巨大成就。“饮水思源”，不由得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本文仅就我国建立公有制经济这个方面，作一些回顾与思考，以资纪念。

一、重温毛泽东关于建立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一些论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日益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也逐步加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所以，《共产党宣言》以一句话概括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要建立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从入党第一天起就为之奋斗终身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比私有制经济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并且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管理的日臻完善而充分发挥：

——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使劳动者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

——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实现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才能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国家才有统一的社会利益和雄厚的物质力量，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和资源配置，适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好重点建设，协调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及时调整供需关系和经济结构，确保经济和社会协调、稳定和较快地发展。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对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很多论述：

1. 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的大无畏气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成竹在胸地孕育着全国解放后如何实现消灭私有制、发展公有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远见卓识，为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和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出光明的未来。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还提出：“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

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为了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就指出：“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国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五年以来，……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国营经济”。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是不要‘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下面‘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现在，人们读到这些论述时，可能感觉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却颤动着人们的心弦，因为这些论述意味着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福州路一带的一些至今犹在的广厦洋楼，也就是殖民主义者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那些吮吸中国人民血汗、掠夺中国宝贵资源的场所，以及类似的分布全国各地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工商金融企业，将为人民所拥有，由国家经营；农民也将得到梦寐以求的自己耕种的土地。这对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阳光雨露，洒满人间，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欢欣鼓舞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为人民求解放”的心声，迸发出巨大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激情。

2.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从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新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宏伟设想，这主要体现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把旧中国的资本主义明确划分为两部分，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中国的现代化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还预见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提出了农业和手工业必须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

权”。

——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形态作了描绘：“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哪里是一般理性论文，简直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和决策。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区分和提出的不同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对如何引导个体农业手工业走上集体化道路，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形态的阐述等，都是创造性地从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照抄别国的经验，以致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指引我国建国后顺利地迈开了改造私有制经济、建立公有制经济的步伐，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我们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然感到精连广博，字字珠现，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3.毛泽东的英明，过去有长征途中的扭转乾坤，绕过暗礁，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建国后也依据形势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高屋建瓴地指点迷津。50年代初期，出现了“确立”或“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论调，提出“先搞10年、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和提法。当时笔者在基层，同许多同志一样，认为这种论调和提法是无须置疑的，因为毛泽东本人的一些论述，也一直讲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这种论调和提法由于没有指明当时的前进方向，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割开来。任何事物随时都在发展变化，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当时的形势是，面临全国财经的统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如果不及时指明前进的方向，从“五反”中反映出的问题看，私人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剧同国营经济的矛盾，资产阶级必然会加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欢天喜地分田分地的农民在得到土地后，是重新走向两极分化或者在互助组织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走集体化道路，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对此，毛泽东1953年明确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经他这一指点，全党都受到很大启发，思想豁然开朗。因为谁都知道，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也不可能走别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确定了的，在党领导的整个民主革命进程中也一直坚持，从未动摇过。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经过这样的反思和酝酿，无不对毛泽东的提法心悦诚服。这就有了由毛泽东提出和党中央讨论确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以后我们通常说的“一化三改”）是否正确，后来的实践作了肯定的回答。

二、历史地看待毛泽东建立公有制经济的功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公有制经济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一化三改”这个期间。

一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友好国家的支援，编制和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国民经济要实事求是按比例协调发展，进行全面综合平衡。执行“一五”计划中，在原来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156项工程”为中心，陆续建成一大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须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以基础产业为主的国营企业，使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3.8%。由于国营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在生产关系剧烈变革中，我国工业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5年内，从全国社会总产值结构看，在工农业部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工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农业下降为33.4%，说明已开始改变我国经济以农业为主的情况。从工业总产值内部结构看，在轻重工业都有增长的情况下，重工业的比重上升到45%，轻工业下降到55%，说明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的状况。尤其是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从少到多，有些甚至是从无到有地大幅度增长。如钢，从全国解放时年产15.8万吨猛增到1957年的535万吨，原煤、发电量、原油、水泥、化肥、农药、机床、农业机械等比1952年都成倍、几倍地增长；旧中国不能生产的汽车、飞机等，实现了零点突破，生产出了自己的产品。在“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和一批以基础产业为主的国营企业建成投产的情况下，我国工业化进程面临两个前途：一是继续沿袭苏联模式，照葫芦画瓢，这似乎天经地义；二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但底子薄，又缺乏经验，步履维艰。在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国家又举过手承认苏联是这个“阵营”的头头。如果不跟着它走，几乎近于大逆不道。但毛泽东独具慧眼，看出苏联那一套模式的严重缺陷，坚定而勇敢地选择了后者。我们说，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摆脱共产国际羁绊，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向胜利的转折点，那么，毛泽东高瞻远瞩，在初步总结我国“一五”期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创造性地率先提出了受到全党全国人民高度称赞和热烈拥护的有关政治生活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原则，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非常深远。例如，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要保持重轻农的合理比例，为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从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转变为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不仅使国家进一步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各地方也因地制宜地相继建起了一大批不同规模的地方国营企业，发展了集体经济，可以说像5月的鲜花，在祖国一穷二白的原野上竞相开放。《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引导全国进入独立自主地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有起伏，有波折，发展与调整交替进行，终于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不仅如此，更大的意义还由于我们的国家没有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也就没有在经济上沦为它的附庸，以致在苏联崩溃时我自岿然不动，坚定地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昂首阔步前进，这不能说与毛泽东当时的决断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开辟了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首先，为

了引导农民走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下，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到 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93.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占全部农户总数 87.8%，从而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次，对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农业的形式，根据积极引导、稳定发展的方针，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到 1956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达到全体手工业人员的 91.7%，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坚持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而没有实践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到 1956 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三大改造，1956 年同 1952 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 19.1% 上升到 32.2%，合作社经济由 1.5% 上升到 53.4%，公私合营经济由 0.7% 上升到 7.3%，个体经济由 71.8% 下降到 7.1%，资本主义经济由 6.9% 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 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 56% 上升到 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 26.9% 上升到 32.5%，资本主义工业由 17.1% 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由 42.6% 上升到 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原来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 0.2% 上升到 27.5%，私营商业由 57.2% 下降到 4.2%。这些数字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总之，“一化三改”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的艰难任务”、“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结论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三改”中有没有缺点和偏差？有。“在一九五五年春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这四“过”的缺点，不能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因为对于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出现这些缺点和偏差，毋庸讳言，是党中央的失误，主要是毛泽东的失误，但不是方向性、路线性的失误，而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开创性事业，社会变革又极其广泛深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讲，不

可能完满无缺。何况在马恩著作里，对于公有制应是什么形式和内涵以及应该如何发展变化，并没有讲得一清二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结合中国情况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创举，哪能在实际行动中不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尽管举世公认毛泽东有非凡的雄才大略和过人的远见卓识，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有其不足和失察的一面。就毛泽东一生来看，虽然晚年犯了更大错误，但他的历史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流芳千古的伟大英雄人物中的佼佼者。历史的发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认识事物往往“雏凤清于老凤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对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求全责备；对历史前贤，也不要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情况下随意指点、贬毁。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邓小平为我们树立的光辉的榜样，他说：“三中全会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到1990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全民所有制企业从77.6%下降到54.6%，1991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2.9%；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从22.4%上升到35.6%；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的所有制企业，从无到有地已分别占到4.8%、0.6%、2.3%和2.9%。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也有类似变化。这种变化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造成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越纯越好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逐步适应我国多层次、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取得空前未有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又进一步引起各方面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探讨，见仁见智，观点纷呈。可是，邓小平坚定地多次讲过，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为补充，这对所有制问题的各种议论来讲，真是金石之言，落地有声。这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毛泽东关于建立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照，并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实际来看，可以说既有拨乱反正，又有继承发展；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发展。所谓“拨乱”，就是纠正了毛泽东由于历史局限的一些错误提法，如毛泽东曾批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这“唯一”两字就不大妥当，造成“三大改造”大大超越预想进程，带来大量遗留问题，不得不花很大力气予以纠正。所谓“反正”，就是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曾经提出但没有办或者没有办好的事情办起来。如毛泽东过去就主张，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是允许私人经济存在的，但并没有这样办。1956年底，毛泽东也曾有过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意思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可以允许资本家投资办厂。这在当时，只是

一个思想火花，并没有形成决策。而邓小平的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正好同毛泽东过去的正确主张和这个思想火花相吻合，也可以说是对毛泽东过去的正确主张和这个思想火花的反正。拨乱反正不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而进行的。所谓“继承发展”，这要结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来讲，在所有制问题上，主要有三个问题：

1. 所有制问题是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我们要继承发展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就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现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还应相应地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使它们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换句话说，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水岭。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是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协调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人为地拔苗助长。所谓“主体”，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各种经济成份中要占一定的优势：从全国来讲，不仅公有制经济的总的比重要占得大一些（各地区、各行业可以有所不同），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一些基础产业也应大部分是公有制。随着改革深入，各种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大量涌现，一般来讲，越是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公有股所占比重将会越大。不能把股份制和公有制对立起来，好像搞了股份制就没有了公有制或者就不要公有制。强调“主体”，不是要忽视“补充”，近几年，非公有制经济虽有发展，但目前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还要大力鼓励它们发展，并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法规。“主体”与“补充”不能含糊，不能颠倒，那些露骨地或隐晦地主张全面私有化的论调是极其有害的，是与国际上妄想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势力相呼应的，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和防止，不能让它们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

2.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立的基业，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巩固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脊梁。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要中心环节就是要通过改革，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立起来，关键取决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能否真正转变机制，搞好搞活。道理很简单，如果国有企业都搞不好，还谈得上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都不能转变，还谈得上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这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10多年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难度是相当大的，但不能认为过去在旧体制下的种种弊端是国有企业的痼疾而丧失信心。好在我们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初见成效。当前，尤其要在理顺产权关系上狠下功夫，逐步改变名为国有，实则多头管理与无人负责并存状况，改变国有企业一定是国营（实际是各级政府部门经营）的状况，发展包括承包制、股

份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和管理的实现形式。同时，加快培育市场，理顺价格关系，深化分配制度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系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改革，必将大大促进国有企业转换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求国有企业、城乡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所谓“都进入市场”，不是这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市场，另一种所有制企业不进入市场。不难设想，那是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规的；只有所有企业都进入市场，才能在平等竞争中，逐渐改变长期存在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状况，克服重复布点、盲目发展的“小而全”顽症。所谓“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因为这些年所有制结构虽有变化，不少国有企业也还困难不少，效益不高，但国有企业毕竟仍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仍是基础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可能取代的。

我们纪念毛泽东，缅怀他的历史功绩，要学习他的著作，让毛泽东思想世代传下去。要永远铭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开创的社会主义基业，是来之不易的，要珍惜，要继住开来，发扬光大，这就必须以实际行动不折不扣地、全面正确地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干扰，克服阻力，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1—892页，第10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143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4页，第705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

栾雪飞田克勤

怎样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农业大国特点出发，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此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这一任务，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一）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这一任务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这本是近代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同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一样，同样也没有能力担负起领导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任。这样，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毛泽东适应这一时代要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他的伟大探索。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因为如不这样做，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无巩固的国防，就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就无人民的幸福，就无国家的富强。旧中国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使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据此，1949年3月5日，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了关于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不懈追求，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基础差、起点低的情况下起步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刚刚成立，经济上现代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只有320万吨，发电量只有43亿度。虽然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工业生产已恢复到解放前

最高水平，但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工农业总产值仅 827 亿元，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28%，钢产量仅 135 万吨，棉布每人平均仅约 9 米，至于汽车、飞机、拖拉机、机车车辆、重型和精密机械工业，以及国防工业，则完全没有。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和封锁，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还与我们实际上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面对上述状况，不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仅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广大劳动人民不能摆脱贫困状态，而且也无法巩固人民政权、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为此，毛泽东于 1952 年下半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要将社会主义的中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工业化程度的国家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之后，1954 年 9 月，毛泽东及时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的任务。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除了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四个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完整表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讲到要全面实现这一任务，需要 100 多年时间，并且要分两步进行。毛泽东关于要用长时期，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的提出，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趋向的，是他的中国工业化思想演进的最高阶段。毛泽东这一宝贵思想，至今也不失其指导作用。

（四）借鉴苏联经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究竟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坚持了他一贯倡导走自己的路这一思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开创本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类型供参考：一是欧美式（即传统型）。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和日本，都无例外的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段时间，重工业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代替了轻工业的主导地位；二是苏联式（即追赶型）。它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依靠集中体制具有的高资金和资源动员能力，实行高积累、高投资，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基本上采取了追赶型的战略。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学习苏联的经验，沿用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必要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其理由：从国内环境看，重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集中了一切科学技术成就，同时又是为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而我国重工业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

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可见，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获得改造和发展的技术装备，从而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创造条件。从国际环境看，我们的工业化环境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环境差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注意了发展重工业。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 1953 年开始的。“一五”期间，总的看，执行情况是好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经验，曾一度出现盲目照搬的不良倾向，因此，也暴露一些苏联那样的弊病。毛泽东对此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更忽视农业；片面强调增加积累，忽视群众消费和群众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忽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毛泽东正是在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问题和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中，才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同时提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这里讲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9 年，毛泽东再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将农、轻、重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这一系列论述，从指导思想正确地解决了我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本质内在联系。这些正确的结论，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但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突破，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模式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

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吸取对我国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苏联的经验，既不完全照搬照抄，盲目服从，又注重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从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主要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和社会主义改造， 特别是要和农业合作化同步进行

毛泽东从 1952 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就明确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中国人民面临着两项互为条件的任务，即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的必要保证。因为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能迅速地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从而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准备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他认为，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改变私有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否则，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不仅得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大力支持，而且还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发生种种矛盾，以至于对社会主义整个建设事业产生消极和破坏影响。

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孤立地去开展。这是毛泽东建立在对我国国情正确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这是因为，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生产的水平还很低，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求却在逐步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产量低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如拖拉机、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农用煤油和电力等等，在发展上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因此，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上述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部分能源等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大量被使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手段上，采取的是剥夺剥夺者的政策，即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用暴力没收、驱逐、甚至肉体上消灭的手段来实现积累。对广大农民征收“超额税”或“贡税”的办法，来加快其工业化速度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对资产阶级则是实行和平赎买，由限制富农到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而实行积累的。这既减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阻力，又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既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其他行业的协调发展，又避免了出现经济震荡和经济危机。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又一重要贡献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反复论述发展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辩证关系的同时，还一再强调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一步将农、轻、重的关系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必须合理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

略绝对化，从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是正确的，是符合苏联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优先增长的观点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问题在于，苏联后来把这一思想加以绝对化，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致使人民必需的日用消费品非常奇缺。

我们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在发展重工业生产的同时，注意抓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日用商品，同时物价和货币也是稳定的。“一五”期间，我们比较重视农业的作用，也比较注重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农业总产值 4.5%，轻工业总产值 12.9%，重工业总产值 25.4%。这种情况说明“一五”时期重工业发展很快，是完全必要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也不慢，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又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因此，这一时期农、轻、重比例关系是基本协调的。

毛泽东讲的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其含义是：国家制定计划时，必须首先安排农业的发展，在分配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时，也应首先安排农业，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同样，在安排重工业同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机器、化肥、农药、建筑、材料、燃料动力、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是为农业、轻工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并非是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

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轻工业放在重工业之前，丝毫不意味着重工业就不优先发展。毛泽东认为重工业仍然是为重的。他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可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动力不再被挤掉。

毛泽东对农、轻、重关系所作的科学分析，不仅正确地解决了苏联所没有解决好的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理论。

（三）合理调整工业布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是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理论探索时，强调的又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谈到工业布局问题，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我国的工业布局过去多集中在沿海，据 1952 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0% 左右，内地占 30% 左右，钢铁工业约有 80% 分布在沿海，特别集中的是辽宁的鞍山。而铁矿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南、西北和华中，当时钢铁工业基础都很薄弱。纺织工业 80% 的纱锭和 90% 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其中主要部分又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少数几个工业城市，而在各主要产棉区，近代化的纺织工业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反映，是历史造成的极不平衡状态。

针对上述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毛泽东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还把这

一问题提到“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高度来强调。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党和国家将“一五”期间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多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建工业这样做的布局，主要考虑三个因素：（1）资源利用。钢铁厂、有色金属冶炼厂、化工企业，主要摆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供应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企业，主要摆在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附近。如，在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同时，把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摆在了东北地区。长春汽车城，沈阳飞机城，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加工基地，就是按上述精神安排的。（2）改变落后地区经济面貌。在落后地区摆一些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3）军事上的需要。在开始编制“一五”计划时，当时朝鲜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新的工业企业放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没有摆到沿海地区。

毛泽东提出加强内地工业同时，还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者底子，可以使我们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1）如果只是在内地布点设厂，忽视加强沿海工业基地的建设，就会与预期的愿望不合，甚至适得其反，拖延我们工业化的速度。在毛泽东这些正确理论指导下，“一五”期间的工业布局是合理的。主要表现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发生了变化，1957年内地所占比重上升为49.7%，沿海地区则下降为41.6%，内地工业随着国家投资比重的提高有了很大发展，沿海地区的投资虽在下降，但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有利于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其主要标志是：自力更生为主，工业门类基本齐全，一方面能够生产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能够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各种消费品。另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有了初步基础，而且在一些方面已经现代化了。

（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必须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五点：

一是要勇于放下架子。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强调：“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

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是发扬和创造本民族的东西，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的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学习外国的东西，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的独特的新东西。这样道理才讲得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四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在谈到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时，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学习原则，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不正确态度，指出：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五是要吸引和利用外资。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吸引外资的问题。他说，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关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思想不仅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从客观上说，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不允许，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12）第二，从主观上看，当时的对外经济交往，还仅限于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对于吸引外国资金，缺乏必要的认识。同时，后来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的干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突破了苏联工业化的模式，为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的的影响，有些好的想法在实践中也未能贯彻始终，但是，我们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驱者，他的探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十分重视和珍惜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思想，对怎样实现包括工业现代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特点是：“十

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13）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进行的包括工业现代化任务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我们过去进行的革命一样，仍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重要思想，他强调，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重要”（14）；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学习外国的思想，他提出要打破过去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他强调，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要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15），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城市搞的再漂亮，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也要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把科技教育提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结合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思想。他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这就搞清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指明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方向；他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经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他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实行对外开放，在沿海一些地方兴办经济特区，在一些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不断扩大开放的领域。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之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邓小平倡导，在农村全面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变农村长期单一经营的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农工商综合发展、城乡并举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路子；他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强调现代化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对中国工业化的探索和实践，以新的经验和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认真研究邓小平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卓越贡献，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1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7页。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2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2—723页，第796页，第727—728页，第724页，第72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12）（13）（14）（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2页，第372页，第125—126页，第28，29页。

毛泽东的独特视角： “农业就是工业”

马泉山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发展道路，倾注了很大精力；他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确立了重要思想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文谈谈个人学习体会，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

问题的提出

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有200多年，迄今仍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是每个民族或迟或早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现今欧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工业化，是一条伴生对外抢掠殖民地、对内剥夺农民的血与火的漫长道路。早期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一种新的历史环境中启动工业化，强调从发展重工业开始，依靠内部积累，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战略，尝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斯大林认为不再受奴役的苏联人民有能力积累这笔巨额资金，也无须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而侵害农业利益。他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进而赢得生存空间。不论斯大林的逻辑可能有怎样合理的解释，他的这种发展政策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重工业过度投资诱导他依旧走上被他自己否定的道路。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设想效法苏联可能走捷径，但是不久便发现此路不通。较早疑问的当推毛泽东。50年代中期，他曾把目光从社会革命方面移向经济建设，拨冗研究怎样加快发展。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的撞击，促使毛泽东形成“以苏为鉴”的理性认识，提出必须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走独辟蹊径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从50年代初提“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其间包括怎样丰富的历史内涵啊！

1956年4月，在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痛感苏联按斯大林的理论搞工业化不成功，为了发展重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以致于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点上中国不象有些国家亦步亦趋，中国一般重视农业、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重、轻工业投资比例为九比一，中国八比一，中国市场供应远比苏联好。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认为需要适当调整农、轻、重工业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他说，这样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1957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里又一次强调发展农业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大家重视农业，工业部门要面向农业。他在这次讲话里提出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奇特命题。

同年2月，他在另一次讲话里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概括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提出：中国是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毛泽东计算，苏联从年产 400 万吨钢发展到 1800 万吨用 21 年时间，中国如果用同样时间达到这样的水平就将比它快，因为中国原来钢的年产量不到 100 万吨，起点比它低。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办法就是不要像苏联那样对农民“竭泽而渔”，而是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奇特的经济学命题

支持毛泽东作出“农业就是工业”的判断不仅在于中国是大农业国，也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至少他研究了美国的经验。在他看来，美国资本主义所以发展快，得益于没有封建主义，有利于农业发展，有利于工业获得充裕资源和广阔市场。英伦三岛和旧欧洲大陆都曾经受封建主义羁绊，城乡资源流动困难，农业的凋蔽更成为发展近代工业的障碍。这里的资本主义比北美发育早，但美国后来居上。农业转化为工业的事实近现代经济史随处可见。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前提之一，把社会总资本从实物形态上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揭示二者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实现物质转换（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通常被认为近似反映这种关系）。列宁在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后认为“那一定是生产资料比消费品增长得快”。斯大林肯定社会主义在扩大再生产下同样存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他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及相应实施重工业超常增长政策也因此获得支持。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这一经济规律，今人已有异议。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不落窠臼，从另一视角提出问题。他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此”

毛泽东的论据是：

农业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和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农业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将以农村为销售对象，电力、煤炭、石油等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将销往农村，公共设施中的一部分必须供应农村需要，如此等等；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毛泽东于是得出结论：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

这是前人不曾提出的命题，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社会生产两大主要部门中毛泽东对于农业作为工业母体作用的强调一扫传统看法，把中国农民在建设时期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几亿农民不仅是工业化的忠实支持者，而且是积极参与者；农业不仅支撑工业，而且孕育着工业，

转化为工业。随后，在毛泽东热情倡导下破土而出的农村工业，进一步把中国农民推向工业化的前台，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变得更加便捷，更为直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它曾经有怎样的艰难，今天它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更加充实了“农业就是工业”这一命题的内容。

“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对于轻、重工业部门又有不同情况。农业与轻工业联系密切而且直接，与重工业并不都直接联系，许多情况下须以轻工业为中介。轻工业直接消费农业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甚至重工业由农业供给的消费资料及某些农产品原料也需要经过轻工业部门加工制作，以致于轻工业的一部分可以看作农业生产过程的延伸。轻工业产品中一大部分，则必须返销农村供农民消费，供给重工业的产品则是为交换所需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以便彼此能够继续生产。轻工业在农业与重工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内含轻工业的特殊作用。毛泽东把中国工业化道路归结为主要指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真想快一些发展重工业必须同时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很有道理的。

毛泽东根据经济史经验概括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深思熟虑的选择是实行后一种办法比较有利。他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是战略家的目光。前一种办法从一个较短时期观察，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斯大林的工业化实践曾经有过这种效应；但进一步观察则是潜伏着它的反面。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到头来又会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掉下来。所以毛泽东说几十年后算总帐划不来，而且基础不稳固，将贻害无穷。看来，这个饱含丰富经济政治内容的辩证法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实践家没有注意到，他们更不可能料到今天结出的苦果。历史的悲剧验证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

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

毛泽东富于个性的工业化理论，决定了欲取先予的政策取向，显示与传统思想相悖的逆向思考。

例一：保证两个积累。

毛泽东摒弃斯大林“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区分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和为农业自身的积累，实行保证两个积累而不是只有前一个积累的政策。他说：“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苏联的办法只要前一个积累。从1933年到1957年的长时期国家对农产品一方面高征购，另一方面低价格，把农业生产总值的40%以上聚敛自己手里支持发展重工业，农民不堪重负，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有一个材料说，1933年以前的农产品征购政策几乎把农民生产的产品全部拿走，在卢布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贬值20%的情况下，付

给农民的粮价竟然比那时低两倍。农民为此反抗的结果，造成 1932—1933 年冬季大饥荒。后来虽有调整，却未能改变损农伤农的基本格局。毛泽东讽喻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经济史表明：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几乎是工业化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政策。美国自 1810 年工业化起步至 1890 年工业份额在工农业结构中占居优势地位止，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长达 80 年左右。日本国上述过程持续 40 年左右。此后，出现工业积累向农业回流，进入以工养（补）农时期（11）。

进一步研究显示：即使排除工业化时期人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由于工业部门显著优越于农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条件也会导致农业利益向工业的流失。历史地看，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第一，它有利于工业基础的建立；第二，它客观上将推动本部门向近现代化的转变。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政策实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使保持在农业可承受的限度。

新中国建立后视政治经济状况有步骤地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差，调节工农利益，协调城乡发展。1956 年匡算，国家从农业征税约为农业总产值 8%，从工农业产品比价差中取得的部分不超过 12%，合计大约 20%，不及苏联（45%）的一半。旧中国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最小的时期为 1930—1936 年，此后逐渐扩大，1949 年达到最高峰。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即 1950 年时的工农业产品比价差比 1930—1936 年仍高出 34.4%，到 1958 年二者缩小了 38%，已低于那时（12），与此同时，农业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即使如此，农业发展滞后仍使毛泽东不安。1956 年同 1952 年相比，重工业增长 162.3%，轻工业增长 104.9%，农业增长 20.5%。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由于供求缺口过大已实行统购统销，其他农副业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料的轻纺工业产品也日益短缺。要多发展农业除适当增加国家投入，主要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先让农业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办工业下明白这个道理，取之无度，工业也难以继。

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计算成本，进行经济核算；要研究价格政策，利用价值法则发展商品粮生产，虽然并不是提倡就普遍涨价，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谷物没有利润，卖粮食不赚钱，不会有人干。

当时，也有较为偏激的意见，不对城乡和工农的现实差别作具体分析，离开发展生产单纯要国家拿钱改善农民生活，毛泽东认为也不可取。他坚持农业自身的积累和为工业化的积累都有必要，都应该保证。究竟二者比例如何，他期待积累经验，也希望经济部门研究。

例二：兼顾积累和消费。

同斯大林抑制消费的高积累政策不同，毛泽东重视消费的作用，主张实行兼顾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政策，以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研究再生产的又一前提，将社会总资本从价值形态上区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即 $c+v+m$ 。两大部类的交换实际是 $I(v+m)$ 同 IIc 的互换。只有在它们相等的情况下，才可能既顺利实现物质转换又得到充分价值补偿，以便再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把公式 $I(v+m) = IIc$ 视为再生产理论的基础原理是非常正确的，扩大再生产归根到底也不能违背它，否则迟早会受到惩罚。

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中经常依靠牺牲人民消费多积累，以扩大生产特别

是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收到成效。列宁曾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13）。但他同时又认为“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14）。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曾经反复出现另一经济现象——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列宁在讲到上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持谨慎态度，加了限制词语。斯大林在选择有限的历史空间要人民束紧腰带建立苏联工业化基础的做法，尽管可以被解释为对上述规律的某种应用，他也仍然不能避免承受生产与需要严重脱节的灾难性后果。据统计，苏联在1917—1950年间甲类工业（生产资料）增长39倍，乙类工业（消费资料）增长9.2倍，农业仅增长1.8倍（15），近乎停滞，其中粮食、马匹、猪、牛、羊的产量比1917年以前的水平反而下降（16）。苏联食品供应长期不足，日用消费品极为匮乏，而且品种单调，款式陈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人民积怨甚多。东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做法严重破坏本国经济平衡，以致引发社会政治危机。毛泽东严重注意到这一事实，警告中国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方针是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统筹兼顾。

毛泽东确立的原则是：一方面提倡长期艰苦奋斗，使国家有积累；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在发展生产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例如随经济发展适当调整工人工资；在正常年景下多数农民能增加收入，不能增加的尽量不使减少，即使减少的也要及早想办法，等等，总之，使人民在增加生产中得到好处，从国家发展中看到希望，从而把国家建设当做自己的事业。

例三：先安排轻工业农业再安排重工业。

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1956年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挤了当年生产，市场供应较为紧张，人民生活诸多不便。为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问题，寻找制约建设规模的办法成为经济工作关注的目标。毛泽东在听取各种意见的同时，继续自己的思考，认为沿用苏联那种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可能是问题所在，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说那个安排就是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其次，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给轻工业和农业多少钱和物要看保重工业以后有没有剩余和剩余多少，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当然不容易保证。所以，他提出今后要采取另一种方法，先搞轻工业和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解释先搞轻工业、农业，是指首先保证它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在整个投资中重工业仍是居多数，即使把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到七比一甚至六比一，重工业也还是多数，就是说，轻工业和农业也并不是可以下受制约。但是，按毛泽东颠倒过来的办法安排国民经济，轻工业和农业才可能不被挤掉，人民消费才有保证。

在一个时期里，先安排轻工业和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及后来发展力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原则，曾被局限在计划程序的范围，未能穷毛泽东的深意。这也许是由于毛泽东仍旧使用的几种提法容易造成错觉的缘故。例如他在谈到重工业时继续说它仍然是建设的“重点”或“中心”，“必须

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等等。然而，究其实，“但”字文章已改变了传统提法的内容，他真正强调的是重工业与整个工业对于农业的依存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7）他独树一帜的方针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8）。所谓重工业仍然是“重点”或“中心”余留的意义，如他本人所说主要是指重工业在整个投资比例中也还是“多数”，并不因为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有所改变。从总体观察，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19）。

毛泽东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农业。中国独特的国情，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农业本身特点衍生的特殊要求，使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这样提出问题。建国后，他一向直接过问农业，各级领导也都以足够大的精力抓农业，农业在事实上成为工作重点之一。50年代中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农业提到关系工业化速度快慢的突出位置，唤起人们把注重发展重工业的热情首先用在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上，不能不说是哲人的卓识远见。

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

毛泽东一生重视农民问题，他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令人惋惜的是，他的晚年又将目光从经济建设移开而未能继续这一探索，已有的思想也由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曲折而未能很好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道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并首先从农村做起，振兴农业，进而推动城市改革，带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振兴。几年功夫，成效大见。1984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平均每年增加1709万吨，增幅之大前所未有的。据抽样调查，农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比1978年增长197.6%，增加额为264元；农民支出中用于生活消费部分增长173.5%，增加额为201.36元，也属空前（20）。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果然刺激了工业与城市经济。以1983年为基期，198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82%，平均每年增长2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42.18%，平均每年增长19.9%（21）。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良性互动，极富生机。毛泽东关于“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很好地贯彻，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改革开放也发展了“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拓宽了工业发展的道路。中国工业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国外资源；在继续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市场，全方位参加世界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工业化与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据统计：1979—1992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到988.3亿美元，199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1656.1亿美元，其中出口由97.5亿美元增加到850亿美元，进口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806.1亿美元。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69.9%，平均每年增长14.5%（22）。中国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正以自己的成就证明：这是一条加快发展的道路。

但是，农业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农业就是工业”的命题仍具强烈现实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愈来愈以其丰富的资源与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

固然首先属意于 2 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了 9 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而且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1984—1988 年工业大发展是这一事实的正面说明，近年许多工业产品滞销现象则是其反面说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重视并善于利用包括农村资源在内的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重视并善于利用以农村市场为主体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研究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转换规律，学会驾驭的本领，是有待今后解决的新课题。继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认识，加快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将是今人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0 页、741 页，第 722 页，第 796、797 页，第 722 页，第 722—723 页，第 721 页，第 796 页，第 722 页。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1 月）《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64 页。（以下该版引文只注明《全集》页码。）

《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8 月第 1 版，第 636 页。

张一凡：《苏联的计划配给》，中华书局 1947 年 7 月初版，第 99 页。

李微、冯海发：《农业剩余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中国农村经济》1993 年第 3 期。

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毕宝德：《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 年第 2 期。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36 页。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65 页。

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 1979 年 8 月第 1 版，第 6 页。

王金存：《苏联经济的调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 页。

分别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5、364、312、315、57、31、647、

论毛泽东重视和 发展农业的思想

黎青平

—

毛泽东历来重视农业生产。早在 1934 年，他曾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建国以后，从我国实际出发，毛泽东提出并确立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自己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1959 年他曾这样说：“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为了不使农业因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到影响，他还在 1956 年提出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与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无关系。1953 年下半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毛泽东开始把注意力由农业转向工业，并要求各级领导工作重心都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到工业建设方面来”，特别是第一书记“要编到工业方面”。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这时已不重视农业了，相反，他一再提醒不能因为抓工业，抓钢铁而丢掉了农业。他说：“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有人负责，搞不好不行。”又说：“搞农业的需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告诫没有被接受，结果当工业高潮掀起后，农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有鉴于此，从 50 年代末起，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等著名论断，并在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显然，毛泽东注意力又从工业回归到了农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于搞阶级斗争，但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心仍不亚于工业。

毛泽东如此重视农业，不排除有感情因素的作用，但主要来源于他对农业重要性的理性思考。毛泽东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农业关系到社会稳定。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由于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社会不可能稳定，所以，农业对整个社会稳定关系极大。毛泽东指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性农产品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治，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村这样，城市也如此。因为“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解决城市和矿区的吃饭问题，从而保证城市的稳定。因此，要争取粮食丰收以“稳定人心。”毛泽东指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而“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2. 农业关系到工业发展。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首先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其次，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是为农

业服务。第三，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要工业化就要搞农业。

3. 农业关系到国防巩固。毛泽东认为，我国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 而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发展农业。他指出：“人民和军队得总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原料，保证军队的需要，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充足的物资贮备。毛泽东说“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

4. 农业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毛泽东认为，农业特别是粮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农业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否则，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他以苏联、东欧和我国为例说，苏联、东欧之所以“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生活受影响，在于他们“忽视农业”，而我国之所以“民生、日用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在于我们发展了农业。因此，他得出结论，只要我国农业有较大发展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

综上所述，高度重视农业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那么，他这种“重农”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呢？

1. 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是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由于农业与人的吃穿住密切相关，因此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对于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毛泽东多次引用和阐述。1939年毛泽东在讲到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讲一点大米、小米、养牛、喂猪等东西时指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喂牛、养猪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1957年底，为了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毛泽东又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说：“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农业重要性的某些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也非常相似，比如列宁曾提出“农业是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毛泽东则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仅仅二字之差。可见，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

2. 吸收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精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素有重农的传统。史书中的“食为政首”，“地者、政之本也”，“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的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俗语，都是这一传统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生长于此氛围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可能产生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不仅出身农民，对农民有较深感情，而且诸熟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文化精华，他重视农业受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是可能的。

3. 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毛泽东重视农业还来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具体讲，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是他认识到农业特别是粮食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在粮食生产的盲目乐观情绪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 1959年他又告诫全党：“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除了人多外，

人口结构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也是毛泽东认识到农民和农业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认为，“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的任务。” 4.借鉴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对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他多次讲到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譬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视了，以致于他们的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并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指出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的失误，目的是要引以为戒，提高全党重视农业的意识。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由于吸取了苏联、东欧国家在农业上失误的教训，本来就重视农业的毛泽东更加把农业放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位置。

二

重视农业，目的是要发展农业。尽管毛泽东在如何发展农业问题上不很成功，但他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关于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如何安排农、轻、重三者的次序，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前提。建国初期我国照搬苏联经验，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毛泽东总结过去经验教训，提出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有很好执行。现在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所谓农轻重，就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安排轻工业，然后安排重工业。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样做，是否不以重工业为重点呢？毛泽东认为不是。因为首先安排农业不是以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说。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物资的分配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重点。但这样安排可以保证农业发展的资金、物资、劳力不被挤掉，因而是必要的。毛泽东认为，是以农轻重次序还是重轻农次序，这不仅是计划工作的方法问题，而且是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到是否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明确与否的大问题。

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很重视粮食生产，认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农业只要搞粮食就行了。毛泽东指出：“搞生产不要单去突击一项，要多样些。” 主要是种粮食，也要搞其他东西，要多种经营。从农业内部讲，“要努力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十二项生产。” 从农业外部讲，“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必须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做到五业并举，全面发展。” 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农、林、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依赖的道理。” 由于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毛泽东在多种经营问题上很注意因地制宜。他指出，“各地不同，不能每一

个县都一个模范。”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就不能都去种甘蔗、茶，“要因地制宜”。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在五六十年代有很多论述，主要观点是：（1）发展商品经济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是有本质差别。”（2）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毛泽东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比如我国1957年生产了3700亿斤粮食，而商品粮只800—900亿斤。因此，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3）商品生产是关系到团结农民的大问题。针对一些人要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想法，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剥夺农民”，就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4）发展商品生产对工人农民都有利。毛泽东指出：如果公社不搞商品生产、交换，那么工人就没有饭吃，农民就没有衣穿，就得不到拖拉机农业生产资料，就没有货币收入。（5）商品生产在我国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认为“只要还有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关于关心和维护农民经济利益的思想。毛泽东很关心农民的经济利益，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凡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关键是处理好国家积累、农民集体积累和农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首先，国家要积累，要向农村集体征购、派购一部分农副产品，但不能过多。如果过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毛泽东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作法，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其次，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丰收年积累可多一点，但也不能太多”，“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总之，要“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另外，同农民打交道，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能搞无偿调拨，也不能因为价格不合理而损害农民利益。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缩小它，要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以使在处理工农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尽可能不使农民吃亏。

关于农村技术改造和农业科技推广的思想。毛泽东很重视农业技术改造，特别是农具改造，认为“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要求把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在推广农具改造方法上，毛泽东提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技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各种农具，进行比较，通过试验加以改进，试制出新式农具。试制出来后在田里实试，确有成效，然后再大批制造，加以推广。在重视农具改造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农业科技的进步。他总结农民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有指导性的意见。在肥料方面，提出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与无机肥结合的方针。他说，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因为每年还不能生产多少化肥，而且提了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也要有，但如果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

硬化。在土壤方面，他提出以深为中心的改良土壤的建议。他说：“一切农业合作社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良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并指出：“土壤改良主要是深翻、调换。” 在水利方面，他提出修水利以蓄水为主，治水与改土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对有水土冲刷的地区，他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办法是把山水田林综合治理，不能只抓治水不抓改土。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发展农业方面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那为什么过去我国农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呢？这很值得深思。就毛泽东上述思想而言，一是有的思想不完善、有缺陷。比如毛泽东提倡的农村多种经营主要是集体的多种经营，对农民家庭的多种经营虽然有时有某种允许，但基本是限制的。又如毛泽东曾主张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但他的商品经济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不让市场直接对生产发挥作用。二是有的思想有矛盾或前后不一致。例如，毛泽东曾说要把农林牧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但他同时又要求以粮为纲；他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但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三是有的思想提出来没有很好实行。毛泽东的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就是这样。1962年毛泽东这样说：“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没有实行。” 1962年以后也有这种情况。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中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我以为，还与毛泽东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几个误区有关。

误区之一，农业机械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条件”。

农业机械化，即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这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过程在我国迟早要发生。但是，在当时我国农村，机械化不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农业合作化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后，如果不及时解决农村经营体制问题，农业发展仍会受到束缚。另一方面，实现机械化要受诸如采用机器的愿望、农村的富裕程度、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状况等许多条件制约和推动，这些条件在当时并不具备。然而毛泽东没看到这些，而是一味强调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用机械装备农业是使农林牧大发展的“决定条件”。并认为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可以很快实现，提出7年，争取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由于脱离实际地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当时迫切要解决的任务，结果一方面使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农村经营体制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另一方面使科学技术这一实际上比机器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因素被忽视掉了。而当以上两个后果出现后，我国农业踟躇不前就成为必然。

误区之二，只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变革了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然而毛泽东却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他明确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

为什么要改变生产关系，就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呢？毛泽东的逻辑是，农业的发展要靠机械化，而机械化是与大规模经营连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就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而要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就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正是在上述思想和逻辑支配下。1955年初级社刚建不久，毛泽东就要求办大社。认为“小社人少地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结果，社的规模一下子

由几十户发展到一二百户。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在高级社建立不久，又很快把高级社发展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本来，合作化后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生产关系落后生产力，因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结果本来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变得更加不适应了，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三，以运动形式搞农业是“迅速有效”的办法。

毛泽东发展农业的一个基本办法，就是搞群众运动。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又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毛泽东热衷于搞群众运动，不仅因为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是坚持群众路线，符合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而且他认为搞群众运动更有利于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粮食。”搞群众运动之所以有利于生产发展，是因为只有搞群众运动，才能激发群众的干劲，创造1天等于20年奇迹。毛泽东说群众“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但是要把由于运动激发出来的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毛泽东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因此，群众运动又必然是和大鸣大放、大辩论、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运动。用搞政治运动办法搞农业，这是把过去搞革命的方法运用于搞建设。由于这种方法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它不仅达不到使农业跃进的目的，相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三

尽管毛泽东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存在的以上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玉，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不失为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的思想对于我国今天农业现代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探索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1. 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思想现在是否还适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新时期党对农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新时期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邓小平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为了发展农业，我们党在农村建立了生产责任制，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中央关于要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变。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中央针对一些地方产生的忽视农业的苗头，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江泽民指出，“农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战略作用，永远忽视不得，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中央对农业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经说明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在新时期仍没有过时。

新时期党中央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不是因为毛泽东过去是这样做的而

教条地模仿，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农业的发展。首先，从现代化的内涵讲，我国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方面，也就是说，发展农业是现代化的本身要求，没有农业现代化的现代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其次，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讲，现代化建设固然重视工业发展，但工业化离开农业的支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经说，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因为工业所需要原料、资金、劳力、产品销售市场都要靠农村。毛泽东这一结论在今天仍然适用，因为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今天也仍然存在。正如江泽民所说：“没有农业的积累和支持，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发展。”（52）因此，“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53）再次，从现代化的外部条件讲，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现代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而中国要稳定，首先农村要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54）而要稳定农业，就要重视农业发展。邓小平指出：“九十年代如果中国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55），这是十分深刻的。

进一步讲，不仅现在应该重视农业，就是将来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能忽视农业。美国哈佛大学 1949 年出版的该校优秀著作奖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书这样写道：“一个国家，不论已经高度工业化到何种程度，若不能同时在国内的农业和工业之间，维持一种适当的及变动的平衡，或者经由输出和输入，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则一定不能持续并发展其经济活动。”（56）事实也是这样，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对农业仍很重视，认为它是保持经济兴旺的重要力量。为了保持农业与工业的平衡，一些国家对农业还采取了资助政策。这些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与农业的支持不无关系。

一些人忽视农业有一个原因，即他们看到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一些地方出现卖粮难，以为我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江泽民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不能说粮食已经过关了”，“不但九十年代不能说这个话，而且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代也不能轻易说这个话。”（57）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我国对粮食的消费会越来越大。据预测到 2000 年我国人口将净增 2 亿，按人均年平均消费 400 公斤计算，需增加粮食 800 亿斤。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减少，今后我国农业生产难有大的增长。目前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 5.6 万亩，到 2000 年，人均耕地面积降为 1.4 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0.6 亩（58）。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我国粮食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既然粮食在相当长时间不能说过关，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农业。

2. 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重视农业的思想没有过时，那么毛泽东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是不是还有指导作用呢？这是研究毛泽东农业思想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解决农业经营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毛泽东没有解决，这是我国农业长期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但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发展农业的思想在今天完全不适用。因为在解决了经营体制之后，农业还有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解决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中国农业应该如何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59）这是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个结论是全新的，但其渊源来自毛泽东的农业思想。具体讲，在靠政策方面，虽然在毛泽东的发展农业思想中找不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但他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关心维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党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首要出发点”（6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党的农村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有一条经验，首先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61），在靠科学方面，虽然毛泽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明确提“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要靠尖端技术”（62），但毛泽东提出的进行农技改造，推广农业科技的主张体现了这一思想，因而也有指导作用。

除了上述从总的方面提出“两靠”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还从具体方面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战略思想。比如，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认为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指出“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63）又如强调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指出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64）再如，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认为它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65）“是振兴我国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66）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发展，它对毛泽东农业发展思想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曾经有过大量论述，只是后来违背了这些思想而已。因此，今天强调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际是对毛泽东过去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对发展多种经营问题，毛泽东则一直是提倡的。当然，他提倡的多种经营在其主体和内容方面不能和今天相比，但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发展乡镇企业问题，毛泽东也提出过试验过，并且预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67）这对我们今天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诚然，在发展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有过一些失误。但即使是失误，只要认真总结，也可以得到有益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批判“三自一包”、限制家庭多种经营，限制商品经济等，原因是他从马克思主义抽象原则出发，认为这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能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又如，毛泽东不断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他认为这样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失误中我们得到以下启示：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革生产关系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超越阶段把社会主义高级阶级的某些做法在现阶段来实行。再如，从毛泽东采取搞运动办法搞农业，造成人力物力巨大浪费的失误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教训：搞经济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凭主观意志，也不能用过去搞革命的办法来搞建设。此外，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如在高级社后搞国营农场，想短期内实现机械化，限制商品经济等，与他搬用苏联经验有关。这又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性。总之，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过程中有很多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教训，提供了新思想、新政策如何建构的基因。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之所以能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就是由于认真总结了过去农村工作中的失误的结果。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各种政策称之为“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便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代价不是白付的，没有毛泽东在探索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就不会有今天的农业上的大彻大悟，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农村方针政策。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1页。1959年2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14）1958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33）（34）（34）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29）（30）（45）（46）《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1960年4月1日，1960年8月2日，1964年10月1日，1958年10月4日。

（11）（12）（15）（15）（16）（23）（24）（26）（36）（37）（38）（4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0页，第360页，第361页，第72页，第269页，第268页，第379页，第400页，第267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80页，第257页。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13）1966年3月12日《关于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页。（18）转引自《党史研究》1992年第6期石仲泉的文章。（19）（43）（43）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20）《列宁全集》第14卷，第177页。（21）1957年3月20日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讲话。（22）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25）1960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27）在庐山会议前的讲话。（28）《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31）《红旗》1978年第9期。（32）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39）（40）（47）（48）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41）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42）1959年10月《党内通信》。（50）（53）（54）（59）（61）（62）转引自《人民日报》1993年2月22日孙文盛文章。（51）（52）（57）《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8日。（55）江泽民纵论天下大事《江西日报》1993年9月9日。（56）张培刚《农业工业化问题》第57页。（58）《江西日报》1993年3月14日。（60）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63）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通知》。（64）（65）1984年3月1日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开创社会企业新局面的报告》。（66）1985年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67）转引1967年12月20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

张毅

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都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失时机地先后实现了工业由手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过渡，实现了劳动力以农业就业为主向以二、三产业就业为主的过渡，实现了人口居住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集中为主的过渡，实现了国家经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走出了工业和人口城市化的道路，成为各国实现工业化的普遍规律。为了使中国富强不受欺凌，使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使政权巩固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使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富裕有物质保障，毛泽东从来都是坚持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

一、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毛泽东 1944 年 8 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还说：“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5 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1949 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二、农民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

全国解放以后，在“一穷二白”的具体国情下，如何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和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说：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种探索中不断恢复和发展。到 1956 年全国工业产值达到 642 亿元，比 1949 年 140 亿元增长 3.5 倍。但按人均占有来说，仅 120 元，在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仅占 39.2%，在劳动就业中从事农业的占 8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 51.3%，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61 年毛泽东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读书笔记中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 70% 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

我国在 1957 年以前的国家工业化中，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发展国有工业，而国有工业的发展，又集中于中央工业的发展，根据 1952 年和 1957 年的统计，在整个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从占 41.5% 提高到 53.8%，公私合营企业由占 4% 增加到占 26.3%，这种公私合营随后都变为国有企业，两项合计由占 45.5% 提高到 80.2%；集体工业由占 3.3% 提高到占 19.1%，这种工业主要是城市二轻，后基本变为第二国有企业；这就是说 99.2% 是国有工

业。私营工业由占 30.6% 下降到只占 0.1%，个体工业由占 20.6% 下降到仅占 0.7%。在这一工业化中，毛泽东把农民放在工业化的一个从属地位，而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把他们当做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对待。（1）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劳动力的来源。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毛泽东 1956 年说：“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3）他把农民当作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者。毛泽东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但对农村的剩余劳力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毛泽东仍认为要靠农村自己解决。他说：“农村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

三、要加快工业发展速度

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在以下思想促使下，逐渐形成要加快经济发展的决策。这些思想是：一是毛泽东从为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摆脱落后考虑。1955 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中国要造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又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956 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讲话中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了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如果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二是毛泽东从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考虑。1957 年毛泽东在苏联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说：“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为了“东风压倒西风”，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毛泽东首次向赫鲁晓夫提出：“看了卫星上天消息后，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十年赶上美国，我们十五年赶上英国。”三是毛泽东从中国要真正独立，不依赖外国考虑。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

通过阴谋手段篡夺领导权，种种迹象使毛泽东预感到，“苏联领导人正在变成与资本主义世界联手反华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敌人希望我们永远穷，就是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哟！我们还要走得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要赢得时间。像老太太那样一步一步扭不行，像一般人那样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赛跑步那样，非鼓足干劲不可”。四是毛泽东从怎样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的日子考虑。据李银桥回忆：1957年警卫队一位战士回家探亲回队，带回了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他向毛泽东说：我家乡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种窝头。毛泽东眼圈红了，手抖着接过窝头，一边分给大家和自己吃，一边说：“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他思考着说：“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解放么”。“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就是在这诸多因素的促动下，使毛泽东考虑到要加快经济发展，要加快中国工业化步伐，而原来仅靠国有企业一个积极性，难以实现这一目的，这就使毛泽东作出了在发展中央办工业同时，积极发展地方工业的重大决策。

四、要发展地方工业和社办工业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他说：“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规划”。这就是说要使地方工业产值在几乎是零的基础上，经过10年发展，达到上千亿元产值。会后，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和自治区尽快使本地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同时在意见中指出：“在干部中应该提倡，既要学会办社，又要学会办厂。”“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第一次提出“社办工业”这一概念。此文件在成都会议被通过，随后又经政治局会议通过正式下达执行。这一目标提出以后，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同时指出：“农业社也可办加工业，”他说：“大社可办一些加工厂，最好由乡办，或几个乡镇台办”。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讲话说，南宁会议要求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这个纲一提出来，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工业发展的总方针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实行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毛泽东说：苏联“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根据陈伯达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文章所说，毛泽东在1958年初曾设想过：“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的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个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五、要实现农村工业化

关于社办工业，毛泽东说：“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我国“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还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这一指导思想的大转变，为社办工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人民公社的发展，从组织形式上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保障。自毛泽东 1958 年 8 月在河北、河南、山东视察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特别是八月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大潮中，社办工业有了一个较快发展，正像中央决定中所指出的：“成千成万的小工厂在农村中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了起来。”

	企业数（万个）	产值（亿元）
1958 年末	602	62.5
1959 年 5 月	87	73.4
1959 年末	70	100.0

但农村工业化这一概念、命题、任务的提出，最早见于 1958 年 11 月。1958 年 11 月毛泽东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 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1）。11 月 10 日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建议的修改和文件》中写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13）。同年 11 月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中写道：“不完成两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不能废除商品交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于 12 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广泛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它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当时提出农村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除了加快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工业化步伐，增加农民收入以外，也与当时急于过渡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曾说：“实现公社工业化，可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13）。

六、对农村工业化的设计

为了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毛泽东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一些文件都作了明确说明和规定：

（1）要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泽东说：“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十三，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

们的国家就象个样子了”。

(2) 社办工业生产方向。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

(3) 社办工业生产方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生产技术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械工业相结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

(4) 社办工业要发展轻重工业生产。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要“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

(5) 公社工业发展靠自己积累加上国家的扶持。毛泽东说：“公社年年可以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五年内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14）。

(6) 下放一些国营中小企业给公社经营。毛泽东说：“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15）

(7) 要把农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毛泽东说：“工人在城市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

(8) 希望寄托于社队企业。毛泽东说：“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16）。

七、农村工业化的失误与纠正

但是农村工业化，在那种不顾客观条件，不顾群众承受能力，不顾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就急于大办、急于大干快上、急于过渡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对农民的“共产风”，在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平调风”，放弃农业的各种大办，穷过渡，干部的不正之风，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除自己亲自调查外，还派许多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通过调查，这些问题一经被毛泽东觉察到“认识到”便一个一个地进行纠正，如：

(1) 对社办工业大多是靠刮“共产风”、“平调风”发展起来的问题。毛泽东 1959 年 3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1959 年 7 月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所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开展算旧帐，进行退赔。他在一些省委报告中批示说：“旧账一般要算。算

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17）。在‘共产风’纠正以后，又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风，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也把许多农村中贷款一律收回，“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暂时脱离了群众”，又一次予以纠正。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收、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又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我们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列主义者的基本原则。”

（2）对社办企业发展过快、过猛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说：“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1961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社有经济，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绩，不容抹杀，但怎样能那么大办？”

（3）对靠大搞群众运动的许多大办发展社办企业，大量占用农业劳力，影响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1959年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小”。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发了经毛泽东审定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劳动力公社、生产大队占有不得超过5%，95%归生产小队，在总劳力中，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农忙季节必须达到80%，社办工业、短途运输、牧、副、渔、生活福利、文化教育和各项事业所占劳力不得超过20%，并提出今后社队企业实行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

八、对农村工业的整顿调整

对社办工业大量问题的存在，加上当时严峻的客观现实，于是从1958年冬开始了对社办工业的整顿，这种整顿，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58年冬到1959年，纠正“共产风”、“平调风”，进行退赔。

第二阶段，即1959年到1960年，将原地方国营中小企业和手工业社下放给公社经营的，由国营和手工业社收回自己经营。

第三阶段，即1960年下半年，决定大队企业下放给生产队。1960年11月由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凡是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应该集中全力做好对生产队的检查监督工作，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已办的生产企业，分别下放给生产队或者上交给公社经营。”1961年11月中央在《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

第四阶段，即1962年9月决定公社一般不办企业。中共中央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今后若干年内，一

般地不办企业。已经举办的企业，不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个别企业，经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给生产大队经营”。

第五阶段，即 1962 年 11 月决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地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一个生产队无力经营的，可以归几个生产队共有，实行联合经营，按股分红；也可以归全大队各生产队共有，由大队统一管理。”

这一决定，使社队工业不仅停止了发展，对公社工业来说，可以说在大上之后来了个大下，这一刀把公社工业产值由 1959 年 100 多亿元，砍到 1962 年的 7.9 亿元，1963 年仅剩 4.2 亿元，几乎砍光。大队工业产值略有增加，由 1961 年 32 亿元，1962 年增加到 33 亿元，1963 年增加到 36 亿元。可以说由毛泽东提出的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暂时遭到失败。

九、为什么要大砍农村工业

农村工业在发展初期存在的问题，正一个一个的被纠正、被解决、农村工业的作用刚在发挥，它的生产也逐步走上正轨，但为什么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却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四个：

（一）由于天灾和工作上失误，使 1959 年到 1962 年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1957 年全国粮食总产 19505 万吨，1958 年曾达 20000 万吨，但因工作失误丰产未能丰收，1959 年粮食总产减到 17000 万吨，1960 年减到 14350 万吨，1961 年减为 14750 万吨，1962 年虽有恢复，也只有 16000 万吨。手中无粮，使整个国民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为了把粮食搞上去，需要保证农业对劳力的需求。

（二）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人均占有粮食也大幅下降。1957 年全国人均占有 604 斤、1959 年降为 506 斤、1960 年为 433 斤、1961 年为 448 斤、1962 年为 475 斤，在此情况下，全国出现了饥荒，出现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吃饭问题成了全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三）干部不正之风成灾。在农村经济大幅下降，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一些基层干部利用社队企业安插亲人，进行吃喝，在群众中产生严重不满，为了纠正这种不正之风，毛泽东曾说：要把公社搞成两袖清风，清水衙门。

（四）为了保国营企业。我国工业产值也大幅下降，1958 年全国工业产值 1082 亿元，1959 年上升到 1483 亿元，可是到 1962 年下降到 920 亿元，为了保国营，不让农村工业与国营工业“争”原料、能源，加上一些人对农村办工业看不惯，因此他们要求限制农村工业的发展。

这就是 60 年代初对社队企业大砍大刹的主要外因。现在回头来看，我认为 1958 年农村工业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的问题主要是要求过快，做法过左，损失惨重；因此在当时情况下为纠正左的做法、纠正不正之风，扭转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进行整顿和适当的收缩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使农村工业受到毁灭性挫折，使农

村经济和农民利益受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十、希望还是寄托于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首次实验的这种失败，问题不是方向错了，在中国农村发展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决策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提出公社工业化，是希望通过公社和大队办工业来实现农村工业化，这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桥梁和组织形式，但这个口号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使人误认各地不管是否具备办工业的条件，都要实现社社工业化。实践证明，毛泽东并没有因这次社会大实践失败而动摇他对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信念，它还是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这从以下三个事例中可以说明：（1）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2）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看了周长庚等人给他的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后，批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中央同志”。邓小平将毛泽东的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组织，这表示毛泽东、中央同意周长庚等的意见和看法。（3）1975年9月由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华国锋代表中央、国务院作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说：“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地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地发展”。并公开引用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的“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华国锋曾说，我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了的，是按主席精神讲的。

十一、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和农村工业化的社会大实验，对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和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这就是：（1）毛泽东把农村工业化作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指明了道路，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找到了途径；（2）强调要重视农民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农民不仅是城市工业化后备工人输送、资金积累、原材料提供的主渠道，也是工业品销售的主市场，更是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我国工业化没有农民的参与是实现不了的。（3）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只有实现工业化，只有实现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4）农村工业的发展，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促工，以工支农，亦工亦农，使工、农协调发展。（5）在计划经济下，探索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后市场交换的形式。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对农村工业却让其与国家计划体系之外，靠市场调节和交换生存，也就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之外，让市场经济同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计划在市场经济下的探索。（6）农村工业化的实现，要量力而行，它的发展要靠自身积累，而不能靠剥夺农民和平调别人财产。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这些思想，从今天看都是正确的。

但这种思想真正付诸实践，并发挥作用，是在 80 年代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下才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1978 年乡镇企业产值 385 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 4237 亿元的 9.1%，1992 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 13193 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 36802 亿元的 35.8%，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 16.7% 的速度发展，其中国营工业和其他所有制工业年递增 13.8%，乡镇工业以年递增 28.7% 的高速发展。从全国来说，农村工业化正处在起步阶段，要实现到 2000 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 53000 亿元，成为半壁河山，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而离农村工业化的实现，差距就更大了。

目前农村工业化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回顾毛泽东农村工业化思想，和农村工业化在发展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经历的肯定—否定—再肯定，我们相信，毛泽东期望的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一定会实现。

（作者单位：农业部乡镇企业司）注释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081 页，第 107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7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9 页，第 295—296 页。

转引自权延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 78—79 页，第 97—98 页。

转引自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 230 页。

（11）（12）（13）（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第 25 页，第 504 页，第 515 页，第 504 页，第 517—518 页。

（14）（16）（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第 69 页，第 69 页，第 172—173 页。

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轨迹的分析

王煜周晓英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出现以后，各国共产党人都在探讨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艰辛的探索，其中包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失误的方面，但无论哪一方面，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的探索具有开拓性的启示。

(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探索，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组成部分，他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发展轨迹分四个阶段：

一、1956年《论十大关系》到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改造的目标模式上，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视为一体，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与苏联模式基本类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显示出了它可以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大事的优越性，又逐步暴露出了它过度集中的弊病。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戒鉴，并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初始提出了一些商品生产的思想。他在谈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这里，毛泽东就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必须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工农产品交换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意识到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还要通过商品交换。

接着，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陈云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个思想为毛泽东和大会所接受，其基本点被写进了大会的决议。按照这一方针，中共八大以后我们党初步调整了经济关系，使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同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多次谈话，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并指出，现在合作工厂做衣服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只要有原料，有销路，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可见，他已意

识到，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弊端，通过发展一定的私营经济，自由市场，既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又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之后，自由市场，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已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时有很大不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里就显露出毛泽东的搞一点私营经济，自由市场，即搞一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有利的可贵思想，使毛泽东对商品生产思想的探索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二、1958年冬到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初步纠“左”的时期。也是毛泽东通过纠“左”，其商品生产思想获得充分发展的时期。1958年的“大跃进”不仅导致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出现了混淆两种所有制界限，否定商品、货币，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直接过渡到产品经济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及时察觉到这些错误，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在纠正失误的过程中，他号召各级干部联系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身体力行。这使他能够在思想上摆脱一些空想色彩，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落在中国国情这个现实基础之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在当时，这些闪光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探索的最高水平。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为发展生产服务。

针对党内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抛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亡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

对于为什么还要利用商品生产，毛泽东首先特别强调了这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他接受了斯大林的思想，认为“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因为，这是两种所有制条件下，农民可以接受的，与工人进行经济联系的唯一形式。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主要反映的就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从事建设，都是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80%以上这个实际出发。因此，他曾反复说过，“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他批评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想废除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对农民“只能贸易，不能剥夺”。因此，我们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有利工具。

其次，毛泽东从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对于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是农民走向富裕的一条道路。他指出，公社应该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11）。这样，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他强调，不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他说，“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12）。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13）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全国农民才可以逐步富裕起来。因此毛泽东强调，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当利用这些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需的。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作用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商品生产在巩固工农联盟中的作用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的分析却是正确的，对当时澄清思想混乱，纠正“左”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区别。

毛泽东针对有的人一提商品生产就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区别。他赞成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指出：“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区别的”（14）。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这就从所有制和有计划性两个方面阐明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因此，他很明确地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毛泽东也看到商品生产也会有消极作用，对此要限制，否定。

第三，商品生产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毛泽东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这个阐述是不全面的。他指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5）。这样，他就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指出了商品生产存在与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最终决定。当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产品还不丰富的时候，商品

生产就有存在的必然性。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范围，毛泽东也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提出，商品不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他举例说，卖给公社的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为了公社办工业，卖给公社的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可见，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某些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四，价值规律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

毛泽东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同时，也肯定作为商品生产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且是不能违反的客观经济规律。他在批评“共产风”时尖锐地指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6）。这是毛泽东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他基本赞成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它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即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但“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17）。毛泽东把价值规律的作用主要看作是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的认识显然带有局限性，但是他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的思想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注重利用客观规律，以纠正“左”的错误，意义是重大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一系列思想，其中许多思想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的，但他结合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使他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三、庐山会议以后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

由于经过庐山会议后期的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及紧接着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又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左”的指导思想也有所抬头。因此，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其思想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对按劳分配表现出了消极态度，对否定商品经济的供给制仍然留恋。他说，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18）。他认为，我们党连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长期实行供给制，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大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这完全不是靠物质刺激。“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19）。

其次，毛泽东在提出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大发展商品生产之后仅隔一年多时间，就把注意力从强调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方面转到强调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方面。

他说，“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20）

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就为后来进一步否定商品生产打下了伏笔，但由于当时面临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来说，他还是肯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21）。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党的工作报告时，特意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总结。

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下决心予以纠正，但他并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认识“左”倾错误，他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丝毫不能动摇。而随着纠“左”进程的逐步发展，势必触及到对根本指导思想的重新估计。这样，他就对纠“左”中党内的一些不同认识和经济调整中的一些措施愈来愈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七千人大会之后，他的注意力日益从经济工作转向阶级斗争，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但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毕竟没有让经济工作受到过多干扰。他采纳了刘少奇的意见，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使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能按原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逐步达到了支配全局的程度，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向所谓“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一场“革命”，当然也要向经济领域中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资本主义尾巴”开战。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持限制、否定的态度。这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没有商品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组织形式。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当然就不需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而是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了。这个被称为“五七指示”的构想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这个构想显然是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其次，他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看作是旧社会的残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1974年他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就说，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是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识的一个倒退。

毛泽东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共产风”等严重剥夺农民的“左”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满足于苏联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确实提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但又有待充分发展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理论观点。这些有待充分发展，尚不成熟、尚不彻底或有所失误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

1. 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的认识，尚不彻底，有待发展。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存在着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他们认为这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因为只有这种形式，才会被农民所接受；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使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上，仍然局限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内部之间的生产和交换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只能根据国家的计划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仍然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有过一个从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肯定的认识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列宁解决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需要保留商品生产的问题。1952 年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又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部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必然性。这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斯大林的理论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关系，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也起调节作用。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有所前进，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条件和范围这个问题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的认识上。

承认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关系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的关键。毛泽东和斯大林主要是从所有制关系来分析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的。这是很不够的。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固然和所有制关系有关，但社会主义经济离不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时期还必须承认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还没有极大的发展，物质财富还没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极大的提高，社会主义时期劳动的性质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仍存在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人们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不承认物质利益上的你我界线，办得好的企业不因此多得，办得差的企业不因此少得，这正是传统社会主义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先进与落后，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职工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承认他们之间的生产与交换仍然需要等价交换，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根本原因。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得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结论，突

破了把计划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更高层次上的开拓和创造。

2.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成熟。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必须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也有所认识，但认识还不深，他还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自然经济中，社会生产缺少分工和交换，劳动者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剥削阶段的消费和自身的需要。与商品经济相比，自然经济是落后的经济形式，它墨守陈规，固步自封，排斥技术进步和劳动在社会范围内的按比例地分配，排斥各个部门的交换和流通，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而商品经济则要求生产在科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要求各经济单位密切配合，通过交换和流通，完成生产任务；要求通过经济核算，提高效益，以最小的劳动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离开了社会化大生产，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从本文前一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发展商品生产与发展生产力的正比例关系是有所认识的。但在认识的深度方面，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束缚，是很有限的。例如，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谈到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时说：“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22）。其着眼点，仍停留在处理好工农关系，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上，并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还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中，非常重视生产关系，特别重视所有制标准，在多次讲话中，他认为，“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23）。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说：“建成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制……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24）。“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25）。从这些思想观点出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他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向全民所有制、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好形式。他批评苏联、斯大林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好的形式。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了人民公社，就能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会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26）。他不完全同意教科书说的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的观点，认为“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所有制

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多了”（27）。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先决条件时，认为基本不坏，缺点是没有讲政治条件，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在这些讲话中，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和政治工作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所有制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理论误区，也是妨碍他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

3.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的认识，仍不坚定，有摇摆。由于毛泽东没有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搞清楚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因而他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和政策。当客观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毛泽东主张发展商品生产，按价值规律办事。在这种时候，他往往认为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与的商品生产，搞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往往忽视商品生产，过多地强调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在这种时候，他往往把商品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又相区别又相混淆，自相矛盾的状况，正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性质的认识的不彻底性，在实践中，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常出现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的情况。

4.否定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调节作用。毛泽东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只有自觉地利用它，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但同时他又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第一、价格第二。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规律是不受限制的，要限制也限制不了。例如农产品

的价格长期偏低，是违反价值规律的，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管时间多长，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只要有商品生产的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指价值规律要求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的分配，要按一定的比例分配，通过投资效果，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毛泽东否定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承认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他认为利用价值规律的目的，在于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与部分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相对应，毛泽东只是部分地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

5.怀疑按劳分配原则，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欣赏供给制，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承认生产者应当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使生产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经济原动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外，毛泽东没有正面地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只是在讲提高劳动生产率，讲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讲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顺带地提一下，但

他强调的侧面是政治、是精神、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很多场合、很多时候他却把物质利益原则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加以批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严厉地批评了教科书说的“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认为决定性动力不对，“物质利益是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28）。他认为讲物质利益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29）。“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30）。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工作中要强调政治挂帅，精神鼓励，要“尚贤”，要经过批评，提高觉悟。毛泽东在批判物质刺激的同时，对按劳分配的政策，有时也提出责难，他认为彻底实行按劳分配，会带来个人主义的危险，不适当地将物质利益原则视为个人主义。他还留恋根据地时候的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进城以后实行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他很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战争年代那样的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6.对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公式的教条式理解，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最大的理论障碍。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肯定斯大林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的解释，认为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不是指占有部分生产资料，而是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包括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恩格斯这一公式的深信不疑，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

（三）

毛泽东在60年代初，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非常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能深刻地认识它。他经常用江西人的话：“蒸酒煮豆腐，不敢称师傅”来形容我们搞社会主义缺乏经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正确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是毛泽东在艰辛探索过程中的一个认识阶段。既然是探索，就会有产生两种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不太正确的或错误的发展趋向。正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所说，“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的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31）。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正是这样一种相互交织的情况，表现出来的那种正确的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正是探索过程的一个特征。在认识问题上不能苛求毛泽东。不能要求毛泽东做因缺乏实践经验或历史条件限制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认识的发展总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分析这个过程，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党和领袖在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为了客观地说明毛泽东

提出来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由于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由于它本身的不成熟、不彻底，终于没有力量阻挡得住错误趋向的进一步的发展，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错误性质完全不同的探索的历史原因。

毛泽东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他们的理论观点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看法，只是一种预测，预测就不可能不带有某些理想主义的因素，列宁和斯大林也只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年代，正是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为标志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是社会主义为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不能不影响毛泽东理论思考的角度和重点，影响他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他不可能完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一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下的错误观点；也不能完全清除某些空想社会主义，包括他年轻时受到的“新村”思想和农民起义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谦虚谨慎，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受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又成功地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作了艰辛的探索，从1956年4月讲《论十大关系》到1966年6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积极探索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亲自领导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思想非常活跃，非常注意倾听实践的呼声。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大跃进那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有许多理论建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也为后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过“大跃进”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的失误，但与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相比，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不加分析地完全地和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混同起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7、728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433页，第434页。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915期，1990年9月10日。

(11)(12)(13)(14)(15)(17)(22)《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2)，第517页，第567页，第565页，第566页，第567页，第571页，第565页，第565页，第569页，第568页，第572页，第572页，第569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172页。

(18)(19)(20)(21)(26)(27)(28)(29)(30)《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3)第277页，第278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80页，第276页，第275页，第275页。

(23)(24)(25)《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397页，第463页，第433页。

(3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9页。

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为上海经济建设赢得了一次历史机遇

张文清 严爱云

从1956年至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上海曾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回顾这段历史，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为上海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上海人民在党中央、毛泽东关怀指导下，及时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充分用好机遇，从而使上海经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凝聚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对于把握好又一次难逢的发展机遇，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和依据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的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一直坚持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凯歌。建国后，毛泽东又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对民族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前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在行将跨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之际，毛泽东又率先在党内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取得建国头七年经济建设经验后，不应再照抄照搬被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建设模式，而应总结自身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寻找自己的建设道路。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资料，集中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办和部分省市的汇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杰出代表的许多新思路。“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在科学地论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时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主客观依据。

（一）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是确立“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的前提条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建国之初，帝国主义对我们新生的政权采取了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的高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派遣第七舰队驻扎在台湾海峡，形成对我国东海岸的包围，妄图迫我就范；不甘失败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窥伺在侧，企望借美国援助反攻大陆。当时战争威胁时刻存在，因此国家考虑处于战争前沿的沿海工业为应付突发事变，以恢复与维持为主，不作大的扩建和发展，有些行业甚至压缩内迁。这是根据当时形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朝鲜停战，以及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成功，显示了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加强，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把握国际形势这一重大变化，经过对国际形势走向的科学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此，毛泽东认为“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

了”。他针对当时有些恪守沿海不能发展，主张对沿海采取消极态度的同志的认识说：“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毛泽东还根据沿海工业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完全合算”。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趋缓的准备判断，为沿海工业特别是上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二）“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总结“一五”经验教训后的客观要求。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工人阶级集中，技术力量雄厚，轻重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都较好。据统计，占国土总面积12%的沿海地区占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当时国内供应的设备、材料和大部分轻工业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生产的。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1/3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60%是上海生产的。沿海城市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技术、人才，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仅上海支援外地工业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达21万人。与沿海工业所能发挥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一五”计划中对沿海工业限制发展的方针。当时，由于对上海工业潜力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客观情况分析不够全面，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究竟是发展、还是维持或缩小，曾经发生过摇摆，从发展方面打算得少，从维持方面考虑得多，甚至有时还考虑缩小。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不少行业的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从当时上海40种主要工业产品设备使用来看，除重工业方面设备利用率较高外，35种产品的设备利用率均在80%以下，其中有16种在20—40%之间，利用率在20%以下的有八种，这抑制了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一五”时期上海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5%，低于全国18%的发展速度。特别是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6%，上海反而下降2.8%，是影响上海工业发展速度的关键年份；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52年的19.8%下降为17.4%。其他沿海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天津市38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在40%以下的有15种，60%以下的有17种，达到70%至80%的只有6种。毛泽东由此认识到：原有方针应该改变一下，“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需要确定一条适合上海等沿海工业实际情况的建设方针，才能更好地发挥沿海优势，以促进内地发展。毛泽东在数年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一再反思这一教训：“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整整耽误了七年时间”。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需要技术设备，而且需要大量资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业集中、技术水平高、协作面广、生产成本低、加工利润大，可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市努力贯彻“投资少，收放大”的方针，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接近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额的6倍。上海资金积累速度超过了工业生产增长速度。5年内全市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在1953年—1956年的四年

内，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每亿元可增加产值8.7亿元，比全国的两亿

元高出3倍以上。但是这并不表示投资越少越好。事实上在实践中已出现不正常情况，上海工业的投资已经不足以补偿固定资产的磨损，以致使固定资产的净值有所下降。因此，不改变限制政策，终将影响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优势的发挥。另外，扩建改建现有企业，可以比新建企业投资节省25—50%。这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挥现有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正确途径。可见在厉行节约，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原则之外，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不失为国家获得资金的捷径。调查研究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认识，特别是对发展沿海工业与发展内地工业以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说：上海赚钱可帮助内地建厂，这和工业布局合理化需要把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上海可考虑做大的扩建。他还指出：沿海轻工业发展可以回笼资金，就是上海的重工业虽然破破烂烂，集中一下，不花很多钱，作用也很大。如钢铁公司一年上交的利润就达3000万元。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思考和认识，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者底子，以促进内地工业迅速发展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阐述了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基本原则：“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挥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正确思想得到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共识，被中共八大进一步确定，并贯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划中。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二五”计划中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亦指出，“一五”教训是：“这几年，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由此在中央有关经济方针政策中得到体现。国家对上海工业建设投入的资金逐年有增加。“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工业基建投资达36亿元，平均每年投资额比“一五”时期增加6倍。

二、贯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战略思想，使上海经济建设 获得了10年的大发展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城市，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工业规模和实力居全国之首，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中央、毛泽东正式确定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1956年5月，陈云带着毛泽东“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重要指示来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工商界人士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关于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基地的方针政策。这对于上海的经济建设来讲无疑是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所谓历史机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赋予的一种大发展的机会，它的出现有主观和客观原因，即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毛泽东确定的“利用和发

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以及党和国家根据这一思想作出的相应的经济政策，给上海经济建设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重要机遇。

上海人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深入领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及时地把握时机，把贯彻这一思想与上海的实际结合起来，全面推动上海工业的发展。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会议上，市委以“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作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期间的经验教训，深入地分析了上海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上海工业建设方针并得到会议的确认。这一方针为上海工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上海经济建设的大发展。

（一）“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内容是“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其中心环节是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利用它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使之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同时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解决落后的设备、技术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矛盾，对现有的工业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扩建和改建。根据国家需要，上海的重工业除充分利用已有设备外，还要进行必要的发展。其中上海的机电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制造中小型机械，特别是精密机械的基地之一：钢铁工业发展成为利用附近的地区铁矿的生产小型钢材的基地。其他如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电力工业等都有适当的发展。轻工业方面，在有可靠的原材料供应的基础上，对国内外需要量较大的行业，扩大生产，同时努力试制和生产新产品。

（二）“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手段是使上海工业结构合理化，进行必要的工业大改组。上海老工业基地的特点是，原有工业企业规模很小、数量众多。因此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正确地进行工业改组对上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上海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业大改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确定后，首先为了改变私营工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产品重复、技术落后和管理分散等不合理状况，使他们在生产关系变革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海在1956年至1957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改组，有计划地合并、集中、联合，把全市2万多家工厂，按行业成立了83个行政性专业公司，实行归口领导，从而对工业组织结构实施大调整。这次改组的方法是以按行业合并为主，辅以必要的外迁。通过改组，扩大了企业规模，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初步改变了上海工业分散落后和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958年至1960年，上海进行了第二次工业改组，改组范围遍及各工业局。一方面通过大规模基本建设，建成一批重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同时，对原有国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裁并、改建、扩建组成大型企业，从而形成了大批量的、能成套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改组中发展了部分新产品和新兴工业，扩大了上海的工业门类。这次改组，在推进上海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方面获得了积极的成果；某些行业和某些企业，在工业布局、结构或协作条件方面获得了合理调整，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得到加强，收到了较好效果。但是这次改组是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产生“重重轻轻”倾向，即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2年至1965年，上海在贯彻“八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方针中与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结合起来，进行了第三次工业改组。在这

次改组中，注重纠正“大跃进”和第二次工业改组中造成的失调，在调整中结合做了许多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按照“瞻前顾后，统筹兼顾”原则进行稳妥的处理，做到“下中有上”，“退中有进”取得明显效果。在一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讲：就全国地区来看，上海在“大跃进”期间损失最少。原因盖出于此。此外，这次改组还对部分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供应无保证、设备陈旧落后、产品质量差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的措施，其中重工业企业占重要比重，并改变了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精简了多余职工，压缩了部分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的工业企业的生产。第三次改组不仅达到了工业布局合理的目的，而且保持了长远发展实力。

（三）“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方向是上海工业向“高、精、尖”的发展。根据中央对沿海城市工业的要求和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上海在制定“二五”计划过程中就提出了工业生产要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上海工业既有基础雄厚，门类较齐全，配套协作条件较好，科技力量较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等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缺乏自然资源、原材料和能源，市区工厂过度密集、市内交通、住宅、“三废”污染问题严重等不利条件。因此确定“高、精、尖”为上海工业发展方向，较好地解决了在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中利用什么、发展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合理等问题。60年代初，上海针对工业生产部分落后于国内的先进水平，大部分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的“两落后”状况，提出了“两赶超”口号，即赶超国内先进水平，赶超国外先进水平。“两赶超”口号，实际是上海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工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行动口号。为了“两赶超”，上海工业战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

（四）“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目标是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1963年，市委在上海市第三届党代会上总结了在调整中继续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的经验。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利用这个基地就能加快上海的工业生产，更好地支援全国建设”。同时强调：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上海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对上海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建立一些必要的骨干企业，加强某些薄弱环节，这样，就可以使上海工业在合理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利用”。所谓合理发展，就是在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特点的时候抓重点，“首先解决国家建设要求上海实现的迫切任务”（11）。在这次会上，根据全国经济建设对上海的要求，正式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12）的目标。并突出一个“新”字，确定了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当时上海把高等院校、科研部门与工厂相结合组成专题攻关小组，从而在许多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效，到1965年上海不仅已成为门类比较先进齐全的工业基地，形成大中小企业相结合，主副配套，整机、部件、零件完备的协调的工业体系，而且还成为全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基地。

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

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留下的历史启示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和赞扬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它所蕴含的宝贵思想“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13）“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留下的历史启示有：

（一）在工业化建设上正确处理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辩证关系。我国历史原因形成的工业绝大部分分布在远离原材料基地的沿海，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将新建工业重心放在内地，这是合乎调整地域经济结构需要的。然而，以此忽视利用沿海工业者底子良好的基础，放弃合理发展沿海工业所能取得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则不利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思想，科学地论证了发展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与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既相矛盾又相依赖：实践证明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底子好的优势，积极合理地发展沿海工业，会使国家有更多的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建设，反之，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只能是牵制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在重视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注意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有利条件，上海、辽宁、天津等工业区，在这期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起了内地建设和实现全国工业化的根据地作用。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中，扩充了工业门类，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并逐步按集约化规模经济的原则建立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到1965年，上海已建成为冶金、机电、仪表、化工、轻工、纺织、手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先进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50年代后期，诞生了我国第一代轿车；刚跨入60年代，就成功地发射了当时只有极少几个国家能研制的探空火箭，造出了万吨水压机。1965年，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赶上和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有人工合成胰岛素、1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20万倍大型电子显微镜、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等。还建立了高温合金、稀有金属、石油化工，合成树脂塑料、合成纤维、半导体材料以及激光光、高温陶瓷等一批新兴工业。1966年与1956年相比，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1.6倍，平均每年增长10%，这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上海综合经济能力远远超过当时的台湾、香港。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更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实现这一战略思想的坚实基础。《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十个关系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包括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人的、物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符合我国国情，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体现。根据毛泽东这个基本方针的要求，除物的和其他各方面有利因素外，首先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1957年，毛泽东围绕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个主题，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久他亲自南下，在沿海地区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干部作“正处”问题的报告，这为干部群众领悟新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亲临上海，视察工厂企业，接见工人、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鼓励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事实证明，上海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顺利的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的成功经验，主要是调动了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锻炼造就了一支思想、技术、作风较好的职工队伍，为上海经济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上海市委认识到，搞好工业生产的关键在于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市职工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热潮，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这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创造了我国的许多“第一”。例如1956年制造了第一只手表；1957年研制了第一台精密磨床；1958年第一艘万吨轮下水；196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枚探空火箭，等等。这都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实现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成果。

（三）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如同毛泽东其他许多正确的思想一样，在实践过程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因此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在开始全面建设的十年间，由于贯彻了这一思想，沿海工业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内地工业的建设；进入60年代中后期，由于又对国内外形势作出不符合实际的估计，认为战争威胁随时存在，再度对沿海采取压缩内迁的方针，违背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正确思想，使上海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建设速度受到抑制。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他们都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历程进一步验证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的科学性，并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工业发展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起步的重大部署，也是利用和发展沿海优势的具体体现。此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进入到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14）。这一决策正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上海特有的地域优势、人才优势、经济基础优势，立足上海，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以上海经济的大发展辐射沿江、内地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早日实现与世界经济接轨。可以说，这一决策进一步深化发展了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建设的战略思想，成为时代赋予上海人民的又一次空前重大的历史机遇。察往知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当年上海人民贯彻这一思想的重要经验，这样，才能做到江泽民所指出的，用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珍惜机遇，用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促进上海经济建设的腾飞。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第270—271页。

(1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487 页，第 478 页，第 483 页，第 491 页。

《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第 210 页。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 461 页。 (11) (12)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第 495—496 页。

(14)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思路的比较

黄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从理论上、实践上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共同或分别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比较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思路，深切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之不易，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

毛泽东、刘少奇都很重视研究国情，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中国的国情，主要是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经济基础落后，发展不平衡。毛泽东、刘少奇都富有长期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因而对国情特点的观察十分透彻。毛泽东对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有一个简明的概括：“一穷二白”，即经济上穷，文化上白。刘少奇也一再指出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从毛泽东、刘少奇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经济建设从国情出发，具有两重含义。

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毛泽东还多次预测过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时间。1954年他提出15年左右打基础，50年左右实现，后来又提出要100多年。

二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搬外国。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效法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感经济建设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这一认识付诸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可以看作当时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在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上，我们国家也有教训。例如“大跃进”时期，就犯了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错误。这是严重脱离国情的。毛病出在哪里？难道忘掉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了吗？不是的。正因为看到中国经济落后，就想早点甩掉贫穷帽子，赶上发达国家，于是提出所谓“超英赶美”等口号，忽视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是对国情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对此，毛泽东、刘少奇都有责任。

（二）关于经济建设的目标

把中国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同为中国经济建设确定的宏伟目标。

最初的提法是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建国前就提出中国要工业化。建国后，刘少奇在1950年写的一份研究经济的论文中，在阐述党和政府的基本任

务时写道：“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 1952年后在全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全民的口号，写进了宪法和党章。毛泽东1954年6月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

在宣传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的提法。周恩来1954年9月在向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但这里还没有把这几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刘少奇1957年11月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把“三个现代化”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又重申了“三个现代化”的目标。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革命现场会议上也说：“更快地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这样，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国家发展的目标时，正式把三个现代化增加为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四个现代化的顺序有所变化，如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后面，把国防调到科学的前面，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直没有变。例如周恩来在1964年三届人大、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法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刘少奇等提出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这个提法也有不全面的地方，主要是缺乏民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刘少奇建国初期曾将民主化和工业化并提，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但由于多种原因，民主的内容逐渐不再强调，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文化”也改为“科学技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重又得到重视。因此，在关于新时期奋斗目标的提法中，增加了“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内容。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和同期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中，都规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人大修订的党章、宪法中，又进一步简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一提法，比过去工业化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为全面而且简明了。

（三）关于经济建设的步骤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研究提出了“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在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提纲中再次阐述了他

对“经济建设步骤”的思路。他认为：第一步应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心，其次是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然后利用重工业来武装和发展轻工业、农业(11)。毛泽东的主张与此不同。他认为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即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在此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占88.8%，轻工业占11.2%，对农业的投入更少。这在当时重工业设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也是成功的。1957年同1952年相比，重工业增长220%，轻工业增长83%，农副业增长24.7%。但这一方针在“一五计划”以后没有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带来了恶果。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仍旧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经济建设，在工农业关系上重工轻农，在轻重工业关系上重重轻轻。1958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比“一五”时期重工业平均增长25.4%的速度还要快两倍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突出钢铁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让钢铁元帅升帐”。结果把农业、轻工业挤到了一边，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后来，毛泽东察觉了这里的失误并着手纠正。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明确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1960年又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应该说，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比较符合刘少奇原先的思想。因此，刘少奇60年代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坚决地推行了压缩重工业，加强农业、轻工业的一系列措施。他指出：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而是要后退，要退够，“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12)

由此可见，在关于经济建设步骤的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的思路一开始并不一致。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他们的主张又趋于一致，统一到“农、轻、重”的方针上。多年来，我国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有过不少教训。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不能说就已经很好解决了。近年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农民负担过重、收购农产品打白条等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暴露。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经过长期探索得出的以农、轻、重为序安排经济建设的结论，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四) 并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刘少奇历来主张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建国前夕他就斩钉截铁地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13)建国后，他一再重申：“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4)“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15)在中共八大上，他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6)。对以后发生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不积极的，相反，只要有会，他就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有所抵制。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和“反右倾”的斗争后，刘少奇曾主张只把“反右倾”的决议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决议，但后来没能在中央提出。在全国开展反

右派、“反右倾”斗争的背景下，他仍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17）。60年代，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少奇虽然受到批评，但仍果敢地建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这一建议为毛泽东和全会所接受。

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的主张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各项工作应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他是在阐述城市工作时讲的，还没有把它作为全国性的方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在实际工作中是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当时是同意的。1957年3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相应地提出“向自然界开战”。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改变了看法。1957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八大决议，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8）此后，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又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始终坚持未变，这就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推到次要地位。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经济建设降为“纲”下面的“目”。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一些主张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就更等而下之了。

总起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头几年和1958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重视经济建设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程度同刘少奇相比也稍为逊色，但基本上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1958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作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真抓工业。”（19）这表明毛泽东真心希望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但这一愿望实际并未兑现。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对过去党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教训的根本性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五）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主要阐述了经济建设中的五个重大关系：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篇杰作的诞生，是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和共同探索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论十大关系》是在听取中央30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这次以汇报座谈为主要形式的调查研究活动，是刘少奇首先进行的。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布置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他在讲话的最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先准备。”从12月7日到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先后召集中央工交、财贸、农业、文教卫生系统32个部、委、局的负责人汇报，就这些部门的基本情况和方针进行座谈讨论。刘少奇在座谈中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其中已经提出或涉及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如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手工业、轻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关系，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关系，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刘少奇在座谈中提出：在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和手工业结合起来；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但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对外国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等等。

1956年1月，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偶然听说刘少奇正在组织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认为很好，决定也这样做。于是，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这30多个部门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的内容大致相同，除各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业务外，均反映了经济建设中若干带全局性的关系。

34个部门汇报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归纳出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4月2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集中概括了大家的意见，第一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3天。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吸收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使这篇讲话的内容更加充实，理论性也更强了。

《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方针，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而未能得到真正贯彻。到了60年代，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重又按照《论十大关系》的精神指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就用新的语言阐发了处理经济工作中各种关系的原则。1965年12月，为了在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继续执行《论十大关系》的方针，刘少奇提议将这篇讲话印发给干部学习。他致信毛泽东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表示同意。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当然，《论十大关系》还吸收了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这篇讲话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指导作用。

（六）关于计划与市场

长期以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形式上仿照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但在实行计划经济这一点上，他们都没有突破。毛泽东有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20）刘少奇也说：“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21）这些论点，大体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形式的基本看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就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毛泽东、刘少奇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有所察觉和分析，并且提出和采取了许多革故鼎新的措施，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

毛泽东 1956 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对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1958 年，他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针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批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表达了他对计划体制的疑虑。他还针对书中所说社会主义商品“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批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22）当时有人提出取消商品交换，实行统一调拨，把人民公社的经济办成自给自足的经济。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和取消市场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作了尖锐批评。1958 年 11 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修改文件时指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作用。”（23）他还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和“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等著名观点，实际上已经在探讨计划和市场互相补充、结合的可能性。以后，毛泽东又多次试图进行旨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经济体制调整，但由于总体上“左”的思想的发展，这些尝试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自由市场等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割掉，致使市场调节极度萎缩，其恶果是众所周知的。

同毛泽东的探索相比，刘少奇走得更远。1955 年底刘少奇在听取中央 30 多个部门汇报时，就提出走向市场的问题。他举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服装设计也要搞，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1957 年 4 月刘少奇在一次南巡中，一路大讲计划和市场，提倡开发自由市场。4 月 7 日他在广东说：“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个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24）4 月 27 日他在上海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多，而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即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灵活性（25）。怎么样才能使经济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呢？刘少奇认为，就是要利用自由市场，“不止商业上有自由市场，还有地下工厂，另外，农业上还有家庭副业、自留地。我们要允许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让他钻空子。”（26）他还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生产，指挥着农民进城；我们用计划不能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1959 年 11 月刘少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武汉、郑州

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刘少奇还较早地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他亲自抓生产资料流通的改革工作，派工作组到石家庄等地调查，指导国家物资管理部门在北京、无锡、株洲、徐州等地进行改革试点，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管理生产资料。从1962年3月到1965年9月，他先后八次召集国家物资管理部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在此期间，刘少奇还提议林业部门通过调整价格来刺激木材合理生产；要求劳动部门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合同工；组织企业试办托拉斯以推动走向市场等。这些举措的实质，就是探索用市场机制来改革旧体制。可惜，“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些改革试验中途夭折了。

历史进入了90年代。现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和改革局面，同毛泽东、刘少奇在世时相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但历史不能割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领导人50年代以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有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今天在经济建设上实行的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不正是他们几十年间辛勤探索的继续和发展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3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6页。

（12）（15）（16）（2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第3页，第416页，第60页，第341页，第60页，第253页，第36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1—712页，第795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刘少奇1957年11月6日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页。（13）刘少奇1949年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4）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5日。（17）刘少奇1959年11月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9）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6页。（20）毛泽东：《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957年6月14日。（22）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23）毛泽东1958年11月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的修改。（24）刘少奇1957年4月7日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的讲话。（25）刘少奇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6）刘少奇1957年5月7日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五十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

陈向东

新中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经常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了解各地情况，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来天津更为频繁。这不仅是由于天津地理位置优越，可谓京畿门户；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中心和国际港口，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在全国举足轻重。因此，毛泽东在 50 年代对天津尤为关注，曾多次来天津调查研究。特别是 1957 年前后，他在天津视察了汽车制配厂、天津第一机床厂、仁立毛纺厂等厂，在人民礼堂向全市党员干部作重要讲话，参观天津工业技术革命等展览，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了解教育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情况。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天津的调查研究活动，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天津调查研究时的指示和讲话的主要精神，体现了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如何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思考和探索，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内容。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现仅就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7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来到天津。当他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了解情况后，决定给全市党员干部讲话。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刚建立。在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这些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正是这一时期毛泽东重点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也是干部和群众不甚明了和关心的问题。3 月 17 日晚，毛泽东在人民礼堂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明确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主要矛盾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毛泽东在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他提出和肯定，后来未能坚持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说，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的民主改革，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 1840 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 1956 年就达 116 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所有制。……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毛泽东的分析无疑是十分重要和正确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必须明确回答我们党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据此，毛泽东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他

说，全党来搞建设，学科学，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以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要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全党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

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他在50年代深入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党的八大期间曾指出，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他还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这次来天津的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发挥，他是把这一问题当作中心内容讲的，讲得不仅明确，而且通俗生动，对听众有极大的感染和号召力。特别强调全党来搞建设，学科学，跟自然界作斗争，这种提法比以前更为突出。同时提出要改变经济面貌，就是大体上改变一下，也需要几十年的思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到搞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要全党干部思想上要有准备。这种思想认识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基础差，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改变经济面貌，非得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不可。从上述材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天津讲话中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对他在党的八大期间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然，由于国内、国际的，主观、客观的种种原因，这一重要思想毛泽东后来未能坚持，十分令人遗憾。尽管这样，毛泽东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包括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后来失误的教训，仍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党员干部要学科学，学会管理城市

毛泽东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除了要求干部要学习政治理论外，强调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学自然科学和学会管理城市。毛泽东来天津视察时，十分强调干部学会管理城市。他在视察仁立毛纺厂、第一机床厂、汽车制配厂等单位时向陪同的市领导及工厂负责人强调了这一问题。他在汽车制配厂与陪同的干部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并指着黄敬说：你这个部长（黄敬原为天津市长，当时已调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业务，是带了头的。毛泽东谈到这里又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等说：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毛泽东1957年3

月 17 日在天津人民礼堂的讲话中，在讲到要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着重强调了党员干部要学科学，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作斗争。毛泽东在讲这一问题时首先提问：在坐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大学教授请举手！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毛泽东说，少得可怜呀！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当工程师、技术人员不行。这话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当教员的也少。毛泽东在列举了一些事例后又说，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里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需要一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十五年才会有一个改变。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永远学不会，我看是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是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党要集中力量搞建设，需要大批懂科学、懂技术的干部，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学科学，要学会管理城市。只有这样，我们的干部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不重视。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强调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由来已久。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问题。1940 年，他在延安亲自参与发起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并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观点，他认为“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建国后，我们面前将是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他号召干部要学习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以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毛泽东一再强调，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 1955 年党的代表会议上，他在讲话中再一次要求干部为工业化，为现代国防钻研科学技术。1956 年党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十分新鲜的观点，他说，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做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1）。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的。特别是 1956 年前后，对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更为强调，这与毛泽东这时把注意力着重放在经济建设上有关。他强调重点转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时，也就十分重视和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学习。毛泽东 1957 年 3 月在天津的讲话，因为听众是党员干部，因此他集中强调了党员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比以前讲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学会管理城市的思想，是符合天津乃至全国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双百”方针和中国特色

毛泽东在 1957 年天津人民礼堂的讲话中，还讲了双百方针和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的色彩等问题。他讲这些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

1956 年是一个高奏凯歌的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胜利完成。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从 1955 年开始毛泽东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学习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教条主义。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批评了斯大林，这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总结我们建国以来的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觉察到我们建设中照搬苏联的经验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因此，毛泽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 1956 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倾听了 34 个部委的汇报，并去外地作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理论思索，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随后在 1957 年 2 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也同样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在苏联遗传学、生物学界，用粗暴的方法，强制推崇李森科学派，禁止摩尔根学派。学李森科、米丘林的学说姓“社”，摩尔根的学说姓“资”。在文学艺术方面对待不同流派也有类似问题。有鉴于此，毛泽东为了推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争论空气的形成，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讨论《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于 1957 年 3 月 17 日来天津讲了“双百”方针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上许多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待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都要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还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这样才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方面的，都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学习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应该采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12）。

毛泽东讲“双百”方针的主要用意，是针对我们的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他是把“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起来阐述的。因此，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应用范畴有了新的延伸和扩展。其主要特点是：不仅对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方针是“双百”方针，在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包括世界观）也要用“双百”方针；用过去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行的，正确的方法是讨论、辩论，充分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目的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

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重视“双百”方针的作用，进一步解放思想；如何正确处理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讲“双百”方针时，特别提出要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实行，就要有中国色彩，就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13）。毛泽东所说的中国色彩，实际就是中国特色。他的这一提法，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从这一时期探索的内容上来看，已经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

（四）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毛泽东在天津视察，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技术革命十分关注。1956年1月12日，他在天津视察时，参观了仁立毛纺厂和天津第一机床厂。在参观中，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情况，鼓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要开展技术革命。

1958年8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再次来天津视察。在这次视察过程中，他对技术革命极为关注。当他得知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刚刚完成展品的装饰工作，即将开幕的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观。这个展览会规模较大，展品是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命中试制的新产品。毛泽东先在“东风馆”看了天津拖拉机厂试制的热轧齿轮，这是一项新技术，它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采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提高十多倍。这项新技术也代表了当时齿轮技术革命的方向。毛泽东看后十分称赞。接着他又看了国产矽胶，这种矽胶的吸酸能力达到60%，其性能已赶上了日本、英国的产品。随后毛泽东从“东风馆”出来走进了重工业馆，先看了新产品小型拖拉机，接着在天津钢厂的产品前，听取了钢厂总工程师关于转炉炼矽钢的情况介绍。总工程师介绍说，过去有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只有电炉才能炼矽钢，我们通过技术革新，用转炉炼出了优质的矽钢，并且冶炼时间缩短了百分之八十，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毛泽东仔细看了轧制成的矽钢片后，十分高兴。毛泽东在看了其他新产品后，从重工业馆出来，又接连参观了化工、纺织、手工业三个展览馆，对新技术产品聚氯乙烯排水管、从海水中提取的盐和纯碱、聋哑教话器、玻璃布、人造革、不用染料染出的丝绸等一一仔细观察，询问了利用新技术的情况，并对陪同人员，现场的技术人员强调说，要创造新的产品，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天，毛泽东又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参观，对两校师生开展技术革命和教育革命给予高度评价（14）。

毛泽东在这次来天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天津开展技术革命的情况十分关注，一再强调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这时起，技术革命已开始成为毛泽

东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一年的12月，他在修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提出了“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15）的思想。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研社会主义改造，钻研现代国防，并且开始钻研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16）。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把技术方面的创造和革新称为“技术革命”。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把我国建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决议中提出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建设上来之后，毛泽东对技术革命问题考虑得更多，对技术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重视，提出了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60条（草案）中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让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17）紧接着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技术革命。”（18）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指出：“过去我们在建设方面用的心太少，主要是搞革命去了，现在革命比较松了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19）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思索技术革命这一战略思想时思想发展的轨迹。它说明了毛泽东从1953年开始思考和重视技术革命问题，特别是从1956年到1958年上半年，他的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逐渐成熟。这时毛泽东把技术革命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去考虑，因此他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1957年前后在天津调查研究时为什么特别注重技术革命问题，这是与他上述思考分不开的。他的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促使他在天津（以及其他方面）调查研究时，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了解、研究，从而获得丰富的实际材料。反过来，这些丰富的实际材料，又帮助他使这一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从他的主观愿望上来说，就是要通过技术革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一思想也得到全党的赞同。但是，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思想重新放出光辉。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五）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在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休息时，很关切地询问了天津工业生产和技术革命出现的新情况。当陪同他参观的李耕涛市长说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与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一定困难时，毛泽东说：“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

件，都要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20）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时《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因此，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在天津、河北，以至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呢？这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分不开的。

中国的近代工业发端于 19 世纪 40 年代，从 1843 年上海出现第一家现代企业开始，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虽然经历了 100 多年，但是现代工业十分薄弱。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工业，主要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榨取廉价劳动力。因此，外国资本的投资集中在采矿业和轻纺工业，而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得不到发展。因此，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门类不全，技术落后，根本构不成什么工业体系。改变这种落后的工业面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响亮地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2 年，他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进一步提出实现工业化的总任务。随后，党中央在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问题。1954 年 5 月李富春在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作《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增长，才能够领导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把小农经济改造为合作的集体经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经过逐步的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大致 15 年左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从数量上看是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0% 左右，从质量上看，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农业相应的协调发展（21）。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问题。在 1956 年党的八大的决议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22）。1957 年 12 月 31 日，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几点指示：（1）省市县都要搞规划，工业、交通、农业、商业、手工业、大专院校，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城市规划都要搞一个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那样的远景规划。（2）协作、联省办法，逐步过渡到经济中心，是否考虑过去的大区，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省市考虑通盘的协作规划。如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23）。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于 1958 年在天津视察时，针对天津及河北的工业发展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以及工业的布局和协作等问题。至此，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基本形成。1963 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道路通向四个现代化的必经之途。

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对天津、河北以及全国工业发展的

道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天津市这个老工业基地，除对原有的工业基础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外，发展了冶金、石油化工、电子、汽车等新的工业部门，使天津的工业门类进一步增多，工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河北省在石家庄、唐山、邯郸、张家口等地建立新的工业区，重点发展冶金、化工、电力、轻纺、化肥、农机等工业。从全国来说，除了继续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优势外，在内地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基地。这不仅使工业的门类增多，而且从地区的分布上，也更为合理。整个工业开始向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向发展。当然，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发展的速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调整了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主要是：进行了以开发能源为重点的工矿业和交通运输建设；调整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比例，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对现有企业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进一步使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处理好老基地与新基地、沿海与内地、原料产区和加工工业集中地区等方面的问题。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曾对我国自然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别的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带作出规划，要求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相互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各有特色的经济协作区网络。在“八五”规划中，对原来的生产布局又作了某些调整，如特别提出了重点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和改造基础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的前提下，形成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基础，以跨省区市横向联系为补充，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广泛开展协作的经济体系。综上所述，都是毛泽东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及协作区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经过 40 多年的艰辛开拓，毛泽东提出的，所要建立的独立工业体系，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其标志是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布局逐步合理。现在已形成了综合性的大型工业地区和工业带，主要有：沪宁杭工业基地、京津唐工业基地、辽中南工业基地；沿海工业带、长江沿岸工业带和陇海兰新工业带。现在中国的工业在已经形成独立的体系的基础上，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结束语

毛泽东 50 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是他在建国后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思想理论上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的思想；关于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要学习科学技术的思想；关于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关于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要有中国特色的思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重大贡献。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未能一贯坚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失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才重新放出光辉。

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在思想理论上有这样重大的建树和贡献，这是与他本身的条件和在调查研究中的鲜明特点分不开的。首先，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气魄，思想解放，勇于开拓，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开拓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始终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创造和遵循的原则。第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中，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和要求，从群众中直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

总之，毛泽东 50 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在思想理论上有重要的建树和贡献，是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并使调查研究的成果升华为思想理论的结果。

毛泽东在天津调查研究的实践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他在 5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注释

（12）（13）1957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毛泽东视察天津汽车制配厂的谈话记录。

（11）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书店 1986 年版，第 108—10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80—1481 页。

《新华月报》1953 年 3 月号，第 13 页。

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4 号，第 1 页。

（14）（20）1958 年 8 月 15 日《天津日报》。

（15）（17）（18）（19）转引自《党的文献》，1991 年第 6 期，第 15 页，第 12 页，第 13 页。

（16）《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4 页。

（21）（22）（23）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第 113 页，第 88 页，第 113 页。

毛泽东与三峡论证

萧木华

新中国诞生以后，毛泽东不仅以新一代领袖的风采首开三峡论证的先河，而且，他的卓越治水辩证法思想正确地指引三峡论证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科学成果，为三峡工程决策提供了充足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他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乐于和善于听取下级意见甚至反面意见的民主作风，对于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治本与治标：毛泽东抓住了长江水利的要害

治水，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实践，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责任。出人意料的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来讲，这项任务的到来是那样突然，那样急迫，那样猝不及防。

1949年夏季，当百万大军挥师南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正在酝酿诞生的时候，万里长江突发大洪水。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警告！此时此刻，中华大地饱受战争的蹂躏，百孔千疮，百废待举。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20年时，毛泽东十分干脆地说了一句：“20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后，这一治标工程就可以弃置不用了。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冬季少雨，是长江的枯水期；夏季多暴雨，是长江的洪水期。在正常年份，长江靠自身的河床泄洪入海；在大水年份，当河床不足以泄洪时，多余的洪水就会在江堤的薄弱地段决口泛滥，造成田淹、房倒、人亡的大水灾。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就是用人工调度和控制的办法，在大水年长江洪水水位超过荆江大堤防御能力时开启荆江分洪闸，削减洪峰，将多余的洪水蓄积在荆江分洪区内，以提高荆江大堤的安全度。因为荆江分洪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在分洪之前可以有计划地将分洪区内的人财物转移到高地安全区，可以尽量避免人畜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但是，由于荆江分洪区并非天然水域，而是良田万顷的居民区，一旦分洪，免不了田淹屋倒，造成很大损失；每次分洪，政府必须拿出大笔钱来补偿分洪区人民的损失，还要保证汛期人民生活，组织汛后重建家园。这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牺牲一部分，保存另一部分，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是治标的权宜之计。

那么，什么是治本之策呢？治本，就是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促膝长谈，探讨治江良策。林一山指着长江规划草图上的大小水库，介绍了长委会计划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上逐步建一系列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呢？”

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是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晤谈。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立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看看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究竟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结果发现，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雨洪，而从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约 30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发生雨洪则无法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仍然存在。结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54 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 64 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 20000 多万亩，受灾人口 9000 多万，死亡 3 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 100 天。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必须尽快根治长江水患！毛泽东坐不住了。长江大水之后，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望着洪水消落的长江，毛泽东在思虑：三峡工程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急召林一山面谈。在列车赴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问题；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这表明，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6 年 7 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修建三峡大坝的强烈愿望和情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来华工作，三峡论证已经全面展开。

1958 年 1 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修建三峡工程应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

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 100 余人勘察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

同年 3 月，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意见》明确指出：“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提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 1959 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在 1962 年—

1963年交出。”从此，三峡论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三峡工程，由治标而治本，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这就是毛泽东治水谋略的基本思路。整个三峡论证都源于这一思路。

二、短期与长期：水库寿命难题牵挂着毛泽东的心

修建三峡，决心已定；各项准备，迅速展开。毛泽东感到心宽了许多。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他向身旁的船员们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员立即回答：“太赞成啦！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毛泽东执三峡之牛耳，超脱坦荡。

重任在肩的周恩来则争分夺秒，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全面部署三峡事宜。他在率队察勘三峡，为成都会议提出决议草案之后，又为三峡论证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根据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兼任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改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89年6月改回原名称“长委”），由林一山任主任。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长办”主要承担治理开发长江的流域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等大型综合性枢纽的勘测、设计工作，负责三峡工程论证和提出三峡科研计划。

其二，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由张劲夫任组长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以便组织和领导全国三峡科研工作。1958年6月，由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召集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举行。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全国先后共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全国性的科研大协作。

1958年8月，在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长江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为三峡工程“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

然而，就在各项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三峡工程上马指日可待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问题——水库寿命问题，使兴建三峡的热潮“顿失滔滔”。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见了林一山，特别问到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

林一山依据一般演算成果，回答说：三峡水库大约可以运行200—300年。

听到这里，毛泽东心里一沉。稍停片刻，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200—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

当时，国内外水利界的一个通行观念是：水库是有寿命的，就像人有寿命一样。因河水都挟带有泥沙，泥少不可避免地会在水库中沉淀淤积；经过一定年份的运行使用之后，或几百年，或几十年（甚至几年），泥沙会逐步淤死水库。因而，水库的寿命，水库的淤死，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虽然因不同河流的挟沙状况不同和水库的建筑设计不同，使水库寿命有长短之分，但是，水库淤死的趋势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是国外水利界多年经验的总结，对于年轻的中国水利建设者来讲，我们尚无根据轻易否定这一

结论，“水库寿命”观念的权威性就不言而喻了。当时，谁也没有去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大型水库应当经“千年”而不衰，可以长期使用；200—300年的使用期是太短太短了。用周恩来的话来讲，三峡工程应当“千秋万代”都能安全使用，不会出问题。既然三峡水库是“千年大计”，要管千秋万代，那就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长期使用，否则，宁可缓建或不建。

短期与长期，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水利专家看来，数百年已经是长期了，而几年几十年才是短期。在共和国的领袖看来，数百年只能算短期，千年以上才算长期。按照哲学辩证法的观念，没有永恒的事物，日月地球尚有寿命，何况地球上的一项人造自然工程，也必然有一个终结期限；但是，追求一个可能的长期，使这一巨大工程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也并非天方夜谭！

林一山在苦苦思索。毛泽东冷不丁提出了一个在水利界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使他感到意外，又使他眼界大开；然而，要解决它，谈何容易！

毛泽东开始犹豫了。三峡工程还上不上马？偌大一个工程，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头来只能用200年—300年，那值得吗？

林一山坐卧不宁。他决心攻克这一世界难题，为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扫除障碍。他带领一批高水平的工程师，对国外成百个大小水库的淤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和分析，并到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区的上十座水库作了实地勘察和研究，得到重要的启示。例如，世界上有许多淤死了的水库，为了延长其寿命，有的水库采取加高大坝的办法，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后水库照样淤死；有的水库则由于修了底孔排沙闸，使水库寿命得以延长，并未在原设计的期限内淤死。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他们将经验材料上升到理论，提出了解决水库长期使用的一种全新理论。这一新理论的基本思路是：

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临界点”；泥沙的沉积与冲刷也有一个“临界点”，这就是水流的一定速度。当水流速度大于这个质点时，就能冲刷泥沙；当水流速度小于这个质点时，就会使泥沙沉积。泥沙有粗沙与细沙之分，冲刷细微泥沙（悬浮质）所需流速较小，冲刷粗沙卵石（推移质）所需流速较大。

在水流与泥沙的矛盾中，水流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入库泥沙多少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水库内水流的速度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许多水库淤死，其根本原因是水库内流速太低，致使泥沙大量沉积。因此，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保持水库内一定的水流速度。

为达到一定的库内流速，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一般来讲，河槽型水库能够达到过沙要求，而湖泊型水库则很难达到过沙要求；因而，选择山谷地区修建河槽型水库是保证水库长期使用的首要条件。

为了防洪、发电等等的需要，水库必须蓄水，蓄水就难以保护一定流速，因此，入库泥沙的淤积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与解决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发生了尖锐矛盾。从静态看，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从动态观点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在水库的小部分库容（死库容）淤满泥沙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库内河床；在死库容以上部位，枯水期蓄水时发生的少量泥沙沉积，可以在洪水期初靠强大水流排出库外，从而达到年均泥沙进出平衡，实现水库长期使用。

为了最充分地排出库内泥沙，必须在水库大坝上安排足够的排沙底孔；同时，采用合理的水库调度方式（如“蓄清排浑”），达到既能有效排沙，又能有效防洪、发电，实现水库长期综合利用。

解决水库寿命难题的思想原则，就是治水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分析中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具体矛盾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案；静态矛盾动态思考，在变化中求发展，在运动中求平衡；一定矛盾的质、量、度关系，矛盾内部与外部的否定性、对立性和同一性、统一性，都应充分予以重视。

专家们认为：治水之难，就难在河流学的规律不容易掌握（其难度超过了一切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最难掌握的，则是河流辩证法问题，因为河流辩证法是河流学的核心和精髓。实际上，依照列宁的观点来看，河流辩证法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辩证法”，而治水辩证法才是主体的人在治水实践中所掌握和运用的“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认识和掌握。从治水的实践过程来讲，掌握治水辩证法，弄清和遵循河流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

1964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林一山用他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严重淤积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0年4月至1964年10月，三门峡水库在建成后的蓄水运用期间，淤积迅速，总库容由55.49亿立方米剧减至21.43亿立方米。经采用林一山方案扩建泄洪设施，增添排沙底孔，并在汛期降低坝前水位运用，使库容奇迹般地逐步恢复，至1980年总库容已稳定在30亿立方米左右（见下表）：

三门峡水库库容变化表

建库前	1964年	1970年	1973年	1977年	1980年	
日期 (1960年4月)						
总库容(亿立方米)	55.49	21.43	28.28	32.57	30.30	31.00
滩库容(亿立方米)	35.49	13.26	10.76	10.76	10.76	10.76
槽库容(亿立方米)	20.00	8.17	17.52	21.81	19.54	20.37

</PGN0262.TXT/PGN>

这表明，按照新的理论改建之后，三门峡水库不仅逐步恢复了库容，而且实现了常年泥沙进出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库容可以长期使用。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也采用这一理论获得了成功。工程实践和水工试验都表明，这一理论是科学的。长江三峡水库完全可以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实现长期使用。此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证和再论证只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确证和完善。

1981年，国际泥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泥沙专家在会上宣读了阐发这一新理论的学述论文，得到各国专家的首肯。此后，“水库长期使用”的新观念取代“水库寿命”的旧观念，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这是中国的水利专家靠治水辩证法推倒国际权威的光辉范例！

然而，当1966年林一山将《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正式报告递达毛泽东案前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考虑另一更为紧迫的问题——水库防空问题。它使三峡工程一延再延，而三峡论证却愈做愈精细。

三、葛洲坝与三峡：

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内紧张，苏联撤走专家表明国际关系紧张。政治关系紧张又预示着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因而，1959年，毛泽东针对防空问题，提出了兴建三峡应“有利无弊”的要求。于是，成立了专门班子研究防空问题，结果均不尽人意。这样，就由高坝型的三峡工程引出了低坝型的葛洲坝工程问题。

1969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重新提出修三峡工程，毛泽东回答：“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200亿方水，你怕不怕？”

无奈，张体学又转而建议：可先建葛洲坝工程。1970年10月，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向中央提出了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正式报告，终于在年底获准开工。周恩来解释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这是符合毛泽东意图的。

林一山则坚决反对葛洲坝工程先于三峡工程仓促上马。其理由是：葛洲坝工程在长江总规划中，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反调节电站，一个航运梯级而存在的，它的先期兴建，将对三峡主体工程带来许多困难；而且，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三峡工程好。林一山力主先上三峡工程。他几次向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周恩来也犹豫了。在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表示了先上三峡的意愿，但因毛泽东不同意，他只好弃三峡而上葛洲坝。

毛泽东的信念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高于一切。一旦发生战争，高坝（三峡）太危险，低坝（葛洲坝）出事则损失较小。因而，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认定上葛洲坝工程优于上三峡工程。但是，林一山的“反面意见”他又不能不考虑，于是，毛泽东在1970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就葛洲坝工程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富哲理的批示：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这段批语，“赞成派”深感鼓舞，自然不言而喻；“反对派”亦感欣慰，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的意味，并没有将反面意见完全排斥在外。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注意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眼睛向下，虚心求教，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派飞机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等人接到南宁时，有人反映：“还有反对三峡工程的。”毛泽东说：“那好，把反对三峡的工程的人也接来。”结果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正反两种意见的陈述和交锋。

此风一开，技术民主与科学民主得到发扬，三峡论证才得以步步深入。

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之中，“个人崇拜”盛行之时，毛泽东尚能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并在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还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人们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表明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果然遇到重大技术难题，工程无法进展。周恩来当即决定：“工程必须停下来！”并很快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的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因为葛洲坝工程开工时采用了“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非科学方法，只有总体设想而没有技术设计。

葛洲坝工程出现的重大挫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他明确说过“要准备修改设计”；也证实了周恩来的担忧，他说他搞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证实了林一山的推论，他早就指出先建葛洲坝工程会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

但是，既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得令于困境之中，林一山也就无可推委了。他亲身经历了工程的全过程，深切了解工程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尽管问题不少，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解决。重振葛洲坝，他是充满信心的。周恩来却为他捏着一把汗：看来你林一山有些满不在乎；“你要是把葛洲坝做成了，你就给党立了大功！”

林一山不敢怠慢，全力以赴。他率领精兵强将，只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指导施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扫除了一个个施工障碍。自1974年重新开工之后，葛洲坝工地捷报频传。

1981年1月，长江截流成功。

同年7月，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90年，葛洲坝工程胜利建成。

至1991年底发电总量已达1000多亿度，创利税40亿元，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

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如今又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建成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重大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

第一，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了重要的“实战准备”。

第二，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泥沙论证，生态环境论证等等），使各种分歧意见更趋统一。第三，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已使国内大多数水工专家相信，“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这支科技队伍完全能够设计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任何水利工程。而这支队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设计能力是在葛洲坝工程实践中得到提高的。

第四，人们已经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巨大效益；而三峡论证表明，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将远远胜过葛洲坝工程，这样，人们就能经由葛洲坝工程的成功而激发起对三峡工程的巨大热情，使三峡工程建设得更快更好。

人们从葛洲坝工程今天的成就，看到了三峡工程明天的光辉前景：

——葛洲坝工程几乎没有防洪效益（总库容仅15.8亿立方米）；而三峡工程却有巨大的防洪效益（总库容多达393亿立方米），可使长江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从根本上解除长江上游洪水对长江中下游人民的常年威胁。

——葛洲坝工程装机总容量只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41亿度，而三峡工程的装机总容量多达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度，约是葛洲坝工程的6倍左右；——葛洲坝工程可改善三斗坪至宜昌河段约40公里的航道，而三峡工程却可根本改善从三斗坪上达重庆600多公里的航道，它开辟了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的巨大供水（城镇用水、南水北调）

效益、旅游效益、水产效益、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现代化等等的综合效益，也是葛洲坝工程无法比拟的。

总之，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前者以后者为主体，后者以前者为辅助；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逻辑的进展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四、兴利与除弊： 决定三峡坝高的多样性统一

举世瞩目的大三峡工程，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文的方方面面，包含着一系列矛盾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峡工程矛盾体系，即矛盾的“多样性统一”。诸如：建坝与移民的矛盾；库区淹没与下游防洪的矛盾；工程投资与工程效益的矛盾；工程造价与经济承受力的矛盾；工程兴利与工程负面影响的矛盾；防洪与发电的矛盾；发电与用电的矛盾；发电与排沙的矛盾；排沙与通航的矛盾；美化三峡景观与有损三峡景观的矛盾；新创生态环境与旧有生态平衡的矛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用毛泽东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和矛盾学说来分析这些矛盾，可以得到诸多教益。我们可以看出，这众多的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又通过三峡主体工程的坝高集中体现出来：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规模越大，投资越多，库区淹没越多，移民越多，整个工程难度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水库库容越大，防洪效益越好；越有利于通航和发电，经济效益越好。反之越少。

三峡大坝越高，则发生战争之后的危险性越大，对下游的水灾威胁越大；对库区及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单位成本越低，工程自身效益（投入产出比）越好；反之越差。

三峡工程论证的本质，就是要在这一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中抓住最基本的关系，在众多的利弊权衡中找出最佳适应的“度”，进行技术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论证。

对于三峡工程这样事关全局，事关众多地区人民重大利害关系，事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近期与远期发展态势的巨型工程，其技术和社会的可行性研究，应当由一个超然地区和部门利害关系、统揽社会全局的主体来统筹规划。这是工程论证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所要求的。

毛泽东的治水思想和治水实践，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50年代，当三峡论证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明确说过：我们中央不仅要考虑内政外交大事，而且也要考虑具体的重大工程建设问题，如大三峡、铁路通拉萨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不仅为三峡论证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责成周恩来代表中央决策层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此后，中央抓大三峡的思想和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到江泽民、李鹏等，都亲自过问、指导和部署三峡论证工作，在人大通过议案之后又具体领导实施这一议案。

可以说，没有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统领，就没有新中国三峡论证的显赫成就。

从另一方面看，三峡论证又是广大专家学者辛劳的结晶，是知识界、学术界、工程技术界集体智慧的杰作。

因此，将三峡工程论证的总体成就看做是中央决策层和专家学术界协同完成的科学创作，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就一目了然了。

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又恰与三峡大坝高水位的“200米方案”、“150米方案”、“175米方案”三个方案的先后出台同步，因而可以用“200—150—175”这一组数字来标志其论证的曲折历程。在这组简单数字背后，深藏着天灾人祸的肆虐、国际风云的变幻、国内政治的涟漪、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华的腾飞等诸多因素的变迁和考量。一部三峡论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40年的中国现代史。

1.200方案。即“高坝”方案：大坝正常蓄水位为海拔200米。

这是50—60年代的论证方案，考虑的重点是防洪。到70年代，三峡论证的重点转移到葛洲坝工程上，以取得修建三峡工程的实践经验。

1958年以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的中苏专家曾拟定过260、235、220、210、200、190米等6个正常蓄水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三峡正常蓄水位愈高，则技术经济指标愈优越，防洪、发电、航运的效益也愈大。但正常蓄水位高于200米以后，重庆市区以及邻近的农村都将造成较大的淹没损失。

权衡利弊，毛泽东主张：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高程不得超过200米。

于是，1958年的中央成都会议决定：“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此后，三峡工程论证就按这一要求向纵深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

然而，只是由于社会政治而非工程技术的原因，三峡工程未能上马，先上了葛洲坝工程。

2.150方案。即“低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高程为150米。

这是80年代上半期的方案，考虑的重点是发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电力日趋紧张，且煤炭运力严重不足，为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电子能源问题必须解决。这样，三峡工程又提到历史的前台。

198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提出了4个候选方案：一是200米高坝一次建成使用方案；二是“高坝中用”方案，即按200米高坝一次建成，分期移民，分期蓄水；三是150米低坝方案，即分期建设方案，先期按150或128米建坝，预留加高的位置，尔后再加高至高坝程度；四是分级开发方案，即在三峡河谷地区分别建几个低坝代替一个大坝的方案。经论证分析：分级开发方案经济效益最差，高坝方案的综合效益最好。但高坝方案一次性投资太大，移民较多，也有明显的不足。

1982年，掂量利弊得失，邓小平明确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亦先后对低坝方案投了赞成票。

于是，三峡论证按150米方案继续进行。1983年3月，长委会（长办）按低坝要求提出了《三峡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一报告，并最后确定：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

工程定于“1986年正式开工”。随后，建立了“三峡省筹备组”；首批施工队伍开进三峡坝区搞前期准备。三峡工程开工在即。

然而，就在此时，重庆市政府提出，150方案回水到不了重庆，重庆通航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交通部支持重庆市意见。同时，人大、政协、政界、学术界、知识界的各方面反对意见也蜂拥而至。重新论证不可避免。

最高决策层首先提出动议的，正是邓小平。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三峡工程要有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开工，不会草率从事。这才引出了175方案的出台。

3.175方柔。即“中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位175米，坝顶高程185米。

这是1986—1992年的方案，也是最终方案。其考虑的重点是发挥综合效益，尤以防洪、发电、通航为重，远期还与“南水北调”相配合。与前两个方案相比，这是一个更成熟的方案，一个真正“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

在三峡论证的漫长历程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再论证、审查、再审查，每一次都是超过前一次的更为严格的科学检验。而这一次再论证和再审查之严格，近乎苛刻！

——“三峡建库后会不会因泥沙淤积而变成泥库？”中国专家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和方案已在80年代初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那么，三门峡水库改建和葛洲坝工程的成功不是检验过了吗？但葛洲坝是低坝、三峡是高坝；三门峡在黄河，三峡在长江，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做了大型泥沙物理模拟试验，并且分别在武汉、北京、南京用不同方法做，结论完全一致。然而，仍然有人持怀疑态度，要求丹江口水库13年来泥沙运行的实测数据与试验相对照，看看是否相吻合。对照结果证实：模拟试验的结论是可靠的。仅这项再论证，就花费1000多万元人民币。实际上，三峡是世界上处理泥沙淤积最理想的河槽型水库。

——“水库蓄水后会不会诱发地震？”诱发地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抗震处理不影响大坝安全。世界上建了几十万座水库，还没有因诱发地震而垮坝的。专家组重新论证的结论仍然是：坝址适宜建混凝土重力式高坝；建库后虽不能排除局部地段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但影响到坝区的烈度小于设计的抗震烈度，不会对坝区安全造成威胁。实际上，三峡工程地处弱震区，其防震安全远大于其他一些水库。

——“库区百万移民能够妥善安置吗？”移民问题常常是制约水库兴建的一大难题。“文革”中，成千上万移民上访请愿，就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之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是采用“生活安置型移民方式，只管给移民盖房子安顿生活，不管生产发展和生活出路，造成许多移民到新区后生活无着。如采用“生产开发型”移民方式，则可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生活出路问题。1985年以来，国家每年花费2000万元用于三峡库区“移民工程”试点。从试点情况看，试点区移民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有些已经很快致富。因而，移民自愿接受和衷心拥护这一新的移民方式，热切盼望工程早日上马。实践证明：新移民方案是科学的合乎民意的。实际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三峡工程的兴建必将对三峡库区人民的经济现代化和生活现代化带来明显的改观。

——“一旦发生战争，三峡水库会造成灭顶之灾吗？”战争是无情的。

但三斗坪坝址的选定却可大大减弱溃坝造成的威胁。如果选南津关，溃坝洪水直赴长江中下游平原，后果不堪设想。现选在三斗坪坝址，则三斗坪到南津关有 40 公里之遥，其中有 20 公里为峡谷地段，还转了 3 个 90° 的急弯，这就能够大大削减溃泄的洪峰。大型水工模型试验研究表明：当三峡水库达到最高蓄水位 175 米时，即使大坝瞬间全溃，库水汹涌下泄，经过峡谷挤压减弱，并配以荆江分洪，沙市最高水位才 45.75 米，还低于荆江大堤 1.25 米。结论：三峡水库若因战争溃坝不会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毁灭性灾害；灾害是局部的，并且可以预防减轻。实际上，战争是有征候可察的，可以事先开闸泄洪，降低库水位到 145 米以下，从而增大安全系数。

这次论证的基本结论是：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参加这次论证的 40 个专业的 412 位专家中，除 9 位因持不同意见没有签字外，402 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至此，最后一次全国性三峡工程大论证大审查遂告一段落。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 1767 票赞成，177 票反对，644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至此，三峡工程论证获得最后批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终告完成。

三峡工程论证之科学，决策之民主，处置之慎重，在世界工程建筑史上也是创纪录的！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十分自信地告慰于我们的开国先辈：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三峡工程大论证定会结出丰硕的社会经济之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定会变成光彩夺目的现实。三峡论证的科学成就，渗透其中的毛泽东治水思想和哲学辩证法宇宙观，将与壮丽的三峡工程一道，成为纪念毛泽东功业的历史丰碑，供后人景仰、缅怀和追寻。

（作者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

毛泽东的发展观

景体华

经济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名著的“共产主义”一节中，曾明确说明：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一点，在建国40年后，显然我们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本文将围绕经济发展主体的问题，展示毛泽东建国以来的艰难探索。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主体观，有着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然而正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这句话不幸为我国几十年来探索的坎坷历程所证实。毛泽东深邃的思考，以及各项政策的实施，曾使几亿人为之震撼、参与其中，并为之奋斗。伟大的成功和轰轰烈烈的失败，不仅浸透着开创性历史活动的艰难，同时也孕育着独具特色的毛泽东的发展观。

“人民”的构思

毛泽东在把他的坚实的信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化为他的社会主义实践时，是颇具匠心的。

毛泽东历来主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参加到我们的事业中来，是我们的事业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如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我国现存的经济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阶级。然而他没有满足于这一水平。他所投身的中国的实际，要求他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他所引导的洪流。毛泽东不仅重视人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属性，同时也很看重人在不同环境下的政治态度，以及在不同政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辩证的逻辑，思考着对立阶级的政治态度的转化，以便在一定的条件下吸引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给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无畏战略提供了一个可以驰骋的大舞台。

在建国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入分析了我国现存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存在的不同社会集团的阶级属性。唯物主义的详实的分析，同时也提出了问题：在先进工业只有百分之十的这个国度里，能否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可否居领导地位，谁又是建设新中国的依靠力量呢？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立足于这样的一种落后的经济结构。马克思预言东方民族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也不可能说明如何操作，怎样跨越。但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要实现马克思论证的人类理想，就不能仅仅站在马克思已经铺设好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基之上原地踏步。毛泽东勇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价值。他在采用经济标准分析阶级结构以后，又慎重地分析了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以及这些阶级同我们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用“人民”这个范畴，把推动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创造主体概括起来了。

这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划入“现阶段”人民范围的四大阶级。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鲜艳国旗上大星周围的四颗小星。正是这四颗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经济活动的主体。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阻滞力量，反而走入了推动阵营的一方。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的一种“超越”。正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显然，这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化。建国后，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保证了人民——经济活动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也保证了他们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地改造着自己，顺利地步入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对活动主体的认识，有着以下几个特点：1.毛泽东所说的动力即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群体。他把这个群体概括为“人民”。2.这个“人民”是历史范畴，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基本利益一致的不同阶级的集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基于又不拘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把握各个阶级行为背后深层动机的条件下，又精心地触摸到一定历史环境中特定阶级政治态度转化的契机，化敌为友，扩大了“人民”的范围。3.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是上述思想的主旋律。它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引导工人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过程中，在客观条件提供可能情况下的选择意识和凝聚力。4.毛泽东既考虑了前几代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也考虑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面前，审时度势，带动了可以携手前进，到达社会主义彼岸的各路大军。5.在毛泽东看来，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人民”中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必须经历各自的改造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改造，“人民”才能充分发挥出主体的作用，并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步入社会主义。

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弘扬是十分壮观的：引导个体的、分散的、古老的农业，从农民可以接受，甚至是自己创造的各种互助组、合作社，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很短的时间内，5亿农民自己起来丢掉延续3000年的旧的生产方式压在身上的包袱，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一项伟大事业；而城市手工业，也从供销环节入手，采取多种形式，完成了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运用了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在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完成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样急骤的转折，牵动着几亿人关于自己利益的思索。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在思索中去参与变革。是积极，是消极？是去创造，还是去抵制？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虽然在这个大变革中有急躁，有失误，但是，在毛泽东对中国现阶段人民由四大阶级组成的论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积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中吸取营养，把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理论化，上升为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如此引导和政策艺术，使得潜含着暴风骤雨，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选择，竟在和风细雨中变为亿万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

在这场伟大而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中，人民群众的参与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前进推动者的主体作用的弘扬，是毛泽东在那个特殊历史阶段对我国社会 and 经济发展主体认识的真理性的一个很好的检验。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治国安邦最高决策者的社会价值观。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群众，而党和政府的领导，则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过这种“主仆”关系。但是随着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的建立，毛泽东发现，作为主人的人民群众，其主动性、创造性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仆代主行事，主是当家不做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意味深远的探索。

原来设想，国家所有制，意指全体人民是资产的所有者。人民对资产的经营和管理权力，将通过国家和政府来行使。国家和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人民权力的执行者。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

这种高度集权型的经济管理体制并非我国独有，它是从苏联引进的。在建国初期面临资金不足、技术水平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这种体制将生产的计划、指挥、组织、监督、调节等各种权力集国家之手，使国家得以迅速动员和集中起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使用，为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在国家作为经济活动指挥者、管理者的角色独揽大权的同时，在经济活动的中层和低层，却悄然无声的发生着如下一系列变化：

1. 企业本来是经济运行中独立活动的经济实体，但是，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一切计划都由国家决定，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必须按指令进行。企业完全处于执行命令的被动地位。即使计划下达的任务无科学依据，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的需要相脱节，企业也必须去无条件地完成。当然，企业也不需要为产品的无销路和任何形式的亏损担忧。企业在国家父爱的温情中，独立经营的功能和主人翁责任感都严重退化。

2. 通过淡化企业独立自主性这个中介，实际上也淡化了广大职工自己管理生产，行使管理主体的权力。因为，企业中的职工就是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也无权决定企业的计划、经营和产品的分配。另外，企业中的分配制度也没有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自然逐渐淡漠。实际上，这种体制告诉我们，经济管理权力越是集中，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就越是远离劳动者，成为劳动者听得到而摸不到的空泛的东西。国家和政府成了经济活动真正的主体。“仆人”反客为主。

毛泽东非常敏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尚处高潮时，他就发现了上述问题的苗头，加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苏联模式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深感问题不容忽视。他高瞻远瞩，决定不再跟在老大哥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要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他看到高度集权型管理体制束缚人们积极性的一面，主张改革它、完善它。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得人民群众真正作为主体，其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弘扬。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讲话和实践来看，在如何弘扬人民群众主体精神问题上，他思路活跃，敢于抛弃旧模式，另辟溪径，但是也存在探索中的自我矛盾和逻辑悖论。

毛泽东非常担心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束缚地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独立创造性。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正视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中央集权

过多的弊病，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设想概括为两个重要关系予以论述。

首先，他提出了打破苏联大一统模式，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思想。他谈到：“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的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毛泽东注意到照顾地方利益。他所强调给予注意的特殊地方利益，是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所以，毛泽东的分权思想所追求的是一种维护全国整体利益前提下，各个地方展示其多样性、适合本地特点、各显其能的生动活泼的建设局面。

关于在经济建设中中央和地方分权、允许地方有一定独立性的思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以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基本方针，纳入了总路线的实施。这一年，仅仅在几个月内，就把各部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80%下放给了地方，由地方进行管理。

这次权力下放，由于强调的仍然是维护全国整体利益、追求的是不同地方利益的一致性，不承认各地方也是一个层次的利益主体，代表着一方人民的相对独立的利益；也不承认不同地方的利益差别，所以，这是在原体制不变情况下的一种简单的行政权力下放。地方象孩子，原体制不变，他就仍然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给他一部分权力，看管得稍松一点，他就无序地乱动，甚至触动整体利益，因此1961年只好回收一部分权力。这样试验性地探索，1964年又进行了一次，结果几乎是1958年探索的简单重复。人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因为这样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动原有体制，所以，放也容易，收也容易。几经试验，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开这个怪循环之谜，也没能弥补他的理想化构思和现实操作之间的断裂。

毛泽东注意的第二层次，是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仍然是在维护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大前提下，来谈工厂、企业的独立性问题的。他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是从哲学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然而，从这一高度抽象的理论层次，一回到经济学，回到经济活动领域，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在没有一个大的改革的情况下，马上会碰到财政预算软约束、企业的物质利益等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1958年国营企业开始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企业可以留一部分利润自行使用，然而这部分是极少的。国家对企业的深厚的父爱，泯灭了企业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对国家的依附性和地方对中央的依附性一样，是高度集权体制所维系的利益一致性的必然产物。要给地方和企业真正松绑，唤起它们作为某个层次的主体主体意识，创造性地参与经济活动，必然要重新从理论到实践探索全民利益一致性的本质和内容。而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是一个不存在问题的封闭领域。所以，他在高度抽象的哲学王国里描绘出的高度集权下的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在现

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注意的第三层次，是基本的工农劳动群众。

50年代初，毛泽东看到苏联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领导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就提出异议。他认为，在我们的工厂里，“一长制毫无疑义的是不要了”。党的八大决议，以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代替一长制，同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1961年9月试行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一并列为国营企业的规章制度，正式实行。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制度，认为职工参加管理应当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项根本内容。

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农业国，所以，毛泽东十分注意工农联盟，重视农民在工业中的积极作用。鉴于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积累资金，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毛泽东特别指出，我国的政策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保护和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但是，在毛泽东的探索中，也显现出了与以上作法背向的思路。

毛泽东十分警惕农民的自发势力，以及小生产印在农民身上的狭隘性和落后性。他希望通过集体化，使工人和农民紧挽着手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理想世界。然而，他忽略了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下，劳动仍然是工农群众谋取生存、获得温饱的手段。集体化实现了联合劳动，但是，个体劳动的差别仍然是客观事实。劳动的谋生性质，要求承认个体劳动的差别，并在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上体现这种差别。毛泽东没有从理想回到现实中来，客观地体察这种差别在劳动者潜能释放上的重要的驱动作用。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另外两方面的、似乎对他来说更重要的问题。

一是农业所有制形式的进一步公有化。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五亿农民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的。这一跨越，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广大热恋着土地的农民，从此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在毛泽东“社越大、优越性越大”的思想指导下，集体化的每一个台阶都没有来得及认真探索，而是一味求大求公，甚至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两年后，便又催生似地完成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出现的“共产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对人民公社的考察，使他意识到：人民公社中实行的供给制，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占了便宜，这种制度不会给生产带来好处，反而会带来坏处。毛泽东立刻动手刹“共产风”。接着在12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了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的建立并不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决议针对一些公社在分配上搞全面供给制的现象，指出，在社员的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以上作法仅仅使共产风的风力有所缓解。这不仅在于这个决议坚持保留了部分供给制，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大与公，在更大更深的层次上，把原来的高级社就没能解决的“大锅饭”巩固下来了。这种平均主义和供给制一起强化了对社员个体劳动差别的平抑，压抑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使得社员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主动精神在快速实现的越来越公、越来越均的“理想”中，变得越来越淡漠。

毛泽东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警惕小生产在集体所有制内部的重新滋生。包产到组、到户，是自合作社诞生以后，不少合作社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于生产责任制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在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劳动方式给传统的家庭劳动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了个体劳动的差别；分配上又很自然地把个人劳动的强弱和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在承包的范围内，劳动者是主体，起码可以在怎样生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和创造性。正因为这种劳动方式适合我国的国情，所以，虽然几经砍压，仍然出现几度苏荣。甚至是一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就会引出农民群众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实际上，富有创造性的广大农民，只不过希望那越来越大、越来越公的过于理想化模式，从天上掉到地上来，真正在他们的乡土上扎根、生长。农民群众的选择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思索。1961年，中共安徽省委首先肯定了这种作法，主张加以支持，并引导其向保证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在生产计划统一的条件下，健全为一种“定产到人、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度。中央决策层中有一些同志赞成进行这种探索。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和接见共青团干部的两次谈话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在他看来，生产关系究竟采取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7月，“包产到户”的劳动方式像旋风似地为约20%的农民所采用。

然而，在事过两个多月后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这些倾听了农民的呼声，总结了农民群众经验，代表了农民群众希望的有益探索，却被视为妄图毁灭集体经济一股单干歪风，予以取缔。

毛泽东力求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下，辩明主仆，使其各自到位。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脑中的空想成分，竟成了实现目标的障碍。

在如何发挥不同层次主体的积极性问题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探索，但是，总的来说是不尽人意的，除了上面说到的一系列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毛泽东不敢引入市场经济的驱动机制。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可以绕过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个“卡夫丁峡谷”，却无法绕过商品经济的宽阔地带。

跳出“周期率”的探索

毛泽东一方面力求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得到充分弘扬；另一方面也思考着人民的“勤务员”怎样才能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这后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晚年，几乎成了他注意的核心。

早在建国初期，当毛泽东体察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公仆队伍中，出现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时，他就以高度的警惕把这种现象列入了执政党建设中的一大公害。

毛泽东熟知中国历史，深谙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兴亡天平上的分量。所以，在浴血奋战28年后，将要进北京时，毛泽东的重负犹如进京赶考。正象他的警卫回忆的那样：进城的车即将出发，毛泽东上车之际，幽默地对周恩来说道：“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此话的深刻含义就在于：一定要跳出古今“其兴也 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早在 1945 年，毛泽东答黄炎培的一席话，已经道出了真谛。当黄炎培问及中共诸君想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进城以后，毛泽东忠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1951 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揭发执政党和政府肌体上的腐败，以铲除公害。他决心之大，坚决、果断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俩人就是证明。毛泽东以行动向人民表明：决不允许李自成的悲剧重演。

然而随着公有制的独占鳌头，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实现，毛泽东发现，国家不仅依旧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没能避免官僚主义在其肌肤中悄悄地产生出来。毛泽东在困惑中激发了另一方面的思考，即过分地夸大了现实中官僚主义的滋生及其作用，以至事与愿违，最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避免国家与社会的官僚化，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以前的苏联和东欧诸国在内，都未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的大胆探索和深刻的思考，有着深远的意义。然而，他却从一个正确的起点走向了谬误。如何理解这正确与谬误的转换？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虽然三个反对的对象中，有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在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如何抵御糖衣炮弹的袭击。

第二个阶段，自 1956 年始，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出乎意料地加速完成，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轻松感。因为恰恰就是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波匈事件连续发生。无独有偶，中国也发生了人民群众发泄不满的罢工、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的事件。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他知道，群众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可能解决的，有些则是不适当的，要求过高。但是，他没过多地责怪群众。他认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原因，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的角度，面对 1956 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内的矛盾，突破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神话，毫无畏惧地孜孜探求，并以哲学的深思凝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政府、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主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而毛泽东认为立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发动全体人民帮助执政党整风。

整顿党的作风，是 1956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来的，而在 1957 年 4 月底正式开始，则是以毛泽东 1957 年 2 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进行的。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不是几次突击的运动就能解决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但是，这是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直到这里，毛泽东的思路都是明朗、清晰、正确的，是指导我们今后探索的思想财富。

第三阶段，是反右斗争以后。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偏离了他原来的正确轨道，得出错误的结论：“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此，毛泽东开始把官僚主义作风，逐渐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

标志着这一思想变化的，是50年代末毛泽东读《国家与革命》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思考。他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既得利益”问题。他开始思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仍然存在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分配关系的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权力会带来利益，既得利益使得一部分当权的党员迷恋于“官位”，这样，人民的利益比起个人的特殊利益，就不再是重要的了。在他看来，这正是进城以后，官僚主义者不断生长出来的经济根源。官僚主义者保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不愿意支持群众的改革热情，而更安于现有的制度、趋于保守。由此开始，在他再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他又加上了一层意思，即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的集团”。

毛泽东逐渐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充实着对官僚主义者的认识。

从经济上说，他找到了权力——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权利”的土壤孕育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官僚主义在理论上不再是仅仅取决于个人品质的一种漂浮不定的作风和习气，而是植根于经济关系之中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了。而且，他认为，它确实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正是基于此，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存在一个与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理论逻辑上只不过是必然罢了。

从政治上说，毛泽东把他认为的政治态度上的保守性，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和“既得利益”也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右倾、保守、不愿意变革，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即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政治特点，也是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特点。这一认识，使得他在1964年底，最终把他认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党内的民主派”和“官僚主义阶级”归成一路人，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又明确称其为“党内资产阶级”。

应该说，在毛泽东的探索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在他的思路转换上有着重要的影响：1. 他开始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如果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及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存在为来源的话，1959年之后，他竟然逐渐找到了新的剥削阶级从社会主义滋生的土壤。这种社会主义阶级关系的新认识成了他观察一切重要问题的基点，也是他失误的深层原因。2. 人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也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路线斗争，转化为敌我矛盾。处理这种矛盾不能再用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党内的这部分当权派，已经构成了和平演变的核心力量，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只能用自下而上的群众大革命的形式，打倒他们，

把他们手中的权力重新归还给人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导演下来的。

毛泽东关于如何跳出“周期率”的答卷，以恢弘的气魄、正确的思想开始，却以轰轰烈烈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其留给后人的教训深刻而且沉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反对人民公仆的队伍官僚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把由国家攫取的权力真正复归于人民群众，则是今后从理论到实践探讨国家消亡的一个长期的、由几代人来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于执政党中的官僚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争官位、争待遇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气。但是夸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把反对官僚主义纳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轨道，甚至把官僚主义者视为一个阶级，则步入了难以自拔的迷津。

2. 在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中实行民主，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和各级当权者，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是对的。但毛泽东忽略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也要用法律来完善和保护。不注意法制建设，期望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像搞土地改革或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样操作，来反对官僚主义，或搞党内斗争，都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所以能在新中国历史上演出的重要原因。

3. 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所以能够构成他“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是和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有关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意指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的权利。这种平等权利消除了提供同等劳动，得不到公平分配的不公平，却没有消除不平等的个人天赋、不同的工作能力，以及家庭人口多少而形成的分配不均。这一点和毛泽东理想的大同社会显然是不一致的。

虽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的平均分配是不现实的，超越了现实的生产力和人们的觉悟水平，然而他仍然怀念革命战争时期在干部中实行的供给制，欣赏这样的公平。当他认为有条件时，他愿意促进这样的公平尽快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对出现供给制的态度，以及在以后的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认识到不妥，但又保留一部分供给制的态度，都说明了供给制所体现的公平分配，在毛泽东观念深层的理想社会里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理想，那么对现实的影响尚且遥远。然而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真挚地追求，热切地期望其尽速地实现，使得他在观念中经常是以这样的公平分配为参照系，来评价现实中的分配制度的。所以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物质刺激，奖金也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的比较并没有仅仅限制在分配领域。他和供给制所体现的人际平等关系相对照，误认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加以反对。他认为：“资产阶级权利”，一部分必然破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等级特权，是封建主义的特权观念，与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毫无关系。但是，正是从这种误解出发，使“资产阶级权利”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滋生的经济根源。

毛泽东用马列主义原则不断地改造中国传统的平等观，然而，在他的公平分配的思想里，仍然留有农民均富思想的痕迹。这种平等观，连按劳分配中实际上存在的不平等也不能兼容，带有很强的空想色彩。用空想的标准去校正现实，是毛泽东构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误的重要原因。

在对待“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上，还反映出了毛泽东公平分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他知道商品生产和交换、按劳分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他却担心由此会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始终不能落落大方地接受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市场经济，并大胆地启动利益驱动机制。在他的思想深处的天平上，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各为两端的话，他总要把砝码更多地加在后一方。他思考的是两极分化，产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会葬送社会主义，却没有想到普遍的贫穷也会自掘社会主义的长堤。这就是他在六、七十年代，置经济发展的时机于不顾，却用心地去导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然而，历史无情，苏东剧变告诉我们的，却是与毛泽东相反的结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经济竞争始终是第一位的，它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存亡。

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思索与实践，是留给我们的不朽的精神财富。虽然其中有悲壮的失误，甚至会给几代人留下沉痛的回忆，但是，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深深地进入理性的沉思，会意识到，这位站在历史之巅的伟人，其成就与失误都会像历史交响乐章的不同旋律那样，长久地撞击着后人的心灵，指导并校正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向。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第273页，第395页。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157页。

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59页。

“资产阶级权利”原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后经讨论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引自李君如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28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

王彦

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到主题鲜明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现过两次世界大战，同时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革命运动，即从俄国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的削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大批新兴国家的出现。20 世纪第二个阶段的主题是争取和平与发展，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发展任务，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进入了一个由技术革命带动的经济发展时期。同时，发展需要和平。在这一背景下，不同制度以及相同制度国家之间、不同发展水平以及相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在 20 世纪这两大阶段中都充当了历史的主角，而毛泽东与邓小平则同为跨越这两大阶段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开拓者和探索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多年里，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观。本文以下所要讨论的，主要不是他的一些具体经济思想，而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理解，以及关于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方针的若干原则认识。尽管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于正在继续探索发展道路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说，研究毛泽东的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种发展观如同他的整个学说一样，是专属于被剥削与被压迫人民的，而这种剥削与压迫至今仍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背景

一种杰出的思想，总是一定时期人类实践的集中反映。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中走来的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回应。

如前所述，革命与发展构成了 20 世纪历史的两个阶段。然而在革命与发展之间，并没有一道把二者截然分开的万里长城。在时间上，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也是相互交错的——一些国家进入发展阶段的时候，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火之中；在内容上，它们是相互区别的，也是相互渗透的——在革命的主题中已经蕴育着发展的主题，在发展的主题中又继续并深化着革命的主题。这是我们讨论毛泽东的发展观所必须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革命的主题中蕴育着发展的主题，这是容易理解的。中国革命的发生，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倍受欺凌的历史中痛感需要发展，而发展的道路又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阻断。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说过，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对象，是因为它“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而“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总之，不同阶级对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也就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考。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已经对中国发展的基本道路作出了原则的回答，当然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问题在那时还不可能作为主题展开。

革命的胜利使得发展作为主要问题提上了日程。但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民族独立国家来说，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这些国家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使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他们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面优势掌握了这个市场的垄断权；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政治和文化优势掌握了价值导向的支配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发现：“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自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同的外围。”“外围”对“中心”的依附不仅是生产上和贸易上的，也是政治上、观念上和体制上的。“这就加强了外围模仿中心的趋势，照中心的样子亦步亦趋。我们力图采纳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追随他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并复制他们的体制。”“依附理论”虽然有很多缺陷，但它正确地揭露了下述事实：在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关系；“外围”对“中心”的经济依附导致政治依附和霸权；经济和政治的依附还扩展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发展概念和发展道路。一种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仿”、“追随”、“复制”和“亦步亦趋”。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排斥这种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发展并有选择地鼓励和扶植这种发展。另一种发展概念和发展道路则是垄断资本主义所极力排斥的，这就是摆脱依附的发展，试图探索新的道路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在发展的主题中，事实上仍在继续并深化着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革命主题。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摆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地位进行了顽强的抗争，然而真正可能超过资本主义、并使全世界摆脱资本主义束缚的唯一选择是社会主义，当然这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谁战胜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如何走这条道路，需要几代人的艰苦探索。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可能依附资本主义而发展。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这一本质方面。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纳入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范畴，强调必须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的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强调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使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强调依靠人民群众，走自力更生的建设道路；强调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打破资本主义的常规、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不但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同时，我们在讨论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形成背景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历史条件对这位巨人的限制。毛泽东所领导的建设事业，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起步的，是在对许多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还缺乏认识的条件下进行的，又是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和战争威胁下进行的，因此，就不可能不出现挫折和失误，而他的某些正确设想在当时也还缺乏实现的条件。今天，当我们回顾他的足迹时，应当看到一些具体的历史场景已经变化，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深化。尽管如此，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也没有摆脱列宁所说的“衰亡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逻辑轨道，只不过这种斗争显得更加曲折和漫长。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包括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中吸取营养的基本原因。

二、生产力与社会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敏锐地提醒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工作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早表述。应该说，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始终是重视经济工作的，在他的心目中始终装着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被压迫人民的思想家，他始终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同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剥削、获得解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同引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发展生产力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首要之义。

（一）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曾经说过：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制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的要求，而且首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的要求。他还说过：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使土地的农民不高兴。这些话形象地说明了，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而解放劳动者的唯一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毛泽东把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同破坏不适应生产力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内在的动力。

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体现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典范。这条总路线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解释这条总路线时，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体（例如他曾把工业化比作一只鸟的主体，而把三大改造比作鸟的两翼），又更多地强调了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作用，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阻力来说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失误，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出现的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过渡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坚持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而恰恰是由于违

背了这一原则。因为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据是生产力的要求，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这种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

（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富裕，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 1955 年说过：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1）。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稳固？从这段话看，毛泽东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或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基础稳固的必要条件（因为不增长就“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如果听任两极分化发展，“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我们的基础就会瓦解。毛泽东在强调“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时，显然更多地是强调了“穷的要富裕”，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穷苦农民是我们更基本的群众，具有更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这种看法是符合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我国阶级状况的客观实际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所肯定的穷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情绪，这是对他极大的歪曲。毛泽东这里所讲共同富裕，是使穷人和所有农民富裕的程度“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把富的“铲平”的平均主义。因此，这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的“越穷越革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允许少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本质上则是并不相悖的。

（三）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对劳动者的精神解放，这是毛泽东关于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道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珍视自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的主人地位，从而使生产力发展从一个自发的过程飞跃到劳动者自觉活动的过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 + 政治（12）。这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根本区别。列宁在肯定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时也指出：“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13）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否摆脱剥削阶级的精神束缚，是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说过，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尚未根本摆脱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状态。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国内几千年私有制残余思想的存在，如果不通过其先锋队进行不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则在精神上也有可能蜕化，从“自为的阶级”重新变为“自在的阶级”。一旦劳动者在精神上沦为资本的奴隶，

还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呢！

这里有一个问题：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否必然导致“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就毛泽东个人来说，确实发生过这样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他对于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他得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他自己曾经赞成过的党的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由于这种判断的错误，他把在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常常是正确意见）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例如把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与“右派章罗同盟”一样称为“促退委员会”，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失。这里我们恰好看到了一个“真理多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的例子：在经济工作中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则是错误的。同样，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但如果因此否定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又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应该防止的另一种片面性。

总之，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看作一个物质财富增长和劳动人民的解放相统一的过程，看作走社会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这里，“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列宁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15）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今天能够比毛泽东当时更正确地从政治上看待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坚持他思想中本质上正确的方面，把握好改革和建设的方向。

三、高速发展战略

毛泽东从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天起，就把速度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把高速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着一种时间上的强烈紧迫感。他把速度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看待，当作关系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看待。他多次提出关于发展速度的设想，例如设想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设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设想几十年或100年追上或超过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又提出工业化的速度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应相应地加快，等等。他提出的一些口号——包括正确和错误的口号——往往都包含着高速度的思想。

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发展速度的具体设想，有些比较接近实际，也有些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发展速度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当时也不够清楚，例如简单地把钢铁等几种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整个发展速度的标志，以及对于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认识不够，等等。在实践上，毛泽东领导下的我国经济建设有过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也有过大起大落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的损失；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总体上不算慢，但也不如预期的顺利。这都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总结的。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高速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毛泽东有过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16）。当然，这些话并不能解释和辩护 50 年代末“大跃进”的错误，可是它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发展思想的本质，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

前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两种战略。一种是尾随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不仅在一段时期内、而且在长期的战略思想上满足于向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或接受发达国家的淘汰技术，甘当资本主义发展队伍中的“二传手”、“三传手”，不追求改变发展水平上的先后次序——这是依附式的发展；另一种是力求打破这种次序，虽然在战术上下排除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但在战略上却以超过这些国家为目标——这是摆脱依附的发展。两种发展战略所代表的，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观，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面和历史观。毛泽东的高速发展思想，意味着中国选择的是第二种战略。

为评价这一战略的得失，我们可以借助一下近来发展理论中流行的所谓“雁行模式”理论。在这种模式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依次排成一支“雁队”，在一个统一市场体系下，从发达国家组成的“头雁”开始依次向较低水平的国家淘汰和转移过时的产业和技术，而只有排在同一位置上的那些“大雁”才有资格彼此构成竞争对手，至于不同位置上的“大雁”，由于产品的技术等级不同，彼此不存在竞争关系。例如在亚洲，“领头雁无疑是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紧随其后，接着是东盟四国……”，但是人们发现，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虽然不是其中的一只雁，但却是一只与雁队比翼而飞的其他种类的大鸟；对于雁队中处在不同位置上的大雁，中国在各种工业生产水平上都具有互补性和竞争的潜力。在某些领域，中国正在或有可能与日本和新兴工业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仍在生产一些低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与东盟四国竞争。”（17）这一情况有如下图：

日本
“四小龙”
中国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雁行模式”对于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部分合理性。对发达国家来说，接受这一模式意味着不必担心发展中国家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阶段内接受这一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现实选择。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模式。中国处于“雁队”之外、部分领域已可与“头雁”竞争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战略选择——争取打破常规的高速发展——是与众不同的，并且这种战略至少已经部分地取得成功。

因此，毛泽东关于高速发展的思想——我们说过，这一思想的本质是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许多重要领域（包括部分基础工业和核技术、航天技术等若干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在速度问题上的失误不是作为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的估计、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包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等)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在经历挫折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进一步研究平衡与不平衡问题,补充了他以前提出过的波浪式前进的思想,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是对毛泽东这方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正确的战略思想与科学的实际决策的统一。

四、依靠群众,自力更生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在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反人民内战面前,他都以自力更生的口号教育全党,并鼓起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勇气。他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8)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

理解自力更生方针,关键是抓住“基点”二字。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外部条件,但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这种思想作为一项基本方针表现在经济工作的许多方面。例如,在资金上,我们并不拒绝外援,但是主要立足于自己的积累;在技术上,我们力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引进的基础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消化;在人才上,我们需要外国专家的帮助,但更根本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才;在对待外国经验上,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但绝不迷信,绝不要任何奴隶思想,等等。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我们在经济力量并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在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甚至敢于迎头痛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靠的就是自力更生。经济发展了,一般说当然更有利于独立自主,但这种发展必须是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发展,没有这一条,经济上的力量就是虚弱的,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也就成了空话。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是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痛苦经验的结果。毛泽东说过:“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19)毛泽东也说过,从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结果“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后是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突然在一夜之间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沉重的历史和现实教训,是自力更生这一思想产生和升华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思想,从理论上说是根源于唯物史观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肯定。列宁说过:“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0)毛泽东多次谈到,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应用“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思想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不把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看作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毛泽东始终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寄希望于成为社会主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精神。自力更生,就是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依赖和依靠。

毛泽东提倡的自力更生思想,其基本精神仍适用于改革开放的年代。谈

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应当划清两个界限：第一，自力更生不等于封建主义的闭关锁国；第二，对外开放不等于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长期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为止，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还在恋恋不舍地回忆这种门户开放主义，但同时，却对中国施行了炮舰封锁。毛泽东在1949年8月针对这种情况写道：“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21）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明白，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事实上也的确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封锁，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谈到国际学术交流时说：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22）。他承认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同时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主张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这些思想，难道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视为“天朝大国”的封建闭关锁国思想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至于今天的对外开放，事实上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力更生的奋斗终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而赢得的一种权利。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封锁，我们只能实行对苏联东欧的开放，这是必要的，但这种开放，后来也被主要来自外部的原因所中断，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被迫在孤立的环境中搞建设，确实也造成一些同志不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思想封闭的缺点，但这并不能归罪于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新的国际国内条件，果断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但他同时指出：“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23）所以，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的对外开放，而决不是帝国主义剥夺中国人民主权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五、发展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1964年，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

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

这段极富哲理的论述，谈到了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生生不息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界运动的认识和改造过程，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一般发展观的概括表述。同时，这段话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现了他对于十余年领导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因此，这也是领会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宝贵资料。

从研究毛泽东经济发展观的角度看，这段论述具有哪些含义呢？

首先，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或者对于被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人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它的规律还没有被我们掌握。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以及世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原则。但是实践证明，在贯彻这些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掌握经济规律，找到一条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十几年来，毛泽东为寻找这样一条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在回顾最初的探索历程时说过：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1955年底到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26）。在争取“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有所得，也有所失，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弯路，他进一步认识到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他坦诚地承认：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27），并提出了读书的建议，亲自组织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总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然王国，从根本上提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的深化。

其次，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充满着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而且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斗争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同阶级斗争有着复杂的联系。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应该给予历史的分析。应该肯定，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思想，则只有实践才能作出回答。毛泽东本人在这种探索中，也曾十分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郑州会议期间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28）。问题在于，毛泽东把经济问题上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影响了他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到底。他曾经实事求是地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提出：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29）。但是，当他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时，则又更多地强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是毛泽东的认识中正确的一面；但是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同的观点可能反映不同人的利益关系，但又不能通通视为阶级斗争而加以简单的处理，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教训。

最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在经济领域里达到自由王国，把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自发的活动提升为自觉的活动。自由王国——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远景的展望。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生产都只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达到了这一自发过程的高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为人类自觉地安排生产活动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要使人类摆脱盲目地被个人利益所驱使的自发活动状态，进入为人类的整体利益而自觉活动的状态，达到真正的自由王国。毛泽东把这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看作一个不断的和漫长的过程，证明他既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又对实现这一理想的复杂曲折过程具有思想准备。尽管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要实现自觉的生产，但是这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精神水平的发展达到很高程度后才可能完全实现。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在一定阶段内还必须学会利用甚至发展人类已有的自发调节生产的机制，这就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在于：为了扬弃资本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但是必要的过程。从列宁到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曾经进行过这种痛苦选择。今天，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道路，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恰恰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我们大胆地借鉴资本主义经验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经验的局限性，必须看到我们终将要扬弃这些经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进入自由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将达到实现人类自觉活动的自由王国的思想，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在本文开头说过：毛泽东的思想是属于被压迫人民的，他的经济发展观也是如此。虽然毛泽东终其一生，在他的面前仍留有许多必然王国，但他已经揭示的真理对正在争取发展的世界人民来说仍然是极其宝贵的。鲁迅在为白莽的《孩儿塔》作序时说过：“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的。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30）鲁迅这里是在用文学的语言评价一部诗歌。但毛泽东也曾说过，他的文章帝国主义者看不懂，只对被压迫人民才有用。在这一点上，和白莽的诗又何其相似！

（作者单位：国家教委高教司）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第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8页。 劳尔·普雷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见《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第187页。（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63页，第1页。（18）（19）（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132页，第1474页，第1507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11）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12）参见《党史通讯》

1986年10月(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80页。(16)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及注[308]。(17)纳谷诚二等编:《发展的难题——亚洲与拉丁美洲比较》,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第75—76页。(2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3页。(22)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23)(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1页,第372页。

(25)转引自《红旗》1965年第1期。

(26)(27)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176—177页,第170页。

(28)(29)参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30)《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卷,第494页。

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庞永洁 扈华林

崇尚变革，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对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加以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实践，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对加快和深化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如何使新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还要不要进行社会变革？变革什么？如何变革？这种变革与旧社会的变革有什么不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时面临的新课题。毛泽东针对这些新的历史课题，一方面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进行新的社会变革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变革奠定了科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创造性地揭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科学原理。

列宁在分析社会发展动力时，曾经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在他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没有能够来得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斯大林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处于“完全适合”的状态中，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甚至承认如果实行的政策不正确，“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这可以说是斯大林认识上很不容易的转变，但他并没有把这个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也没有相应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从矛盾的状况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存在着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从矛盾的性质上看，“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以，这个矛盾一直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被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只不过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革命的性质罢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在这个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状况、性质和运

动规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必然引起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和表现形式，正确指出了通过制度本身加以解决的方向和途径，这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新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依据和锐利武器。

第二，在经济领域多方面探索了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途径。

毛泽东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能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当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变革。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问题。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较早地觉察到照搬苏联模式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一再指出：“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1. 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坚持公有制，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破坏了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毛泽东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如何变革？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探讨。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时，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存在。他在1956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甚至具体提出，让地下工厂成为地上的，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是，这些想法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又强调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急于从小集体向大集体、从集体向全民过渡。在农村合作化刚实现时，毛泽东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11）主张办大社，不久又倡导“人民公社好”，推崇“一大二公”。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认为：若干年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些论述都助长了“左”的思想发展，在短短一两年时间中，农村普遍实现了“公社化”，城市的许多集体企业也转为全民企业，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2. 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并与之相应地结成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完善和发展时，认

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

人们相互关系的矛盾，在旧经济体制下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划分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的中央管理层次和地方管理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强调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3）。并针对现行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又也没有。”（14）统得过多，势必压抑地方的积极性。改革的方向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5）这样，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发挥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国家所处的宏观层次和企业所处的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针对苏联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6）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7）这不仅需要给地方一定的权责利，也需要给企业一定的权责利。为了探索这一改革，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和1964年到1976年期间，先后两次向地方下放了计划、物资、财政等管理权限，并将中央直属企业（包括大中型国营企业）除极少数外，都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也赋予了企业有限的计划、劳动和人事自主权，也允许有少许的留利。但由于这两次放权仅限于行政性的权利划分，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导致了管理混乱，结果两次又都把下放的权力和下放的企业收了上来，始终未找到一条理顺关系的出路。这可以说是在旧经济体制框架内试图进行改革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

3. 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8）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时，认为根本的方针是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纳入到“统筹兼顾”的大格局中去考虑。他首先强调的是搞好积累与消费的分配。针对过分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也形成利益分配过份向国家和集体倾斜的弊病，他提出国家积累，集体积累，都要有适当比例，不能过多。从农业收入分配来看，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和高“剪刀差”的缴纳“贡赋”的方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9）所以，要引以为戒，进行改革。要合理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相互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上，毛泽东从他的价值观出发，一方面强调关心人民生活，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主张“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20）个人收入要有一定的差距，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1）另一方面，又提倡差距要小，主张缩小国家职工上下两方面的差距，缩小军队干部同军队以外干部的差

距，但也不能搞完全的平均主义。到了晚年，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到批判按劳分配，认为它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会产生资产阶级，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很错误的。

第三，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活动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何种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是一个选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必然首先回答的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列宁、斯大林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了突破，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虽然也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看法，并且比他们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评语中，尖锐地批判了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也指出斯大林把两种公有制的存在看作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不完整”的，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同时还针对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的观点，明确表示：这看来是很不妥当的，生产资料有一部分也是商品。并且反驳说：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又具体指出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这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活动也必然表现为商品经济形式。这些开拓性的认识，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前人，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选择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可贵思想。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观念，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不能在生产领域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而当转向强调阶级斗争时，就又丢掉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特别是到了晚年，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商品经济也犯了对待按劳分配同样的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可以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改革带有旧制度“痕迹”的东西，这方面的改革较多地采用了激进的变革方式；另一方面，是改革传统体制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这方面的改革则是在保持原有模式的框架中进行个别环节的调整。对这两方面的改革，毛泽东虽然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但这种探索却被他后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观点排斥了，淹没了。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是这个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指引我国开展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继承了毛泽东探索改革思想的科学内容，又以伟大的胆略、深邃的目光和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彻底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构

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及其成就，正是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在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又进一步说明：“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2）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把这一思想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全面系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理论。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生产力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个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和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正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3）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中深刻地揭示出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积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抓住主要矛盾，也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表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邓小平在我国刚一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就果断地提出了必须“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4）。从此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一页。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具体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革的目的；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动力，是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当旧的经济模式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就必须进行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5）要讲全了，就要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6）任何偏离改革、否定改革的意图，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也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针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认识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7）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决定要不要改革，而且决定如何改革。凡是适应和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改革取向，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改革的取向和路线、方针、政策去改，进行得才能顺利，成效才能大；否则，就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挫，如果出现大的失误或方向性错误，就会使改革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前提和依据。从

这个根本前提和依据出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明确了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的各个环节和方面的总体表现，更加明确地指出：“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28），这个“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9）这就清楚地阐明了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深刻意义。经济体制处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和中间层次。生产关系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首先表现为经济体制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那么，经济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同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仍然不能正确把握改革的内容和目标。邓小平在我国的实践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1962年他就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30）在进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我们进行改革就是改革那种照搬别国的模式，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模式。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生产关系旧的实现形式、旧的模式。这个思想的确立，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认识起了一个新的飞跃。

因此，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邓小平把这一科学认识高度地概括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1）。这一方面说明，随着生产力发展，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是自觉的行动，是自觉地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转变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这种性质及其社会变革的意义，是任何私有制社会也不可能有的。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总结我国14年改革实践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新最高概括。邓小平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2）。这个思想的提出，表明要进行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传统观念、传统模式彻底决裂。但由于这个决裂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人们认识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也需要对新模式框架的探索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与之相矛盾。我国农村改革以及随之掀起的城市改革的开展，都首先触及到这两方面实现形式的改变。邓小平分析了这种改变的必然趋势，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33）同时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34）进而再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变革的新趋势，从生产关系的基本实现形式上，为新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的成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邓小平把写明这一重大突破性科学认识的全会决定，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

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也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明确改革的目标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必须以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中心环节，同时要逐步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个层次改革的开展，为市场经济的城乡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二者各自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又成了深入探索新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实际上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人们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一些人总是难以很快摆脱市场经济即是资本主义的羁绊，往往在改革形势处于新的转折关头，就又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反对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邓小平在改革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遇到的思想障碍和实际问题，一再阐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5），“必须从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36）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去南方视察时，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新形势，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7）有力地回答了多少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这个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坚持不坚持、改变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以何者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能促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才能在新体制中真正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统一的优越性，促使国民经济高效益、高速度地向前发展。这一思想科学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为加快新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最锐利的武器。

三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思想 and 实践，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尝试，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并领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 14 年多时间里，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崭新道路。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改革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的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开辟的改革道路前进。

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深入探索。毛泽东

和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指引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开展。他们所提出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思想，社会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改革的牢固的理论基石。可见，理论的创新指导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而改革实践的发展又在呼唤着理论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党的十四大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误区，说到底理论深化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对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症结所在，对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等等，认识不清，理解片面，致使在实践中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等同于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同于放任自流、任意妄为、想怎么捞钱就怎么捞钱的经济，那就势必出现混乱和失误。因此，为了更自觉地驾驭经济发展的形势，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更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特别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中，要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文选》关于建立新体制的科学思想，及时了解、分析新情况，科学回答、解决新问题，使理论真正成为正确引导改革行动、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准绳和决策指南。

其次，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阶段向深层次发展。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甚至有些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究其根源，仍在于旧体制没有在深层次根本改变，新体制尚未在深层次有效形成。这就极其尖锐地提出：必须加快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要加快新旧两种体制的转变，首要的是明确建立新体制的总体思路。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和 14 年来改革的探索，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大框架主要包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等多种形式，长期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新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关系清楚、经营机制健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开放统一、平等竞争、规范有序、价格合理灵活、资源配置优化，并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相对接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形成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以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社会分配公平为目标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个人创收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相一致的新的分配结构。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的目标，也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途径。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总体规划中：一要把改革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新问题，放到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来认识、来解决，要用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办法清除前进中的障碍，防止以传统体制的老办法，“一刀切”地去处理；二是把生产关系实现形式每一方面、每一环节的改革都放在大系统中加以全面安排，统一布署，从深层次中抓住重点、热点、难点，配套进行，防止顾此失彼，相互脱节，相互冲突；三要把一切改革活动都落实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坚持以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再次，加强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入、全面、统一

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核心能够按照客观的要求，自觉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能够把实现改革的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阶段的任务，变成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在领导改革中，必须认真掌握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积极吸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制定规划，方案、政策、法规，保证社会主义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新体制建立中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难点和宏观调控滞后的缺陷，按照改革的总体设想，在着重进行市场主体塑造的同时，结合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的建立。要通过深化金融、财政、投资、计划体制的改革，加快形成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必要行政手段的调控方式，从宏观上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指导和监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正常运行，积极促进新旧体制转变。新旧体制转变的核心是人、财、物等各种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转变，它必然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面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新关口，如果留恋和把持传统体制下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就会阻挠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和新的利益关系形成；如果以庸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变化，会丧心病狂地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成为改革的蠹虫。体制转轨的时间拖得愈长，腐败现象可能愈严重。因此，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并在加快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各级政府的建设，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提高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自觉性，做改革的促进派，不要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要坚决清除腐败，增强战斗力，大力加强党和政府对改革和建设深入、全面和统一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指挥我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93年3月完稿

1993年7月修改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

（13）（14）（15）（16）（17）（19）（20）（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第768页，第767页，第717页，第829页，第705页，第730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7页，第727页，第727—728页，第775页，第726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19页，第321页，第257页。

《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第29页。

（12）《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22）（25）（27）（28）（29）（32）（35）（36）（3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52—53页，第85—86页，第60—61页，第83页，第82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

（23）（24）（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1页，第222页。

(26)(31)(3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4页,第121页,第99页。

(30)《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及其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发展

包心鉴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为一种辩证发展的过程，必须在改革中前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规律的深入揭示为出发点和根本依据，生动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和方法论，因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又极为明显地存在着若干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涉及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因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它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益于今天伟大改革事业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创造性发展，这种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中，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既继承、坚持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的科学“内核”，又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扬弃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革指导思想若干脱离实际的成分。正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一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在改革目标追求上，毛泽东带有理想化色彩，力图通过改革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更多地注重实际，旨在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使改革真正成为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矛盾？如果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陷于困惑，在实践中埋下隐患。这正是促使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即将完成之时，即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历史原因。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集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要文章。文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尤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指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是实行“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成果。这篇重要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辩证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结构的思想。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

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虽然不是直接出自于毛泽东，但是在“八大”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是同意“八大”的表述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思考。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文中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不久毛泽东即明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以后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这篇重要讲话，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集中思考。

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重要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系统理论的成熟形成。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投注如此大的精力，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就是为了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通过什么动力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实践动机，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观点中，萌生着、蕴含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主要包括：

（1）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过程。社会矛盾运动和矛盾的正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具有长期性。一个矛盾解决了，将会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正是社会矛盾的这种连续性和长期性，构成了社会主义长期的辩证发展过程。

（3）社会主义矛盾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社会主义通过自身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改革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的改革，与技术革新一样，是必然要发生的。

（4）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结构。这种多层次性，决定了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面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5）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康地发展。因此，改革绝不能削弱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以上五个方面，揭示了一条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正

确解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的精髓，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光辉思想，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思想理论的提出、形成和完善，渊源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和改革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基本出发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前提，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为目的，这本来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事情发展的结果却与毛泽东的初衷相悖离，不久即导致了1958年到1978年长达20年的“左”的倾向。这种历史现象发人深省。这种历史失误，缘于对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认识。毛泽东一生以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为己任，以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尽快向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迈进为崇高理想。这种伟大的思想和品格，同时也带来了他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的追求。这是1958年以后他在领导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上连续犯急于求成错误的一个主观因素。当然，当时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由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还缺乏成熟的经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激发的高涨热情，这一切，都是进一步促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生产力方面大跃进，生产关系方面大过渡，上层建筑方面大革命，以及消灭社会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等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过分理想化追求的倾向。当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已经发生相当大差距的时候，他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革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避免改革犯超阶段错误的重要历史鉴戒。

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相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突出地具有实践性品格。首先，邓小平一贯把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作为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根本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其次，邓小平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握改革开放进程。他把人民的利益彻底引入社会主义范畴，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从而使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邓小平善于从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他既强调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是按照社会发展总规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又着重强调要把基本着眼点和主要注意力放到深入研究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上。由此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一切步骤和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第四，邓小平立足于时代，把中国的社会变革放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认识和把握，特别提醒国人，迅猛发展的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可以更快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改革与发展，必须把着眼点放到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上。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因素和文明成果，以增强社会主义的实力和优势。总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

在继承、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正确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了多方面创造性发展。正是这种创造性发展，使改革开放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涵，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把基本矛盾运动看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依据。但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侧重点是什么？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泽东在这两大问题上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观点，从而导致改革过程中的若干负效应。邓小平回答和解决了这两个关系社会主义改革总方向的大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最高层次的矛盾。基本矛盾的状况，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性质；基本矛盾的解决，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首创性。因为虽然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对基本矛盾，恩格斯、列宁也都肯定和运用了“基本矛盾”的概念，但是他们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都没有可能去研究和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斯大林则“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深刻指出：这种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所谓不同的性质，是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代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各方面，并不存在着势不对立的两大对抗阶级，也不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所谓不同的状况，是指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总体上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是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是容许并促进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则是保护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方面，也存在着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但这种矛盾是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前提下产生的，因而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不仅不会构成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危害，而且直接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只能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方式是改革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显然，毛泽东实际上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看作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依据。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和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思想。他明确地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改革

的内在依据，把通过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正确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在对毛泽东基本矛盾思想的继承中，邓小平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对如何解决基本矛盾作出了许多创造性分析，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大问题上：

第一，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始终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牢牢抓住生产力这个中心；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促进基本矛盾转化的中心环节。

关于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毛泽东曾作过明确论述。例如，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他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提高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1958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1958年底，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讲到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时，说斯大林提出三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确实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二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流通；三是发展社会文化，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提出的这三个先决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后中又提出：在我国要用100年的时间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上述一系列论述说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是非常重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可惜这一正确思想未能坚持到底。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把侧重点放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对生产力则严重注意不够，乃至导致完全脱离生产力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使社会改革走入歧途。

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训，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把生产力作为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因素和中心环节。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的鲜明特色。这种改革观包括：（1）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密切适应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从生产力比较落后这一基本点出发，建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变革的总原则、总方向。（2）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始终把生产力的主体——广大劳动者放在首要地位。通过各种有利的手段和途径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出发点。（3）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制定改革政策、判断改革是非的根本标准。（4）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而且也是上层建筑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5)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领导和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邓小平对我国现阶段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即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分析,既纠正了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又发展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基本思想,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更加实践性意义。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尽管“八大”的表述还不甚确切,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也体现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但是不久,由于国际上的波匈事件,由于国内发生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情况,特别是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促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矛盾问题上开始转向,进而否定“八大”的正确判断。这种理论转向,首先表现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稿精神不协调的论述。随后不久,1957年7月,毛泽东又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这篇作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必要补充”(毛泽东语)的文章,进一步萌生了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到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直接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得到了逐步升级,终于形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错误理论。

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错误,直接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把生产关系的改革变成对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分配形式的全盘否定,把上层建筑的改革变成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观中的最重大失误。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作出了科学分析。他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对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而且提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任务。这一思想对于后来逐步形成围绕“一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奠基意义。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郑重

的科学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科学论断，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肯定，并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我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判断的直接现实意义，就是赋予改革的实践性内涵，保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主要矛盾决定，无论是生产关系的改革，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都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和民主、文明。这既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又是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只有坚持这样的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获得生机与活力，获得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精辟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一思想理论对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招展了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民主的方法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和矛盾运行辩证法的揭示，侧重点无疑是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即便在他晚年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时候，在理论上他仍然坚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除少量敌我矛盾外，长期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于：（1）生产力落后，社会生产不能很快发达起来，这就将在客观上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有些人会因为“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闹事，这就产生矛盾。生产力落后，是人民内部矛盾长期大量存在的经济根源。（2）剥削阶级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思想根源。剥削阶级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3）认识上的差异是长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论根源。一方面，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人们对各种物质利益关系的认识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也会产生矛盾。（4）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体制和作风方面的原因。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讲到社会主义国家在具体体制和制度上存在着弊端，但是他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指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以至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机关中的某些官僚主义，实质上包含着官僚主义的体制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历来认为官僚主义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相容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个别地方发生群众闹事的原因时，深刻指出：一些人闹事，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

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并且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上级机关。这种分析，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长期存在的要害原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的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确立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充分发挥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第一，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突出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正确解决，必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要求。正是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主题”地位出发，我们党经过历史的反复，最终确立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既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体现，又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途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搞“阶级斗争为纲”，也正是根本违背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地位和发展要求的结果。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这种辩证关系表明，抓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也就抓住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第二，人民内部矛盾长期普遍存在的最深刻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地位，决定了围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题”作用。第三，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多层次性、多种类型。不管是哪一个方面、哪一种类型的矛盾，实质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决定于正确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只有通过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革，全面调整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第四，毛泽东反复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通过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即使在已经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毛泽东还指出：“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思想，对于顺利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人民内部利益关系调整的社会主义改革，其目的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上的矛盾，为人民群众谋取更长远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改革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才能顺利推进，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战略要点，深刻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中蕴含着的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1）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某些具体体制和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制度上的集中表现。制度问题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清除具体体制和制度中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弊端，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利益不断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不断前

进。(2) 强调要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利益矛盾。一方面，必须彻底破除平均主义的体制和制度，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和倡导共同富裕原则，引导人们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新的利益矛盾，防止和克服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现象，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邓小平这种辩证的改革利益观，深刻体现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3) 强调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又要高度重视改革中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力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人民内部利益关系调整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因此，政治改革中发生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以民主的方法来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矛盾，使改革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顺利进行，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对立统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4) 强调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作为人民内部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开放（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一种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要确保其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利益集中体现的四项基本原则。它们又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5) 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的对立统一，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结构和发展总趋势上的内在要求，也是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的总原则。与经济、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建设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的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以上五个方面，既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主题的思想，又作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坚持和发展，根本基础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以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为目的。这是新时期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的最鲜明特色，也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必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注释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4 页。

毛泽东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5 页，第 457 页，第 454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68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57 页，第 791 页。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马恩列斯毛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

祝福恩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学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学习、研究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论述，对于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历史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和论述，有助于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思想的伟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一个体系。马克思在 1895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结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就历史唯物主义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恩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引起的呢？马克思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恩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矛盾运动的考察，阐述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对这个思想，列宁有个简练的表述：“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引发者和内在动因。对社会发展来说，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恩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把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又深化了一步。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所决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基本矛盾其矛盾性质是對抗性的，靠社会制度自

身是不能解决的。社会基本矛盾在运动中要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背后都站着一定的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阶级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阶级代表者是资产阶级，其矛盾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这根本动力的功能，还必须靠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实现。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社会制度自身又不能解决。这样，能解决这一矛盾的东西，就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阶级矛盾和斗争，推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冲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阶级斗争就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恩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这是历史的直接动力（重点号引者加），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恩这里明确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基本动力、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三个层次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基本动力是动力系统的最高层次，它是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并贯穿其始终，其相互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根本动力是动力系统的动因层次，它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中处于关键位置，决定其他矛盾的产生和发展，从最根本层次上推动社会发展。直接动力是动力系统的操作层次，它能够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框框，解放生产力，使其动力功能得以实现，进而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不论其性质如何，都是在基本动力、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相互运动相互作用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二

马恩创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理论，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历史唯物论。由于历史的局限，马恩不可能把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揭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体系。列宁肯定并继承了马恩的思想，并运用于实践，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砸碎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列宁在理论上坚持了马恩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20年5月列宁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读到书中“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时，批注：“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由于列宁经历社会主义实践太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还没有来得及论述。

斯大林对马恩列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性发生了动摇。1938年，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他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的，根本不存在矛盾。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呢？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现在苏联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在苏联社会中再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很明显，斯大林否认了马恩列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认为“道义上和政治上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客观他说，斯大林已放弃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但也不能否认斯大林的“完全适合论”中的合理内核，即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在总体上是适合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已不是其发展的动力。但他否认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及其动力作用，承认同一性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就违反了起码的哲学常识了。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探索中，斯大林的“无矛盾动力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到1952年，斯大林才认识到他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错误，因而在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才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他说：“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理解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提出来，更没有指出这对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问题上，自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制度化后，并没有由空想变成科学，其理论并不是历史唯物论。由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至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缺少科学理论指导，因而发展比较缓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三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上，毛泽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方面是放弃了斯大林的“完全适合论”及社会主义发展的同一动力论，另一方面是提出许多宝贵的理论。

1956年我国“一化三改”胜利结束后，社会主义怎样发展，发展动力是什么？斯大林没有解决的难题又摆在毛泽东面前并要求解决。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放弃了唯心史观，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已恢复了历史唯物论，否定了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和“完全适合论”，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动力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1）。这样毛泽

东自然而然地否认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2）。事实上毛泽东已承认并指出了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如果毛泽东按着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轨迹走下去，一定能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又一次大飞跃。遗憾的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了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问题，“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13）。以什么方式、手段解决，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来。就是说毛泽东已要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问题，但最终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根本动力，为什么没有解决直接动力？尔后又为什么放弃他所阐述的正确思想呢？从客观上看，是5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从主观上看，是毛泽东本人理论素质问题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颇。进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当成是阶级斗争，否定了自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正确思想，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主义主要矛盾。1957年10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4），否定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指出：“‘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5）。毛泽东由此彻底否定并违背了他八个月前的思想，放弃了社会主义发展基本动力、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论。

这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研究，不可能在历史唯物论的思路上前进了，只能沿着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逻辑发展。因而，他指出三大改革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16）。由此把阶级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际上，这是毛泽东陷入了历史唯心论后，对马恩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理论的照搬。但一个是历史唯物论，一个是历史唯心论，一个是对阶级斗争的科学评价，一个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有功有过，泾渭分明，其功其过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科学解决极为难得的台阶。

四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斯大林、毛泽东没有解决好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尤其是直接动力问题，尖锐地摆在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出“左”的误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创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特别是直接动力这一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他既知道马恩列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论述，更知毛泽东探索的成功与失败。因而邓小平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时，首先进行拨乱反正，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唯心史观回到唯物史观。1979年，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7）。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实质上是赞同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表述又不太满意，因为“并不完全解决了问题”。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问题。

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失足，进而走出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研究的唯心史观的误区。他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8）。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9）。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20）。邓小平虽然没有说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思想是十分明显的。

在社会主义现实中，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作用发挥不到位，其发展受到较大束缚。对此，邓小平在50年代中期就认识到，并指出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致。但解决方式并没有提出来（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思想已经成熟了。1978年，他明确提出了改革。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革命，是全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22）又说：“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3）。由于没有提出改革，致使我国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和发展。邓小平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24）。邓小平把改革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为他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理论奠定了宝贵的前提。什么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直接动力，关键的是看什么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能直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而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并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自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这段论述的思想真谛就是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邓小平关于改革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标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得到了科学而圆满的解决，即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其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

这动力体系推动下发展的。由此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这是历史唯物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又一次成功的运用，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

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科学解决，特别是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一，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制度化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其发展动力是什么？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苏东国家剧变后，这个问题以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意义上提出来。在这样的严峻背景下，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科学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体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在理论上解决了马恩对社会主义设想与实现的反差，使社会主义又一步迈向了科学，解开了困扰人们长达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之谜，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

第二，揭示了改革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步性及改革的根源性、必然性和长期性，为改革奠定了坚实的依据。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改革的社会”（25）。恩格斯这个预见十分宝贵。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并没有说明。邓小平则科学、正确地答上了这道历史性难题。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必然与社会主义同步，必然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改革是客观的，是长期的，将伴随社会主义始终，将推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每个人都积极要参加改革，做改革的促进派，用改革的动力机制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第三，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把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在现实基础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仅从理论形态，指出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但怎样发展更快，其发展动力是什么，并没有象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直接动力”那样明确的论述。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填补这个理论空白。邓小平深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破除了这种僵化的理论，不但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一个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而且强调要用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这样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就被揭示出来，改革使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作用变为现实，改革自然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样，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空白，使社会主义发展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上，确保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82—8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2页，第365页。

《列宁全集》第1卷，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

《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45页。

(11) (12) (13) (14) (15) (1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第372—373页，第375页，第374页，第475页，第475页，第476页。

(17) (18) (20) (22) (23)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68页，第83页，第126页，第140页。

(19) (2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3页，第116—117页(21)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徐必珍刘怀玉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它，用什么方式推动它不断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从本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和谐动力论”（或“一致动力论”），到5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矛盾动力论”，再到7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动力论”。

总的来说，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趋于真理性认识并不断完善的辩证发展过程。但在严格意义上说，“矛盾动力论”才是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真正开端，而“改革动力论”则是对这一问题在理论方面的历史性突破和实践方面的根本性解决。因此，回顾和比较这两种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对于加深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在社会发展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指出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由于当时还不存在完善的现实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解决途径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因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索 and 解决只能留给后人。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曾经想到这个问题。他当时就认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然而，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还未进行，来不及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很长一段时间，回避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存在。他认为，苏联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各种利益完全一致，是一个没有矛盾、一切都非常和谐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此，“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一致动力论”或“和谐动力论”，是针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有本质不同而提出的。就此而言，他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不承认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不相适应的一面，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由于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看不到事实上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这就铸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体制。后来，虽然斯大林逐步察觉到了这种矛盾，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

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仍然没有把这些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斯大林逝世后，本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一些惊人事件，暴露出各种矛盾，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引起思想混乱，甚至惊慌失措。这就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解决途径问题。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首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首先在《论十大关系》中研究了当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的各种矛盾现象，并指出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在此基础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重要著作中，不仅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而且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状况、性质和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矛盾，从总体性质来说，不是对抗性矛盾，而是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体状况来看，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能够促进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是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壮大的有力保证。但是，由于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具体制度尚不完善，还存在种种缺陷和弊端，某些环节和方面也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甚至出现某些腐败现象，很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因而会产生党群之间和干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局部的、暂时的，有时可能激化，但是只要解决得及时和得当，不仅不会构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阶级对抗性质，始终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因而这种矛盾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彻底革命的方法，否定其自身、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属于各方面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壮大其经济基础。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思想，虽然尚不完全却是极为珍贵的。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一系列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无疑是创造性的巨大贡献。

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

于他没有对此进一步作出切合实际的深入具体的分析，没有看出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抓错了主要矛盾，因而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他过分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形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看成是新旧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主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企图以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其突出地表现在：一是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在于所有制不大、不公、不纯，因此要“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由此造成单一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二是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表现为“党内有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基层都有“走资派”，所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继续革命”。历史证明，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经济建设，致使中国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的停滞状态。

造成长时间失误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思想认识上产生了片面性。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切实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因而只看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看不到无论是公有制本身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都还有一个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就毛泽东本意而言，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遗憾的是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始终没有切实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被“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等错误做法所扭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干扰了经济建设，导致社会主义发展失去了根本动力。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尽管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改革和完善的思想，尚不完全，在实践中又被“左”的错误所扭曲，但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性质、方向和道路，为我们继续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坚持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二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毛泽东

“矛盾动力论”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突出矛盾，找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实际运动，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首先，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此作为理论和历史的出发点，他深刻指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邓小平充分揭露了旧体制的种种弊端，指明了改革的对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这“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因此，“要大幅度地改变当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其次，邓小平还从社会主义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论证了改革的紧迫性。他多次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7年他在一次谈话中深有感触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照搬外国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他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一次严肃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又指出改革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从而真正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

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从来都是理论认识上的创新的表现和结果。从“矛盾动力论”到“改革动力论”，不仅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具体把握，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

第一、“改革动力论”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从而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建立在科学的客观实践基础之上。毛泽东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运动，但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先进性和巨大作用，忽视了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可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历史规律。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在实践中导致两种后果：一是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即体制束缚生产力的严重性，盲目固守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的某些方面，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妨碍了生产力

的发展；二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从衡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败得失的标准中排除出去，一味追求“生产关系大变革”和“上层建筑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而“改革动力论”，则是坚持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结构中，始终把生产力看成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解决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就使人们更加自觉主动地通过改革不断克服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永远处于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稳定发展的良胜循环状态。

第二，“改革动力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还在于，它不仅一般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而且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僵化的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并且提出通过改革解决这个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这就纠正了那种脱离客观实际，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表现的实质简单地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错误作法，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能否正确认识 and 把握，决定着能否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如前所述，把无矛盾的完全一致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形而上学表现；简单地把矛盾看成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也是不完全的，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抓不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对头，反而会使矛盾更加尖锐起来，阻碍社会主义发展；至于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像某些国家面对严峻挑战。迷失方向，变质易帜，另找出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历史倒退；只有正视矛盾，抓住根本，通过自身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正确地解决矛盾，才能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三

“改革动力论”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深化了人们对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作用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第一、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矛盾在不同领域里物质运动形式中的作用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说，“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观点。但是，据此就简单地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不完全的、不科学的。因为，运动、变化的概念不等于发展的概念。一般说，运动或变化不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和上升性，它可以指的是数量变动、机械重复、“返祖”或倒退等现象；也可以指的是质的飞跃、前进过程和上升趋势。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死亡，均可称为是运动和变化；而发展则不然，它是由事物内部矛盾所构成的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机能，具有确定的前进方向，即总体方向的上升性和具体过程的曲折性，是无限运动中一种前进的方式和趋势。由于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并不是同一概念，矛盾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性质、范围和程度也不一样。对于人类社会

来说，矛盾虽然也是社会运动的力量源泉，但是并非所有的矛盾都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社会矛盾和斗争还会破坏社会文明和进步，致使历史倒退。因此，只是笼统地说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自觉地把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能否对不同历史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及其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具体把握，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下，其性质、状况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这要求我们，只有严格区分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状况，具体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基本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

第三，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仅仅承认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并采取正确方法和途径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这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不对头，不仅解决不了矛盾，反而使之尖锐起来，形成一种破坏的力量。因此，只有将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历史地具体地统一起来，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形成自觉的矛盾运动，才能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注释

《列宁全集》第33卷，第83页。 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02、237页。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5、287—288页，第125—126页，第140页。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2页。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

毛泽东国力思想与当代综合国力研究

张伯里

“综合国力”，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术语，尽管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迄今在任何辞书（《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辞典》、中国《辞海》等）也都未列入这一概念。然而作为近年来各国国际问题专家、学者竞相研究的成果，“综合国力”概念毕竟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和较为丰富的内容。因而这一术语近年来也开始出现在各国领导人（包括我国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甚至被列为国家战略。

任何一个科学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往往要追溯思想渊源，这是自然的。综合国力思想也不例外。人们不是把国力理论追溯到二次大战前后尼古拉斯·斯拜克曼那里、汉斯·摩根索那里吗？其实作为今天综合国力理论的许多基本思想——如国力是诸种因素的总的思想，经济是国力的基础的思想，国力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部分构成的思想，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的思想，综合实力需要综合努力的思想，等等——在毛泽东三四十年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专门比较了中日两国国力的《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丰富的内容。有必要对毛泽东的综合国力思想给予珍视和发掘研究。本文结合当代综合国力研究，试对毛泽东关于国力的思想进行评述。

一、国力是综合的、全面的

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简称国力，历来是国际政治分析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产生了世界政治研究，同时就产生了实力分析方法。然而，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实力虽然也不能说是纯单一性的，但人们往往偏重于军事实力一个因素，把军事实力置于国家实力的主导地位，或者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其他形式实力的最终尺度，以至于说到实力通常总是指军事实力。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以来，随着军事实力使用范围的缩小，随着军事实力使用效能的减少，随着军事实力使用代价的增大，可以说，军事实力虽仍然重要，但其意义已经大为下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国家实力已不单纯归结于，甚至也不主要归结于军事实力；国力竞赛已不单纯表现于，甚至也不主要表现于军事实力竞赛。到了七八十年代，连最看重军事实力的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实力或能力包含的内容比单纯的军事实力要多得多。”并且开始从各种因素综合的角度，来研究国力。

1975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雷·克莱因出版《世界实力评估》一书，尽管他仍从研究发动战争的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实力，但这里的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了——实力由基本实体（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五大因素构成。1980年，日本大平内阁的“政策研究会”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从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国力。不仅其内容也是综合的，即保障国家安全不能仅仅运用军事力量，而是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而且连战略的名称都冠以“综合”一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发表《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专门研究综合国力。该报告把“综合国力”分

解为三大类要素，包含着经济、科技、政治、教育、军事、外交、文化、人口、国土等国力要素。自此，“综合国力”一词在国际政治领域风靡全球。

其实在 30 年代的毛泽东那里，国力已经是综合性的，尽管他没有用“综合国力”一词。1938 年 5、6 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为了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必胜的也是持久的，他对日中两国的国力做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归结这个国力比较就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综合国力分析！这里比较的，用今天的话说，叫“综合国力要素”，而非片面的单一实力；用当时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概括这些国力要素，共包括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关系六大类。这差不多道出了今天的研究者刚刚揭示的综合国力的全部基本要素。尽管今天的研究者对国力要素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的诠释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构成的排列组合不尽相同，对国力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机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国力要素构成不也正是这些大的方面吗？

以下更为具体的分析，将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思想的丰富内容。

二、经济是国力的基础和核心

相应于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瓜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相应于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过去的国力概念一般归结为军事国力概念，经济实力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是现实强制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在 80 年代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中，对国力诸要素的重要程度的评估，经济力居首位，为 77.9 分，科技力次之，为 67.7 分，军事力排政治、教育之后的第五位，仅为 22.1 分。在 60 年代联邦德国教授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那里，更是贬低军事实力的意义，主要是以钢铁和能源来设计其“国力方程”。如果说日本、联邦德国出于其本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实际国情，而在其国力要素评估中过于看轻了军事实力的意义，那么在最看重军事实力的美国，而且还是在美苏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的 70 年代，军事实力在国力中也已不再是居独占鳌头的地位——克莱因对其国力中物质要素的评估，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列，各为 200 分，人口和领土各为 50 分。因此，尽管对经济实力具体的评估存在分歧，然而仍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经济实力在国力中的意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未来的主要对手和威胁，来自经济、科技方面而非军事、政治方面；未来的国力竞赛，是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赛而非军事实力竞赛；未来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它的以经济（或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状况而非军事实力状况。这种看法特别是在美苏争霸格局崩溃以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军事等，并非今天才有的“新观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40 多年前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连西方学者都接受了唯物史观。他们只是受客观实际所迫，接受了经济起决定作用的现

实)。而毛泽东在其 30 年代前后的著作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经济在国力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特别是论述了经济对于政治、军事的基础作用。

关于经济是政治、军事胜败存亡的物质基础这一点，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政治暴力决定论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一强大的手段。”“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即便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的。早在 1928 年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同其他政治的、军事的、地理的条件一并（这无疑是综合实力的雏形）作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所需具备的条件。以后又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都把经济作为苏区（或根据地或解放区）存在与发展与战争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期，他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的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在经济建设不是中心任务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尚且极为重视经济的物质基础作用，那么，对于和平建设时期，他更是把经济作为国家昌盛的物质基础、国力强大的核心内容。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规划着未来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他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1）

战后那些迷信军事力量、追求军事霸权的国家，尽管其军事实力一时得到膨胀，但拖累了经济发展，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实力基础，必然的结果是削弱了国力。严酷的事实迫使他们正视经济这一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物质基础。于是，人们开始感到《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有关于‘军事实力潜力’而没有关于‘经济实力潜力’的词目”，“不那么令人鼓舞”，希望下一版的《国际百科全书》补遗（12）。

三、精神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 是国力构成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之一

过去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尽管其世界观一般是唯心主义的，但其对国力的看法却很“唯物”：或者唯军事实力为重（“唯武器论者”属此类），或者唯地理自然条件为重（“地缘政治学”），而忽视精神因素。现代国力研究者和政治家则有不同，不管列出了多少种国力要素，有多少种国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国力要素构成一般都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或称精神要素），即国力构成的“硬件”与“软件”。譬如，美国的

雷·克莱因“国力方程”构成，除了“基本实体（人口加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三大物质要素外，还有“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大精神要素。塞缪尔·亨廷顿1988年“与保罗·肯尼迪一论短长”的文章中论述的美国国力除了人口、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甚至当时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也于1984年1月16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实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有我们国内人民的团结以及我们同国外盟友的团结。”1987年《日本的综合国力》报告中庞大的国力要素体系，除了物质力量，也包括诸如“政策力”、“外交力”、“国民意识”、“同盟友好关系”等精神力量。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都坚持物质和精神的辩证统一：“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13）。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在力量对比分析中，十分注重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两大因素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指出力量对比，是两方面因素的对比：“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4）他也指出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产物：“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5）20年后的1957年，基辛格在他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了毛泽东物质、精神两因素的军事学说与美国单纯军事考虑的战争思想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反对那种以纯军事考虑为基础进行速决战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美国战争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军事学说再三说明，在战争中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同样重要。”

就国力中精神因素本身，我们前面曾列举的当今人们研究国力时所提出的精神力量（“国家意志”、“国民士气”、“国内政治稳定性”等等），毛泽东几乎都论及过，尽管其用词和含义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几个主要因素。

1. “政治动员”——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

毛泽东十分重视政治动员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他说：“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6）那么，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人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17）另外，“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18）国家的“政治目的”、“政治纲领”、动员全民族去实现这个目的、纲领，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国力研究者所说的“国家战略与贯彻这个战略的国民意志”因素。

2. “人心”、“士气”

按照毛泽东的实力观，“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19）因此，在他具体比较中日实力时，总是把“人心”、“士气”这个精神要素放进去。譬如，他在分析中国比之日本是相对劣势而非绝对劣势时指出：“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汽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劣势。”（20）而日本，在人心、士气方面却是一个消极因素。例如，它在中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日本战略进攻阶段），“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21），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日中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变化（22）。

3. “政治组织力”——政府能力、国民凝聚力

毛泽东比较的日中实力的第一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23）。这里面，军力、经济力是物质力量，政治组织力是精神力量，且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力量。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24）从中国方面看，“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还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25）。“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6）以上毛泽东所分析的“政治组织力”，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研究国力时提出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和“国民凝聚力”要素。

四、地理自然条件是一种重要的国力因素

应该说，国力研究者从来没有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时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国力研究者一般都不忽视地理自然因素，尽管因人异而重视的程度不同。汉斯·库根索 8 项国力要素的第 1 项为地理，第 2 项为自然资源。尼古拉斯·斯拜克曼 10 条国力要素的第 1 条为领土状况，第 2 条为边界特征。威廉·富克斯国力方程的第 1 个要素为国土。雷蒙·阿隆国家权力 3 大基本要素的第 1 要素为政治单位所占空间，第 2 要素为人力物力资源。雷·克莱因“综合国力方程”的第 1 个因素“基本实体”为人口加领土。日本综合研究所综合国力 3 方面之一的“生存力”其第 1 个构成要素是地理（领土、领海、领空、战略位置）。

特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地缘政治之父”、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是国家权力的关键的理论，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

权理论”，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的“陆权理论”，等等。对国力要素中的地理自然环境怎么看？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国力构成中的最主要或决定不性因素，这一理论原则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诸如地理位置、领土面积、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等等地理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国力要素。

毛泽东始终把地理自然条件当做一种重要的实力要素，他尤其重视中国的“地大”因素，视其为中国国家实力的一大优势。他在《论持久战》中所作的日中力量对比，其中有一项是“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27）这里面，“地小”、“地大”（领土面积）和“物少”、“物博”（自然资源）就是地理自然因素。毛泽东既把“地大”作为中国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他所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除了出于军事、经济、政治等等实力状况的考虑，也出于“地大”等地理自然条件的考虑。譬如，持久战——“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28）

除了“地大”、“物博”，毛泽东也没有忽略“地理位置”的意义——“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29）

五、国力竞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

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多次强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30）。他所说的力量，实际是指综合国力。他除了在比较分析了日中两国军事、经济、政治、人口，地理自然条件和国际条件等实力的特点之后，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31）；他还更具体地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2）以及战争是“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之上的“主观能力的竞赛”（33）。

如果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那么，和平时期的发展同样也是力量的竞赛。而且，在这个综合国力中，过去占有突出地位的军事实力的意义下降，其他实力的意义上升，特别是经济科技实力成为核心。这种综合国力竞赛的激烈程度和意义的重大，一点也不亚于战争时期的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实力较量。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增强实力，以赢得国力竞赛。

既然是力量竞赛，就有一个你追我赶、此长彼消、东升西落等等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列宁对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各国实力此长彼消不平衡发展，作过深刻的理论揭示。

毛泽东的实力竞赛说，也包含着丰富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的论述。甚至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1957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的基辛格博士也赞赏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写的，这两篇文章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34）

毛泽东在对日中两国诸种国力要素的优劣作了比较分析之后，指出：“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35) 根据这样的实力对比情况，中国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且在其第一阶段采取战略守势、防御的方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

(36) 当出现这种实力地位易位的情况，战争地就到了中国战略进攻阶段。即毛泽东所说的“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37) 我们看到，中日战争这场力量竞赛，此长彼消，实力对比发生了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实力地位易位的新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这场竞赛的进程和趋势。

历史已经验证了中日战争以及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力量竞赛此长彼消、东升西落、你追我赶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结果。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德国的国力之跳跃式发展并赶超英国、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并使国力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使其综合国力位次逐步上升等等。因而，若看不到后进可以赶超先进、弱可以变强，或者过于看重落后、弱点、劣处，视落后为永远落后，这在理论上是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则是悲观消极。毛泽东批判了抗战中以亡国论为主的悲观论者，这对于今天综合国力竞赛时代的悲观论者也是适用的——“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这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38)

另一方面，一个后进国家实力的上升，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老大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即使你的发展速度总是保持优势，那要赶超一个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也是要假以时日的。何况发展是曲折的，而且竞赛对手也是在发展的。因此，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批判了抗战中的亡国论、悲观论之后，指出：“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39) 当然，不能速胜，“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40) 如果说在战争的力量竞赛中，不心存紧迫感，不发奋努力，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那末在今天的综合国力竞赛中，不只争朝夕，不发奋努力，则有落伍衰亡之虞。

应该指出，这种为赢得国力竞赛而进行的努力，是各个方面的综合努力。日本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综合”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威胁本身就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和相互关连的，另一方面是指用以对付威胁手段也必须是“综合”的，即“综合”运用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综合效果。而在这之前 40 多年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那里，除了分析的国力已是综合的外，也指出来自外部的亡国威胁是综合的——“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的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41）因而毛泽东还指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赢得胜利的方法、手段、努力，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综合的——“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少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42）。

综合国力，需要综合努力。毛泽东关于综合国力的丰富思想，不仅是今天综合国力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也是今天综合国力竞赛的重要指导方针。

综合上述，毛泽东国力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静态的国力要素综合论（本文第一至四部分）与动态的国力发展不平衡论（本文第五部分）。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如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国力思想的两个方面在邓小平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首先，毛泽东分析了战争时期的国力竞赛并指出这种国力是诸种因素的综合，而非片面的单一要素。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各国也进行着其意义不亚于战争时代的激烈的国力较量。如何看这种当今时代的国力，邓小平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43）其次，邓小平把综合国力摆在了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项标准之一的高度——“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4）这无异于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之一。再次，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这抓住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寒力，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上不去，政治、军事等等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都上不去。而经济实力大小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至关重要。停滞不行、慢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为这样只会使我们的经济实力以至整个综合国力永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最后，邓小平提出的百年奋斗三个阶段的构想，是把我国综合国力一步一步搞上去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只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必定会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并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还要看到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5）可惜从 1966 年开始，我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政治动乱之中，耽误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是邓小平把在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百年（从建国算起）具体化为三步走的战略，并在实践中，已经实现了第一步的目标并将在本世纪内实现第二步目标，

这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近所强调指出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努力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使我国综合国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46）作到了这一点，就为在下个世纪前50年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2）（美）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第157页。

（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9—450页，第450页，第768页，第469页，第490页，第513页，第481页，第481页，第469页，第489页，第463页，第468页，第449—450页，第503页，第492页，第511—512页，第452页，第506—507页，第456页，第470页，第450页，第490页，第460页，第468页，第478页，第458页，第458页，第455页，第470—47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3页，第206页。

（13）（4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页，第120页，第326页，第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6页。

（11）（3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0页，第1081页，第1024页。

（34）（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17页。

（43）《人民日报》1990年2月26日（4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46）《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

试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江虹

14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落后的国家尤需这样。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目光远大，锐意进取，反对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主张“向外国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他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国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发展我国与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许多论述、见解、构思，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结、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一些过去曾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的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倒打一耙，胡诌什么毛泽东实行“锁国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也误以为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搞“自我封闭”。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的。

毛泽东是对外开放的倡导者

毛泽东思想奔放，胸怀广阔，放眼世界。他在青年时代，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便主张“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曾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五四运动前后，他和蔡和森等四出奔走，组织数百名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去苏俄留学。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更是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著作，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并尽力争取外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获得独立后要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外资，并努力争取把这一主张在解放区付诸实践。1936年，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

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同年7、8月间，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并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的谈话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他将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访问美国。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和培养外交人才，在毛泽东提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于40年代初在延安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外文书籍编译部和外国语学院。在此前后，还聘请一些外国友好人士担任八路军的电讯、广播技术顾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支持下，成立了延安工业合作事务所，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聘请英国人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培训工业技术人才，开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人士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先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即着手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建立邦交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1949年2月，他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就提到，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

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友好交往留下了一个“中介所”。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由他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内外交流”列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发展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争取外国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于1949年12月亲赴苏联访问。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李富春、叶季壮、肖劲光、徐向前、伍修权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先后赴苏访问、考察。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的协定和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其后几年间，中国聘请了3000多名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派出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并和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6个合资企业。

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而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消除

群众波动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赁合同。”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了打开和西方国家友好交往和经济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50年夏，由于我国的航运设备有限，不少出口货物难以运出，中南地区商业部门要求开放汉口港，让外轮直驶汉口装货。毛泽东于8月7日批示：“请周[总理]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1953年8月，英国来华贸易的一些商船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英商要求我国派海军护航，并准予在我国领海内航行。毛泽东于8月4日批示：“请周[总理]酌处。似只能这样办。”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有困难，我们就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西洋人不肯投资，我们就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侨资。结果收到很大的成效。1950年，我国已和18个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丹麦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英国、荷兰、挪威等国进行建交谈判。同年，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1952年我国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国家的商人签订了一批贸易协定、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956年，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比1951年增长10.4倍。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从外国引进了一批急需的资金、工业设备以及农药、化肥等物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把全面地、永远地向外国学习和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毛泽东刻苦学习英语，并号召“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

50年代末以来，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和党中央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富有远见和胆识的重大决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亦自始结束。在此前后，包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我国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并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

采煤机、武钢 1.7 米轧机等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总值 43 亿美元。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我国今天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学习外国、对外开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但又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放眼世界，志在中华。在学习、引进的目的上，坚持“洋为中用”。他一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在学习的方法上，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善于把外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吸收了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又不照搬他们“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既不照搬苏联的一党制，也不采用欧美国家的多党制，独辟蹊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资本家没有采取没收、驱逐、镇压的政策，而是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

（二）坚持学中有创、立足于赶超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着眼点在于发展、创新，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他历来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承认中国落后但不甘落后，自逊而不自卑，虚心而不灰心，拜别人为师而不步人后尘，要有敢于赶超的决心和气魄。他强调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学列强以自强，以引进促跃进。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曾激励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在一些项目、领域上赶上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

外

毛泽东是个卓越的哲学家，善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坚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国的东西，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他一再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在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党内、国内在如何看待外国问题上的思想动向，适时地进行引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他针对国内一些人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在全国普遍开展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教育，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1953年，在我国取得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党内盲目自大、唯我独尊的情绪有所滋长。毛泽东又适时地给全党敲响警钟：“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态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在出国人员进行教育。”还引导大家不要保守，不要什么都讲民族形式，拒绝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说：“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他多次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借鉴美、英、法、日等国的经验，决定在一部分工业、交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又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中某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他曾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要求各中央委员阅读，在制定我国宪法时作参考。他还说过：美国“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美国的州可以立法，……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毛泽东这种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的军队除在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过缴自日军的部分武器外，未得到外国一枪一弹的援助，却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和得到近60亿美元援助的国民党军。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外国贷款，即使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阶段的我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所得到的国外贷款也只有 36.4 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 2.7%。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某些洋大人预言的没有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解决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当时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升天的问题。由于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自给以至完全自给。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并不非常依赖外国，实行封锁，他们对我们的损害比我们对他们的损害大”（英国前首相艾德礼语），从而逐步解除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有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爱心和责任感，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他在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外国的援助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 1950 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 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 1952 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在我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上面所列的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四个基本原则，虽然还不能说已构成完备的对外开放理论，但它已涉及到对外开放的宗旨、态度、方针、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今天的对外开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贯彻始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作过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在许多方面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其中一些观点后来他也未再坚持以至自我否定。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 20 多年中，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新中国刚成立，美国政府便把我国看作是“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宣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他们还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现实之间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在经济领域中产生”，因而把经济封锁作为“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它极力拉拢甚至以断绝经济援助胁迫别的国家参与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封锁，并于 1951 年 5 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6 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了不许美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从 60 年代初开始，原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参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甚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我国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也被堵塞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从主观上讲，其一是“先天不足”。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革命战争年代又长期生活在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村，对市场经济缺乏感性认识，使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仿效苏联的模式，一直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没能从参加国际市场的交流、合作、竞争的高度来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没能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巨大动力。历史的局限使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因而在实践中不那么自觉和坚定。

其二，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左”的思想逐步滋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心通过抓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孳生的土壤，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放弃以至改变了自己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一些正确的观点、构想。例如，过去他积极主张兴办中外合资企业。1970年8月11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搞合营。”在中苏两党公平论战时，我们党还把南斯拉夫向西方国家出口原料，与他们办合资企业，搞来料加工等，说成是“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由于拒绝接受办合资企业、补偿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做法，大大地限制了我国和外国经济交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停步不前。

其三，我国的“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了自己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认为只要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用十几年以至几年的时间“超英赶美”。60年代初，苏联政府对我国逼债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没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决心“还完了债以后，……再也不借外债了”。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曾说：“断绝外援最好。”60年代以来，毛泽东很少再提向外国学习和争取外援，而是一再强调破除对外国的迷信，不怕孤立，不怕封锁。在对外关系某些策略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与外国交往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四大又把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1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规模逐步扩大，已经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大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主要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无疑地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7)(21)(23)(24)(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288页,第402页,第287页,第97页,第127页。

毛泽东1956年9月30日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的谈话。

毛泽东《致周士钊信》,1920年3月14日。

(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第302页。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7页。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9页。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6期,第28页。

《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第460页。(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15—616页。(13)(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294页,第438页。(14)《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15)(19)(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第751页,第849页。(16)(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860页。(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25)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同志的谈话。(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8页。(30)《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13页。(3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32)[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49页。(33)《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第85页。(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2页。(35)《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6页。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探析

梁柱

在我国，对外开放是相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闭关锁国而言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同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紧密关联着的，也是近代世界历史潮流所要求的。近些年有的论者把毛泽东晚年失误绝对化、扩大化，进而认为在中国和外国关系上他是搞闭关锁国的，甚至冠以“封建”、“倒退”一类的字眼。其实大谬不然。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曾使我国一个时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上处于封闭状态，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纵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应当说恰恰是他确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他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和做法，推动了我国与世界的交往。在深入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当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还行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这支奇异的队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极目远望，面对那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的莽莽昆仑，思绪万千。他征尘未洗，慨然命笔，一曲《念奴娇》，直抒胸臆：“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后来他对此加了一段说明：“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作为一位诗人，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触景生情，遐想联翩，遨游在诗的王国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优美的诗章里，透露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上引词句，可谓充分表达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宏气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还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他处在新旧潮流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奋进精神，他痛恨那种用“闭锁一个洞庭湖”的做法，不给青年人用武的余地。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激励会员要立志“向外发展”，主张大留学政策，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计划组建游俄队，游历“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苏俄，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科学真理。他反对封闭的、落后的部落思想，主张取世界主义，谋全体人类的幸福，认为：“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随后他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则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并说：“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可以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就始终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对世界事务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这是毛泽东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而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在两种政权的长期对峙中，革命政权是处在严酷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很难实现和外部世界的有效接触与交往。即使这样，在毛泽东主持下，也力求打破封锁，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争取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对外宣言》，明确规

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原则立场。同时又明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不反对与各国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这表明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权仍然是主张对外往来的，而不是自我封闭。

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活动的日益猖獗，极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极大变动。这时中国革命大本营已转移到陕北，中国共产党也已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稳定的第一代领导，因而有可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党的对外政策。1936年深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同美国记者斯诺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问题时，就充分表达了党对发展与友好国家交往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党对这些友好国家都采取欢迎的态度。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抗战实现后，英、美等国如能对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切实的援助并对日本进行封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同时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主张，他说，如果中国取得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人民政府对“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而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则“一概不予承认。”等等。这些论述，虽是初步地但确是比较清晰地勾勒了在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内党的对外开放的构想和政策，也大体展示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轮廓。

实行对外开放，就有一个学习外国、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为对外开放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对待外国文化又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说：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是对待外国文化应取的正确学习态度。毛泽东坚决反对了所谓“全盘西化”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他严肃指出，前者，实际上是属于奴化思想的

文化，是极端错误的；而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也是有害无益的。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深刻地表达了他后来所概括的“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上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抗战时期我们党所处的环境中具备了一定的付诸实践的条件。这不仅在敌后抗日政府制定的法规中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如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有“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边区进行实业等”的条款，而且还在国统区集中一批党的外交干部，积极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情和援助。当然，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首先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争取同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友好交往，也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点。当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在重庆的周恩来曾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我们党希望并相信通过实地考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经过许多周折，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得以成行。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这时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这次访问看做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并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时，毛泽东对发展同美国的交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时，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并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表达了在抗击日寇中中共军队将与美军积极合作的愿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战后中国的形势和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问题。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计了战后国民党政策走向，指明战后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大危险性，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援助和支持一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仅可与当年北洋政府并论的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改革，避免内战。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后指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有益的；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发展中美经济合作的愿望，指出通过外国资本的援助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善良愿望。当时，观察组成员根据广泛的实地考察，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断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受到人民广泛而积极支持的共产党人手里，要求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包一个政治上破产的”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出于帝国主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最后选择了“扶蒋反共”的错误道路。美国决策者这个错误而又是必然的选择，导致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关闭了同中共

及随后诞生的新中国的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后来美国某些研究者所称的一次“在中国失落的机会”。

综上所述，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毛泽东就是明确反对自我封闭，主张对外开放的。虽然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所涉及的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原则是明晰的，从而为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即表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存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下，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的情势下，实行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把“一边倒”方针与自我封闭混同起来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因此而认为“一边倒”只是一种政治方针或政治态度，而不是外交政策，也是有失偏颇的。诚然，“一边倒”的宣布，确是表明了我们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方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幻想，也消除国内某些人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同时又必须肯定，“一边倒”确是当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不过它不是对外政策的全部，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

建国初期，当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一次关于外交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就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思想，指明我们要在政治上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实行“另起炉灶”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是对于发展同东西方外交关系都同样适用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在阐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同时，还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事、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建立外交关系。这表明，我们在首先同民主阵营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还要同西方各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西方国家，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还是要请客的，而且在客未请或请而未来之前，还可以“互通有无”，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所以，“一边倒”的方针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的往来，恰恰相反，这时中国的大门却是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所封锁。这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所揭露的：“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仍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他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多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关系，尽可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党在全国胜利后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时，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估计到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

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但即使这样，“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在论述“一边倒”的主张之后，同样明确地提出：“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并且确信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不但有生意可做，而且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方面基本政策的重要构想，建国后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不久，就在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分别同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尽最大可能地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关系。对于后者，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1949年12月访苏期间，曾两次就对外贸易问题致电中央，提出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在苏联是第一位的情况下，要准备和波、捷、德、日、美等国做生意，还特别提出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进出口的种类及数量。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泽东仍然是十分重视发展对外往来的，他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致力于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往来。

但是，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毛泽东这种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的思想，正如他在1954年8月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新中国同外部世界，需要联系，需要作生意，不要孤立。尽管由于美国奉行对华门户封锁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非正常状态，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毛泽东仍采取积极的步骤以期实现中美之间政治经济交往的正常化。他深刻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早在建国之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这里并试图与我方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对美方的这个信息是重视的，当时曾派黄华以南京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身份与司徒会晤，表达了我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改变对华政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愿望，并欢迎他按惯例北上参加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和过生日。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致使这次微弱的联系很快便被其掐断了，而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封锁，并且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变本加厉。面对这一险恶的情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大无畏的精神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同时，又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向作了缜密而冷静的分析。

195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删去了原有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句话，并在旁边加了一句批语：“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对于我们党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的决策是有重要意义的。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1954年1月，毛泽东就通过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透露了这个信息，他表示，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后来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许多国家的促进，从1955年8月开始，中美两国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大使级代表会谈，结束了中美双方不接触的局面。这次会谈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在中美关系非常化的情况下，为两国开辟了保持某种接触和沟通意见的渠道，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时毛泽东注重发展新中国的对外往来，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他不仅认为要广泛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而且明确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在他看来，向外国学习，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不仅要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科学，而且要研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东西。1954年，在我国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就研究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并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抽暇阅看”，而指定阅看的内容就包括“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并特别注明它“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当时周恩来也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956年，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毛泽东就曾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里，就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深沉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思考，在1956年以后，就成为他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的一年，又是国际上风云骤起的多事之秋。毛泽东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深刻论述了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从指导思想的高度上谈到了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并明确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提了出来。此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在这方面还是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如

在这一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在设想可以开一些私营工厂的同时，还可以允许境外投资，华侨投资 20 年、100 年不要没收（16）。他在 1956 年一次听取汇报时专门谈到派留学生出国学习问题，他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17）！1965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来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18）。这虽然是具体指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同样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晚年，由于思想认识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使得他的对外开放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正常的对外交往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毛泽东在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慎重而清醒的，在“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 70 年代，他和周恩来力排极左的干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嗣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正式建交，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本人对外部世界还缺乏充分的了解，这都不能不使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天新的条件下加以完善和发展的，而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主导方面。

三

对外开放是一项大政策，在它实施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要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毛泽东不仅有着明确的对外开放思想，而且对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也同样有过很好的论述，值得认真研究。

首先，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遵义会议以后，这成为毛泽东处理党同外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按中国情况办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依据独立自主原则成功地处理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而且也在外交战线上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抗战后期，毛泽东曾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又说：“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9）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生动

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毛泽东关于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这是对近代中国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近代中国是在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是以丧失主权、备受凌辱为代价的。这种状况自晚清开始，又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所继续。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是为了结束这种悲惨的局面，因而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既是主张对外开放的，又决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援助，但当抗战后期美方提出要中共接受蒋介石无理提案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时，他就在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象自由的人们一样靠自己的双脚行走。”

（2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有成效的反对美国封锁禁运的斗争，努力争取和扩大对外交往，同时他又明确表示：“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21）这些都表明，我们主张对外开放，但中国事务必须由中国做主，事关国家领土、主权问题是决不含糊的。第二，使对外开放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当然包括向西方世界开放，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既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又能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三，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与为我所需、所用的关系。毛泽东一向重视并提倡向外国学习，不仅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强调：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但是这种学习不是照搬，而是要分析、研究、理解。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由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历来受人欺负，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22）“全盘西化论”就反映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3）同样，毛泽东也十分鄙视教条主义的学习，认为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4）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

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25）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再其次，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又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持抵制和批判。在毛泽东看来，我们既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也不要因此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50年代中期，西方反共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难局面，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和平演变战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并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这首先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及时敲响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警钟，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诚然，毛泽东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党内外形势，使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恰当地重复“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政治上、经济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使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但是，就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说，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却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要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要善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一个批语中，曾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作过这样的表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里虽然主要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但同时也把争取外援和学习外国放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对对外开放——争取外援与学习外国的一种思考。

邓小平曾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6）就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政策而言，同样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已成为强国之路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仍然是富有教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4页，第56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第233—234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6—130页。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7页。

（11）（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页，第1507页，第1435页，第1473页。

（14）《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第208页。

(13)(22)(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第287页，第285页。

(15)(2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第264页。

(16)据1992年第10期《湖南老年》刊登的叶辉的文章记述：195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到广州视察工作，陶铸等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为了加快沿海工业的发展，当前可抓住香港贷款利息很低的机遇，引进资金在广州某个地区开办工厂，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向陶铸表示：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这个材料可作为我们了解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思考的参考。

(17)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8)(20)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6页。

(21)引自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23)(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3页，第752页。

两代伟人投向世界的目光——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潘治富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10多年来，由于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延揽八面来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了，带给国家以强劲的活力，带给人民以更多的实惠。面对着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充实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但是，与此同时，有人由此而发出感叹，相比之下，认为毛泽东是闭关自守者。然而，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言行，可以看出，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从来就竭力主张与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关系。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不是闭关自守者，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基础与前提；邓小平吸收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科学内核，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提出了更科学、更系统、更全面的对外开放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二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两代伟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贯穿于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渗透在包括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如何对外开放以及对外开放要坚持的原则全部理论的方方面面。

下面试就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和邓小平从理论上实践上继承、丰富、发展这一思想作一分类论述。

一、关于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是两代伟人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敏锐的思想和智慧的语言论断：“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斯的铁路管理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里，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种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管理方法、管理经验、管理制度等等，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可见，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张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是主张各国之间要进行经济交往的，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深谙革命导师重视国际交往的思想内涵，还深刻了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经过西域“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与世界各国发生经济、文化交流，并吸收各国文明融合为自己的文明。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遗憾的是，从清朝康熙年代至鸦片战争，中国长达 200 余年闭关锁国，结果导致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一切，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史，无不包容了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渗透。

所以，还是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战争年代，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在展望和规划中国的将来，萌发了对外开放的思想。1936 年初冬，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不仅同友好国家进行互助互利的贸易，而且“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毛泽东在这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愿与友好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愿望。1944 年 8 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说：“在相互同意的原则下，我们将允许并欢迎外国在我们的政治区内向商业及工业方面投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多次通过谈话及发出文件，申述了与外国进行交往的主张，表明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形成。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受剥削、受奴役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毛泽东曾以坦荡的胸怀，豪爽的气概对外国朋友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显然他说的各国人都有份，是指中国人创造的文明将奉献给世界；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丰富提高自己。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短处”。他在 1956 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都要学。”此时，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经达到了发展阶段，形成了全方位、多形式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理论框架：

——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我国长期闭关自守使我们接触不到世界上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感受不到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不能吸收国外资金用于我们的建设，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切都阻碍了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他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开放也是改革”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开放，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吸收外国资本，以作为社会主义一种补充。因此，就实质上讲，开放也是改革。

——他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理论。在国际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各国都希望在对外开放中获益，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外开放已经成了世界性的潮流，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他作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指出中国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

——他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指出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从极贫极弱的旧中国过来，正如邓小平透彻分析的，中国国情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和耕地少。在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就是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面对这样的客观实际，他指出“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他从总结我国历史经验教训中，明确提出了闭关自守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曾深刻指出，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国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他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闭关自守只能是更加落后于世界，落后于时代。”如果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他从当今世界政治、世界的角度，提出中国必须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既可促进本国及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有力地保证世界的稳定。他强烈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历史责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长期脱离世界，也不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发展了，“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对于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二、关于对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思想

基于“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长处”这一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在对外开放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国和小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建交和未建交的国家同时开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曾获得一个短暂的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为抓住机遇，建设解放区，1946年5月3日，在《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

方针。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论述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政策时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这就使与各国政府与人民进行经济交往有了法律保障。新中国刚成立，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团赴苏访问。在莫斯科期间，他曾致电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出入贸易问题，“务请统筹苏、波、德、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一年出入口种类及数量。”可见，毛泽东是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别，采取果断而灵活的政策，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未建交的，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贸易往来。在把对外交往的重点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同时，注意发展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11）。为了反封锁，反禁运，毛泽东、周恩来等为打开中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局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除扩大民间往来外，还建立了经济交往的半官方渠道。毛泽东曾大力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1959年6月11日，他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向客人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向你们关门。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也应该对别的国家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做些贡献。70年代初，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后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后又同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20多年的经济封锁禁运大面积解冻后，我国的对外贸易随之迅速发展（12）。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也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他在1984年就提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13）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是从那里来的。”这些国家经历了长期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拥有发达的生产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虽然这些国家大多由于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面临着起点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问题，但他们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是在两种制度并存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加强联系，密切往来，在经济上互相开放，促进发展。因为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可以取长补短，也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不至于受某个国家的支配（14）。

基于邓小平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一切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创造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思想，中共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就发展我党同外国政党的关系，对原党章有关部分作了重大修改。新中国建立初期，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范围仅限于各国共产

党。6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同大多数共产党的联系中断了，党的对外关系的范围缩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对外工作方针作了重大调整，目前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共产党约占30%，其他各类党占70%。中共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是因为各国都很重视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已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四大党章的新规定，既适应了我党新时期对外关系必须围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要求，又表明我党对积极发展各国政党的关系的真诚愿望。

三、关于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开放的思想

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从各个不同的渠道与外面的世界沟通，与各国发生联系，得到各方面的益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识。

如何实行多种形式的对外开放，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有许多论述。1944年8月，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的形势下，为创建新解放区，外交工作增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经济方面具体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15）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提出，“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16）。当时，已提出了外商在中国独资、合资或合作办企业。建国初期，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贷款的协定和创办公司等经济协定，引进156项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聘请了大批苏联技术人员和专家。同时，与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展了经济合作与交往，包括进行贸易和兴办合营公司等。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针对性地发表社论，指出：“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引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经济技术人员），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对外开放要多渠道：一是派人到国外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则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实行多种形式对外开放的思想，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开创了新路子，作了新的探索，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加以系统化：

——他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必须成为一个对外贸易大国，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指出，我们“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7）他不仅从现实角度——目前我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比例太小，强调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而且还从发展的角度强调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他主张要创造条件吸收外资。在我国经济尚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建设事业，十分重要。我们既要从国外获得贷款，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民间贷款，也要积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建立“三资”企业等。他曾多次指出，要创造条件，多吸收外资。所谓创造条件，就是要狠抓涉外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一系列吸收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外商投资必要的环境，即通常所说的“筑巢引凤”。他说：“现在外国投资有限，我们倒觉得这种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为了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吸引外资政策，应该“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18）

——他主张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己所用（19）。还有，我国在管理方面也比较落后，如果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没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方法，先进技术也发挥不了作用。大胆吸收和借鉴各国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它们运用到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来，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这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途径之一。

——他倡导建立经济特区，打开对外“窗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就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叫经济特区好”。“特区姓社不姓资”。1984年初春，他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进一步阐明了建立经济特区对于我国整个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意义，认为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他要求通过这个窗口，更好地观察和了解世界，与世界各国发生更密切的经济技术交往，使之成为我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通道，又成为我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向内地的桥梁。

——他支持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外出让。中国有着丰富的国土资源，但大量闲置，甚至荒芜。他曾提出过“要用地皮搞点钱”的意见。1988年底，海南省政府关于以租让土地吸收外资开发的“洋浦模式”一经提出，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不仅使海南省的洋浦开发陷于困境。而且也给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蒙上一层阴影。海南省委、省政府顶着巨大压力时，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大力支持。1989年4月18日，邓小平作了重要批示：海南省委关于洋浦开发的决策是正确的，洋浦开发机会难得，不宜拖延。手续要迅速周全（20）。国务院1990年5月公布了《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充实丰富了对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使沉睡多年的城镇土地被改革大潮唤醒了，增大了对外开放度。

——他主张要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国外人才，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他认为：“利用外国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21）很有必要。他还强调，“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外来有益文化，以加强与世界各国

的交流和相互了解，增强竞争意识。

四、关于对外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几个原则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理论基础上，从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特点出发，概括了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我们是不会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2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障社会稳定，防止动乱；才能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克服腐败行为。诚然，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就没有经济上的发展，更谈不到繁荣。由于对外开放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还要把对外开放同人民民主专政结合起来，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要出面干预，纠正过来。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建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之上的爱国主义立场，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基本原则。1944年8月，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必须站在我们的民族立场”，“我们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23）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教导大家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既要与外国进行交往，又要防止和避免在经济上受外国的垄断与控制的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的方针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也就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外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原则，又是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如果经济政治的活动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外国，那么国家不仅不能发展，连民族生存也难以保证，这已为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为了坚持我们党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曾郑重宣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并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这正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思想和路线，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当然，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他主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自力更生与学习别国长处相结合，走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道路。

——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工作不放，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和意识对人们的侵蚀和影响，以及其他利益冲突造成了矛盾，往往产生消极因素，所以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扫除这些障碍。毛泽东十分重视党政干部自身建设，把“为政清廉”作为立党、建国、创业之本。他反复告诫党政干部“应该十分廉洁”。他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政治工作、纠正错误思想等一系列教导，永远应当是我们的行动准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并把它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考虑。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抓好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有过许多论述，提出了很多意见：他强调要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他强调要提倡共产党和一切先进分子带头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他强调要有战略眼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他强调要狠抓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且要从具体的事件抓起。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道路和未来理想蓝图，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任务一起下，两副担子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

三

通过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和邓小平从理论上实践上丰富发展这一思想的探析，我们循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人闭关锁国者，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其中许多方面至今仍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那么，为什么“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24），经济建设步履沉重、速度缓慢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前后，正当我们开始恢复、建设的时候，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不甘心在我国失败，军事上进行包围，政治上进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毛泽东在1949年8月30日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作了深刻揭露：“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着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大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胁迫其他国家也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后来，由于与苏联关系恶化以至破裂，我们开向苏联、东欧的门也被关上了。

美国对中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政策，直到 70 年代初，才打开了关闭 20 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中国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逐渐增多的往来。所以，当有人误解毛泽东是闭关锁国者，韩素音女士不平地说：“怎么不顾到历史事实呢？是美国想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25）

二、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由于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限制，加之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识不够充分，因而使他在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受到一定局限；有些实践背离理论，有些正确思想并未完全实现，还曾出现过某些偏差。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所以他更重于抓对人的斗争，工作重点未能转移。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八大”以后准备起飞的发动机。受到这一影响，从 60 年代以后，我们的对外开放思想发生了变化。从强调自力更生走向自我封闭，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发展到把闭关锁国当成自力更生，把对外开放说成是“洋奴哲学”，后来社会上竟流传着“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

三、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

世界近代史向我们展示，经济落后国家，尤其是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只有正确利用而不是完全排斥资本主义，批判吸收而不是一概拒绝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方能繁荣富强起来。世界在变，资本主义也在变。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很少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不能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发展，如实估量其新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能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思想认识仍停留在某些传统观念上。舆论宣传方面对很早就提出的资本主义已陷入总危机的分析被长期沿用；实践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切文明成果都看成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而不敢学习借鉴，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应是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这一基本原理。

四、民众的某些消极心态

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心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有种隔膜，影响着去对世界先进文明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有着改变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就其激励奋发图强来说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它也导致产生急躁冒进情绪，怀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优越感，背着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的包袱，形成的民族自大意识，产生狭隘的虚骄心理和盲目性，以致关起门来搞建设，想腾飞，却腾飞不起来。

其二，习惯于按旧的传统行事，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狭隘保守，对任何变革竭力阻挠和反对。他们将改革开放当作一种与中国传统相对立的乃至破坏性的力量，从而认定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华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传统的变异。正是因为被旧的传统所困惑，所以失去一次又一次机遇，结果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行走。

历史和认识的发展都是呈“之”字形的。认识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接近其真理性。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曾把经济成长过程比喻为“历史的隧道”——要想通过这个隧道，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经历。邓小平正是在郑重地审视历史，勇敢地纠正错误之后，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经过实践，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进入了全面发展和逐步完善阶段。对过去几年改革开放实践进一步补充、阐述，从局部转向全面，从微观转向宏观，从政策性措施性转向理论性，更有普遍性、原则性和指导性，逐渐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邓小平的思想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也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时代的重大的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并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深信，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承前启后，必将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进步，迎接“中国人的世纪”。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九江市委党史办公室）

注释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11)(12)(25)参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73—78页。

毛泽东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7日。

(13)(21)(2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第105页，第77页，第83页，第20页，第54页。

(14)(22)转引自《改革开放学习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247页，第248页，第249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党内发行），（13），第396页，第396—397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5页。（15）（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党内发行）（12），第575页。（17）（19）参见《党建文汇》1992年第5期，第4—6页。（18）《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的谈话》，198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20）转引自《新东方》1992年第5期，第9页。

邓小平论毛泽东

龚育之

(一)

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发生伟大转变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领导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有三个领袖人物：

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孙中山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评价。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了崇高的历史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评价。

后继者对先行者、后一代对前一代的科学的的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科学的指南。

(二)孙中山是在中华民族衰落到谷底的 19 世纪末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面对着“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这个口号，在整个 20 世纪中成为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口号。

孙中山的伟业，一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 20 世纪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二是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新的革命斗争。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背叛了三大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拿着当招牌的孙中山没有多少好评。这有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那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左”的思想和狭隘情绪。是毛泽东，克服了党内的这种思想和情绪，充分地、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这份政治思想遗产的宝贵价值。毛泽东对孙中山的科学评价，写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在他的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在对中共七大报告作口头解释时说，我在报告里尽量把孙中山的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史辩证法的路。”

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对手国民党的缔造者作这样崇高的评价，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的极其宽阔的政治胸怀和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不仅在国共合作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仍然如此。他的《纪念孙中山先生》和作为《毛泽东著作选读》终卷篇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表明了这一点。在 1964 年 12 月写的收入终卷篇的一段文章中，毛泽东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里毛泽东对“大跃进”作了不同于 1958 年的新解，即把它解释为中华民族在 20 世纪内从落后赶上先进的振兴和跃进。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始终是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把自己、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孙先生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

(三)毛泽东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中国自己

的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努力，长时期内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击。红军被迫长征，证明了这种领导的破产。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如邓小平说的：“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由于领导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由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立场并在抗日战争中使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延安整风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变成了全党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1945年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很快，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继辛亥革命之后20世纪中国又一次更加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毛泽东因此而成为全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学习的指导思想。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总结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这些胜利使新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已经不成为问题。

然而，在这以后我们的事业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可是，在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却被强调地宣传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发展。对这些实践和思想的怀疑和抵触，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斗争和打击。从而造成了政治思想上极度的混乱和困惑。

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四）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的。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摆在这一代人之中。他曾经三次被打倒，都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有关。

第一次是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时毛泽东受排斥和打击，邓小平也曾被视为“毛派”而受到批判和处理。“毛派”这样的派别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视为一派，说明那时在思想和政策上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影响，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一个大解放区的领导人，在全党整风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就是确定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强调其指导意义并给以高度评价的最早的文献之一。从党的八大前后开始，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60年代上半叶，林彪以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名竭力制造个人崇拜，邓小平同罗荣桓等一起，对那时出现的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进行了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罪名”很多，这成为其中的一项。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整顿中邓小平特别指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重新提起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教训，这是针对“四人帮”的。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加给他的“罪名”很多，这又是其中的一项。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这样，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局面的关键。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切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

（五）邓小平是怎样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呢？

问题的根源在思想路线，解决问题的着手处就在于重新确立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后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

能不能、会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至关重要。

如果不能、不会作这样的划分和区别，那就两者必居其一：

要么是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却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要么是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的一个重要由来就在这里。

邓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就表现在作出这种划分，把握这种划分，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从而做到了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只有坚持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

（六）实现这个历史转折，经过了两个重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把一切指示和决策都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实践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可能。而打破这个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这样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得好：“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不就是因为他不以“凡是”的态度对待马恩列斯的本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吗？

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如果说，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确立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议，那么，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经过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又包括毛泽东晚年发生失误，中国的建设遭到重大挫折，这样的复杂情况），由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决议。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从批评“两个凡是”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七）邓小平指导制定历史决议，牢牢地把握住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摆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这两者的位置。前者是首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者也是重要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第二，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第三，毛泽东晚年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纠正这个错误，正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正是要把握这个契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四，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

第五，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第六，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有责任，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有错误。“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这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格力量。

邓小平说：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这样一些指导方针和关键环节，都反映在《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和《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的其他许多文章中（八）作出历史决议，是一件大事；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内国外发生的风风雨雨中，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不动摇。继续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仍然是一件大事。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经常讲到我们党的历史，讲到历史决议和它所作出的历史结论。他还用了许多简洁的、鲜明的、一针见血因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语言，对这些结论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达。

“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他自己回答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他正是通过讲建国后党的历史，来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十分重视1957年下半年以来“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于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意义。他说：“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我们的改革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大家意见那么一致呢？“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论述帮助我们加深对历史决议的理解，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道路的理解，加深对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走回头路的理解，对于继续克服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潮的影响，无疑会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十年中，尤其是国内外出现政治风波的时候，总会出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冒头的情况。

1986年有记者向邓小平说，现在领导人的主张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邓小平反驳了这种看法，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1989年2月当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邓小平发出“中国不允许乱”的

信号的时候，他又讲到：“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1991年8月，当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时候，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论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这就是说，邓小平一直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以历史决议为武器，进行反对否定毛泽东、丢掉毛泽东的错误思潮的教育和斗争。

总之，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作出历史决议和坚持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决策表现出来的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个重大决策对于我们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的意义，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九）邓小平要求这一次历史决议“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次历史决议作出的概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不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进入更深的层次，提出了“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早在开始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而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不久邓小平又提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历史决议中，进一步加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条。

强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阐发的重要成果。

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三个要点统一的雏形。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有这三个要点贯串其中，这三个要点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具体的科学论点，我们都要学习和继承，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我们不能企望从前人的书本里去寻找解决新问题的现成答案。关键是要掌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精神，去创造性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新理论。

邓小平说得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那两大段话，正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要点统一的最高概括。这三个要点，同时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党的十四大概括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条指出的就是这一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说，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从开卷到终卷，这个活的灵魂贯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书。

（十）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继承和推进他的思想和事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 1956 年在孙中山诞辰 95 周年时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写道：“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现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迈向 21 世纪。

如果说，19 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斗争、走向振兴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振兴的世纪！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论邓小平正确领导评价毛泽东及其重大意义

李复民李敦送

共产党人能否正确评价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事业盛衰兴亡的大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运严重的思想混乱，并引发了波匈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使国际共运遭到重大挫折和损失。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列宁，这是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然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正确地领导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认真研究我们党领导评价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及其重大意义，无疑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共运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在深入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进行拨乱反正的任务。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分析和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正就无法深入，党内外的思想就无法统一，党的路线就不可能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然而，正确评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评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曾经认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被一些人当成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最大的发展和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正是由于企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被再一次打倒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外一些人仍然被“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严重束缚着。特别是当时坚持“左”的错误的同志，不仅否认乃至讳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他们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他们甚至还压制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把这场讨论指责为“砍旗”、“丢刀子”等等。

第二，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度”难以掌握。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乱，因此，一部分人在评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时候，就容易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已经出现了一股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右的思潮。他们在各种场合“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放肆

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有些人进而发展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一生是同我们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和军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对毛泽东的错误，如果言过其实，无疑是“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样，“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上述两种情况说明，如果对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引起“天下大乱”，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第三，国际上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极为关注。敌视中国的势力，出于希望中国发生和平演变心理，大造中国搞“非毛化”的舆论；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国际共运造成严重混乱局面还记忆犹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则担心中国也会发生类似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能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就成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盛衰兴亡的全局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它“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在社会主义各国，对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党要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是对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的严峻考验。

二、邓小平对评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在严峻考验面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审慎地领导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成功地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一）批判“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思想基础

邓小平认为：“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不破除“两个凡是”，端正思想路线，就根本谈不上正确评价毛泽东。为此，他以极大的热情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地支持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持续半年之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精辟地指出，如果只是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根本的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为了密切配合这场大讨论，把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引向深入，从根本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党中央领导全党，以掌握马列主义关于真理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为重点，开展了深入学习毛泽东哲学

著作的热潮，从而使这场大讨论成为我们党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端正了思想路线。这就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思想理论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防止评价毛泽东的活动偏离正确的轨道

批判“两个凡是”前后，党内外产生了一股右的思潮，主要表现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如果任其发展，势必把评价毛泽东的活动引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歧途。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月至4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专门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也批评了党内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的做法。严肃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以后，在讨论修改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他还针对党内外暴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把正确评析毛泽东晚年错误变成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后果。

（三）明确提出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原则，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指明了方向

在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先后九次亲自听取汇报，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这些谈话中，他首先明确提出了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所应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开始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

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发现在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太多太重的时候，邓小平又及时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强调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分析各种不同情况，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

邓小平不仅倡导而且率先垂范地坚持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从而得出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1）正确结论。

第二，不应只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当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一些人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错误的责任都归结于毛泽东个人，甚至在个人品质上找原因的倾向，他明确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3）。“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4）绝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在摸索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但是，最重要的是具体制度上的问题。毛泽东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具体制度不好，把他从正确推向错误。所以，邓小平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5）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不要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针对一些人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的倾向，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批评毛泽东错误的时候，不要使用“路线错误”或“错误路线”的不科学提法。他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为此，他指出：“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16）。这就抛弃了党内斗争中已有长久历史，并形成沉重负担的一套不科学的方法，开了对历史是非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的一代新风。

第四，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严格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相混淆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17）。发动“文化大革命”就

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结果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是他没有能预料到的。他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 467 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特别重要的是，他亲自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使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不能得逞。这对于维护党的统一，保护社会主义的根基，乃至为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8）。而林彪、“四人帮”则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

第五，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针对有些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0）他强调：“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21）。

众所周知，国际共运内部，在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一些不科学的做法，使评价领袖人物问题没有能够很好解决。邓小平上述评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突破了从个人角度的狭隘眼光进行评价的做法，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一生同党、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同国际政治的全局联系起来进行评价；突破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突破了以路线斗争论是非的惯例，坚持对领袖人物的错误，讲其内容、实质，原则上不再使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一类不科学的提法；突破了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着重分析领袖人物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和环境，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从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具体方法上，为评价毛泽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统一党内外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提供了保证

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由于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既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又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所以起草和修改《决议》的过程中，党中央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反反复复地在领导层中座谈、讨论、研究。据初步统计，从 1980 年 10 月 4000 人会议开始，到 1981 年 6 月通过《决议》为止，8 个月内，仅党中央召集的主要的不同规模和形式的会议就达五次之多，其中既有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又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还有中央党政军机关领导干部参加的会。通过反复的座谈讨论修改，既广泛地吸收了他们提

出的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又消除了党内外领导干部对评价毛泽东的分歧，统一了思想。这样，在数易其稿的基础上，终于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既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能够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的正确评价。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重大意义

尽管我们党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但是，随着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越来越显示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重大意义。

（一）在党和国家历史性的转折关头，通过正确评价毛泽东，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当党的领导工作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发生严重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引起党内外严重不满情绪的时候，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往以前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犯过严重错误为借口，用全盘否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的办法，甚至用丑化和漫骂的做法，以求消除不满，稳定时局，摆脱困境，打开局面，巩固政权。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同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就是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光辉历史，就是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在一些人中引发对党的信任危机，而且还会授人以柄，使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以实现他们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维护了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又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他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错误；在分析他的错误的时候，又坚持了不过份追求个人责任的做法，而是着重指出他犯错误的复杂背景和环境，特别是在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带根本性的原因，着眼于统一党内的思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前进的方向，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而遭到严重挫折之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相反，经过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 30 多年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思考和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22）。这正是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以巩固，在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在我国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党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战胜风浪，绕过暗礁，把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继续引向前进，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

（二）使党内外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出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大好局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等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许多人，仍被个人崇拜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和认识严重束缚着，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事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重大原则问题，在认识上很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创造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

我们党正确领导评价毛泽东，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摆脱了许多“左”的禁锢，使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并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这样，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出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由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评价毛泽东的整个过程，又是在同“两个凡是”和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错误思潮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因而，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就成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第一，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科学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活的灵魂作了新的概括和阐述，为进一步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科学的基础。《决议》不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根据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23），以便“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24）的意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概括为六个组成部分，并对其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阐述，特别是对它的活的灵魂，即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作了科学的阐发。这就不仅比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剔除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毛泽东思想的诸如“最高最活”、“顶峰”等形而上学的不实之词，也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学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第二，批判了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指明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向。根据邓小平关于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指导作用写清楚，关于我们今后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决议》不仅批判了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

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而且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在新的实践中，珍视、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并力求“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这就为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初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我们党本着总结过去、探索未来的精神，认真总结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失误和挫折的教训，也研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终于初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决议》总结的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经验，就是对这个理论的最初概括。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从今天看，尽管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决议》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有的条目的内容还不尽完善，但是，这十条毕竟已经初步勾画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毕竟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正是在此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步臻于成熟，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提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国际威望，鼓舞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斗志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巨人。他的理论曾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勇气。他在国际共运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通过评价毛泽东，成功地纠正错误，摆脱困境，打开局面，走出新路，在国际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成为国际上很大的政治问题，引起全世界共产党人、友好国家和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中国共产党人以《决议》的庄重形式，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所作的科学评价，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确实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党；确实是一个久经考验，获得了极其丰富经验和教训，有能力领导人民排除万难去不断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党。所以，我们的《决议》公布以后，各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称赞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先例”，是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典范，必将对国际共运产生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

注释

黄克诚《关于对毛泽东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1)(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66页，第262页，第263页，第262页，第133页，第150页，第243页，第255—257页，第273页，第294页，第260页，第158页，第293页，第272页，第303页，第271页，第305页，第475157—158页，第325页，第371页，第256页，第261页，第149页。
(12)《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逢先知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它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同时也包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的正确的理论概括。它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条件。怎样看待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利用这些新条件？这就要适应新的需要，提出新观点、新办法、新政策，走出一条新路子，形成新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个新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对毛泽东思想不存在纠正的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在一定范围偏离毛泽东思想而犯了错误，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有一个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的过程。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邓小平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实行开放，规划发展战略，制定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在这个统一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否则就失去了继承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谈不上发展。这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段话，可以看作是邓小平对他领导开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14年，乃至他从事革命事业几十年经验的基本总结。

讲到实事求是，就有一个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如何理解的问题。应当指出，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就包含着解放思想。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人们的思想就要随之而改变。但人们的思想往往有滞后性，容易被习惯的力量、被旧传统旧观念所束缚，思想跟不上已经发展的客观实际。在这种情况下，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另有一种情况，当人们的头脑受到某种错误的思想、理论统治的时候，如果不从错误的

思想、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也谈不上实事求是。反之，解放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解放思想不是毫无根据的瞎想，也不是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空想，瞎想和空想都是违反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

应当指出，邓小平特别强调从解放思想中去实现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到党的十四大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都表明了这一点。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论在拨乱反正中间，还是全面改革时期，我们党遇到的主要阻力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封闭、思想僵化，因而必须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的任务。这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这个问题上的新特点、新发展。

第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还有一条红线，这就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确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样，邓小平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倾听群众的呼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英雄”，认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领导者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同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都是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发明，群众的智慧，领导人的责任和功劳是把这些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又一条红线。这个思想，最早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根据这个思想搞成功了；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个思想也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由于各种局限，他没有寻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但是他的探索精神，他反对一概地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探索中的失误的同时，继承了他的探索精神和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指导思想，终于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个实事求是，一个群众路线，一个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来说，“特别重要”。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两条最根本的东西”和一个“立足点”。这三者贯穿和渗透在邓小平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邓小平能够找到一条成功之路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最基本的方面和在最高的层次上即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对基本国情的认识问题。毛泽

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两个阶段的意见。他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在此之后，毛泽东还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要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新认识。这同“大跃进”时代出现的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迥然不同。提两个阶段的说法无疑是一个重要思想，但是他没有展开，没有说明，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认识。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并以初级阶段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依据，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飞跃。70 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说明，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几乎是一个通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的提出，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还说：“要宣传搞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更重要的（注：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应当将目标引向在生产上赶上美国。”毛泽东并在实际上领导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在历史转换时期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决策。但可惜的是，这个思想和战略决策不久被改变了，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而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进行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到次要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恢复并发展了毛泽东和党的八大的正确思想和正确战略决策，确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邓小平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把这个问题作为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们党、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积累，邓小平对“根本任务论”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主要有：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三、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到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坚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战略目标。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和理想。

毛泽东确定了中国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骤。第一步，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他对四化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设计。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对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一次提出一个具体标准。大平问他，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答：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开始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平均收入（注：这里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后来，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逐步发展，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越来越切合实际，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想。

第七，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毛泽东提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发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述，是对斯大林长时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传统理论的突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是今天我国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的理论依据。

但是毛泽东在解决这一对基本矛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他用“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以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经济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强调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不断提高公有化的水平。（这中间有一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给工厂企业一定的权力，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等一系列重要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其他原因，他最后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上层建筑（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个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实行了一些“左”的政策，对社会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他后来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两对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遵循新的思路，提出一整套新的方针、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其中也吸收了毛泽东一切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个理论把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許多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商品经济，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所有制方面，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态，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形态；在分配制度方面，由单一的按劳分配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这些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保证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坚持了毛泽东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决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另一方面，鉴于长期以来民主发扬不够，法制很不健全，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

本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力，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的伟大影响和作用的原理，继承和吸收了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优良的传统和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展，提出以“四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

第八，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解决对国际形势，主要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怎样判断，以及实行什么样的国际战略的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毛泽东曾说：“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并且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70年代、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和判断，改变了毛泽东的看法。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由于和平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与此同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改变了毛泽东根据当时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制定的“一条线”的国际战略。这两个转变意义重大，由此我们可以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可以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这里应当提到，毛泽东在晚年，为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这为以后我国获得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实行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要解决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国对外开放的很重要方面，是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放，同它们发展经济关系。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外国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他说：一切外国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都要学。他还提出过利用外资的问题。但是60年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主要锋芒是批判资本主义，很少提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再往后甚至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而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指导下，我们党形成这样一些新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吸收全人类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好的东西，只要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都要学习、吸收。有些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法等，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或者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它们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超越国界，国际间的竞争和斗争越来越取决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新思想、新观点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办法，同改革一样，都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富于创造性的一部分。

第九，四项基本原则。毛泽东1957年提出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可以看作是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最早表述。六条标准和四项原则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正如邓

小平所说，四项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两条，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强调这是最重要的两条。

但是，比起六条标准，四项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份量更为重要。四项基本原则被确定为我国的立国之本，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四项基本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原理原则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不断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例如，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自身在变化着、完善着，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僵化的模式。这里就有一个怎么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再如，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不能改变，但是党如何实现领导，则是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改善。

以上我们从最主要的一些方面分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有许多方面，例如：统一战线与和平统一祖国，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民族、宗教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都有继承和发展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继承或者原则上继承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如“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的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但缺乏具体实施步骤，或者由于条件不具备而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在新条件下，加以完善、系统化，形成概念，并逐步付诸实践，如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属于个别的、一时的、一闪现的有价值的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种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而后来又偏离了这个理论走到错误的方面，邓小平纠正了他的错误，恢复了正确的东西，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问题。这是在纠正偏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中，发展毛泽东思想。一种是由于国际条件的变化，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提出新的看法，作出新的判断，如战争与和平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崭新的东西，如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内容，不仅对毛泽东思想来说是崭新的，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崭新的。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它继承和汲取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精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并且增添了许多崭新的东西。这里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情况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实践的积累和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和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它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永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认识和理解得越深刻。同样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的著作学习和掌握得越好，就会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得更深刻。在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贯通的东西，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包括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一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作了历史的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经过实践，而且必须经过正确和错误，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总结了正面的和反面的，胜利的和失败的经验并且进行比较，才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发展规律，写出科学著作。而总结反面的、失败的经验，尤其重要，因为错误和失败，使得客观事物的矛盾暴露得更充分，人们比较容易地认识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说过，没有胜利，没有我们那些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个小册子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思想就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经验而形成的。有了毛泽东思想，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这是30年代、40年代的事。

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辟头的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样，一个新路子的开辟，一个新理论的产生，一个能够回答历史课题、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人物的出现，成了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呼唤。错误发展到极端往往孕育着一种正确的主张、理论的产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似乎是一个规律。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进而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验，逐步制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出了一条新路，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走上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进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又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闭关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在党内和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摆脱社会主义道路，摆脱党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顶住了并批评了这股错误思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邓小平把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解

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种困惑，解决了理论上的一个难点，即：要肯定毛泽东思想，就无法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历史决议》的作出，成为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基础，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必要条件。

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邓小平，对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不成功的地方在哪里，主要的问题和错误在哪里，他比别人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较早地从深层次、从指导思想思考党的失误。因此，哪些方面应该纠正，哪些方面应该继承，哪些方面应该发展，他把握得很准确。这是他能够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是1980年10月说的，讲得很实际，很深刻，仍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又继承，又发展，又纠正（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特别强调今后要继续发展。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概括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论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如果说，总结历史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昨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那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主要地是从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1985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七年间，我们主要作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都是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拨乱反正，并不是完全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况。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大体上划分一下，在党的十二大之前，比较地侧重于拨乱反正，当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党的十二大以后，则更侧重于全面的改革开放。在拨乱反正中，比较地强调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已经有了发展；在全面的改革开放中，则比较地强调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仍然有继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面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对前人有突破，有创新，提出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仅突破了毛泽东思想的某些理论观点，而且突破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的理论观点。我们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说明它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也说明它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够这样做？这是因为：世界、中国，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科技，都发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出现了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理论需要对新情况、新变化作出说明，对新问题作出解答，对新的实践经验作出新概括。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必须随之而改变，不能让已经发展了

的实际去“符合”滞后的理论观点，让客观去“符合”已经落后了的人们主观世界，那样做，就叫做削足适履，是行不通的。而应当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六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带领部队下井冈山来到赣南、闽西，到了平地，有了城市，环境变了，出现了新情况，可是有些同志思想仍然停留在老地方山地、完全的农村。他当时说：“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个话，语言十分形象，内涵十分深刻。今天，我们的身子已经到了90年代，我们的思想就不能再停留在十几年、几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所谓“不能停留”，不是说要完全抛弃过去的东西，不是的，过去的好东西，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总之，思想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理论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理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客观形势变化的程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可能机械地搬用别国经验，只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大胆试验，开拓前进，积累经验，逐步形成新的理论。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又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

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相适应，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先验的，不是从学理和概念推演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新政策、新办法、新观点，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在总结党和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提出来的，再用以指导实践。经过长期的积累、思索，逐渐形成理论观点和理论构思，经过实践检验，然后再深化，并加以系统总结，加以完善，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要排除各种干扰，右的和“左”的，而主要是“左”的干扰。既要反对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的倾向。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集中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全党的智慧。但这个理论的根本点和主要点是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大厦主要是由他建造的，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突破它们的某些原理，创造新的理论，需要勇气和智慧。当年，毛泽东突破马列经典中的某些结论，开辟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邓小平突破马列经典中某些结论，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且继续证明，

邓小平是正确的。他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在实践中继续发展，才能永葆革命活力，否则，就不是它们自身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国际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如果我们今天是处在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认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那末，我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也不可能实行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从而改变了我们过去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战争是可避免的新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一心一意搞建设，就国际条件来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上的。这个问题已在前面说过。

根据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我们党调整了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正如邓小平说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13）这就是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往后，邓小平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他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还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4）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新时代的气息。

五、结语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作上下两篇文章。我想也可以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的两次革命。这两次革命所处的时代不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第一次革命，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的，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革命，是由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的，将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次革命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第二次革命必须由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

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时期，完成两个不同的历史任务。第一个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历史任务是第一个历史任务的继续和发展。相应地，作为第二个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意气昂扬地、满怀信心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胜利

前进，迎接 21 世纪，迎接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

（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42 页，第 122 页。

（11）（1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第 78 页，第 234 页，第 172 页，第 269 页，第 258—259 页，第 291—292 页，第 266 页。

毛泽东与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 年 12 月 7 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67 页。

（12）《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4 页，第 296—297 页。

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石仲泉

—

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自 20 年代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从宏观的历史视觉来看，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的 28 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是两个革命过程，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中国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样，毛泽东对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一部分。放开视野，从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来看，这是属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头 7 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毛泽东在 40 年代初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 1955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尽管对某些改造步骤有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但从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上看，毛泽东对这个转变时期的探索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和平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赎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第四个时期，是从 1957 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步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

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遗憾的是，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并且由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论的不断升级，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也愈益偏离正确轨道。他的主要注意力愈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在 1963 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到 1966 年 6 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第五个时期，是 10 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进行“探索”。但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探索，是陷入“误区”的探索。因此，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无疑要否定；但并不是说在这 10 年间，他没有提出任何积极思想和主张。

综观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但其正确和成功是主要的。在理论上，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仅就理论贡献论列以下主要几点：

——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后者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

——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 1/4 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他批评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严格加以区分和正确处理；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如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使其既具有无产阶级真正的国家政权性质，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创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形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以及由此提出的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思想具有战略远见；强调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基本认同党的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的根本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 1958 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

革命；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其他各种关系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上一度允许私营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又搞资本主义”；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上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要求通过改善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到60年代前期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继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性的方针；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和在全社会内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方面，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几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参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的某种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煞。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心血和智慧（有的还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凝聚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它。

二

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也是应当总结的，特别是他的理论失误更应当认真研究。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应当说明的是，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为了否定他的伟大功绩；也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模糊重大政治是非界限。指出错误，正视错误，是为了使“向错误学习”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对待其他这类错误一样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然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那末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

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做一种耻辱，要同时看做是一种财产。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正是采取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一方面纠正他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些话概括他说明了新时期以来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怎样认识新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 11 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自 30 年代初起，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本本主义的共识，就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他的工作都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前期的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过党的不少领导人和负责人，但从未批评过他；并且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讲过：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对邓小平的认识发生逆转。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曲折经历是人们熟悉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能够正确地对待过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实现了罕见的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一切的“自我”。邓小平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荣辱，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以个人这种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还表现在无论全党怎么拥戴，他始终不当第一把手，不断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率先传、帮、带。在 1989 年以后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种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长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认识并否定他晚年的错误不是容易的。“两个凡是”是一种历史现象。邓小平的卓越智慧就在于，他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把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扳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通过这个超越，他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第三，超越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尊重实践第一原则，非常关注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并且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通过总结70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逐步地形成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几十年被尊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三个超越，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伟大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辉煌。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历史巨人也如此。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的20多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末上述三个超越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是邓小平的黄金岁月。人们已经公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结晶是以他为核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概括他说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研究两者关系的政治指针。下面分别阐述两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三

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由此形成人类认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在认识邓小平理论与

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认为，邓小平理论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看法在国外也有。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思想混淆：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没有加以区别。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这两者的关系时，实际上涉及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理论。只有分清这三者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两者的关系。

前已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经过《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科学界说之后，确定只有毛泽东正确的那部分思想才属于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往往忽视这种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和界定，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没有这个区分和界定，不仅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能清楚明白、理直气壮地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区分和界定，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就能正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就邓小平理论来说，它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只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或者说，只有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邓小平理论两者之间，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则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在转化的意义上，即否定了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使错误转化为正确的先导，从而产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路线和理论。有的同志对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往往只是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比较。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的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不能用来说明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这两者的关系。

但是，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而言，两者存在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这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 理论的创立者的连续性。一般他说，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具体他说，这是以两个历史巨人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这两代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存在着连续性。邓小平、陈云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都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的事业，并在中央担负相当的领导责任，或是某地区、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如前引述邓小平讲的，“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或没有纠正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

2. 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里说明的理论思路是指大思路或根本思路，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思路。就具体思路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会有所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言，则是一致的。这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个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客观实际出

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反复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本人就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又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些言论，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两者大思路的连续性。就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而言，邓小平的大思路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脉相承！

3. 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说，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特色”。在30年代和4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功。在50年代和6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强调这个特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多次讲过：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解决他们去世以后50年、100年、200年发生的新问题。“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天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的一个重要特点。

4. 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无疑的。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过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渊源。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准备了某些基础。只要将中共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内容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思想观点相比较，就不难了解这两者之间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两者理论内容的连续性，绝不是说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全部是过去都有的；从毛泽东那里可以找到渊源的理论知识，也不是同过去的完全一样。正如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内存在某种“遗传因素”一样，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境下吸收营养，发生“变异”，成为具有新质规定的新的思想观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用僵化的固定眼光来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

四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会有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这可以用来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

东思想的另一层关系——发展。这种发展关系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经历若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阶段性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展和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这个结合，以后还需要这个结合。随着形势、任务和认识的变化发展，这种结合的科学成果也必然发展。历史过程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点上，就不能不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12），那末同样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中共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还姓“马”，但是这两个时期理论形态的变化，却呈现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这种阶段性的飞跃，亦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1、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革命展开的。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认识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要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初步地形成了一些如前所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能一以贯之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并在相当长时间越来越严重地走上了歧途。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才真正实现了这个战略转移，并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逐步地形成、充实和建立起了中共十四大所论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改变了一些人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革命的成套理论，没有领导建设的成套理论的看法。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例如，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从哲学上提出部分质变观点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是，毛泽东对此既没有展开分析，也没有着重提出，“不发达”的概念还很含糊。因此只能说是带有一时性的，但却值得珍视的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既是有明确界定的，也是经过

展开论证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要以这个关于国情的基本认识作为我们确定路线的根本依据，并且据此确定了一系列过去没有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而言，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科学的确定性，相对于前者是一个质的飞跃。再如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 1956 年冬到 1957 年春都有很多精彩的议论。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资本家拿出定息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 100 年不没收，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尽管主要是对个别特殊问题的认识，还没当作一个普遍性问题来思索，但也表明了当时思想的开放性和政策观念的灵活性。可是，这个思想在毛泽东那里象流星似的闪亮了一下，转瞬即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时，把毛泽东曾经闪现过的上述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来规定，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等新概念。这是理论认识的一个很大的飞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被看作天经地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区别姓“社”姓“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建设的某些理论也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从 50 年代中期起也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良，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经济。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不仅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的巨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是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谈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

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

前面三点是就具体内容进行的分析，这是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作总体比较。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一些广为宣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越来越从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离去。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远了，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讲的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由短变长了（因为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会有多长现在更无法预测）。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限于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中承认商品交换，再到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由完全不承认市场经济到只承认市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辅助调节手段，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由强调公有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存在并共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只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到承认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其他分配方式可以作为补充而存在，包括允许一定量的剥削。如此等等。

怎样认识这些观念的变化呢？这些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先辈始料未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并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即所谓“由高到低”，“由纯变杂”等），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的巨大变化，与党的历史上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发生的变化非常相似。那时为了抗日，我们党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倒退；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政治力量和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动之后，我们党的政策不作这样的大调整，就不可能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自身也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无论对于民族利益还是党的利益来说，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经过抗日战争，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经过自卫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当然，历史不能简单类比，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的情况与那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即整个初级阶段）。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作政策的巨大调整（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不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那就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严峻的历史事实。东欧一些国家制度剧变就是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去掉了许多不符合现阶段实际的虚幻成分，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深深地扎下了根子。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来看，1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总体上更加坚实和雄厚了。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由基于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产生的新的思想观念建构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不能不形成巨大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同时又没有、也不可能完结

对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放型的思想体系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第131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109页，第121、109页，第372页，第114页，第40页，第140页。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9页。

邓小平在1945年3月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4—25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页。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梁锦伟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历史标志和前进轨迹。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毛泽东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在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必须搞清楚，这就是：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呢？

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看。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璨群星中的两颗巨星。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是毛泽东的战友、助手、学生和继承者，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他强调，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成为关系全局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出来说话，在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种胸怀和勇气，体现了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非凡的历史远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两次革命的关系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源泉都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的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实践。新的革命即第二次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即第一次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源泉是一脉相承的。

从哲学基础和思想路线看。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也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这是毛泽东的功绩。邓小平把解

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归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邓小平的新的贡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都建立在同一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上。

从解决中国问题的总思路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寻找中国独立富强之路。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认定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毕生探索我们党自己的思想和中国自己的道路。毛泽东领导全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邓小平领导全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两者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思路是根本一致的。

最重要的，从思想理论的关系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科学的态度，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的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晚年那些有价值的、积极的、正确的思想区别开来。邓小平强调，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坚持、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的就是这个科学思想体系。凡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都坚持、继承下来了。第二，在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同时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彻底摒弃这些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而且在拨乱反正中发展新理论。第三，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同时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突破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框子。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更加实际和科学，逐步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的那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邓小平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突破禁区，创立新说，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还没有提出过的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改变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飞跃。对于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那些很有价值但还不完整的思想，那些正确但未予展开的思想，邓小平特别精心地继承，并在新的探索中进行新的开拓，实现新的创造，增添新的内容，形成完整的崭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是当代中国捍卫、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面对以上这些事实，这些最重要的事实，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既不是原版重复毛泽东思想已经讲过的东西，更不是抛弃或贬损毛泽东思想，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新的历史性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 50 年代起就进行艰辛的探索。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的八大的一系列文件，就是这种探索的良好开端。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由于后来指导思想向“左”的方向的错误转轨，产生了严重的失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今天已经融进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而在探索中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作为历史的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以后，经过科学的分析总结，反转为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无论是正确，还是失误，都发生在我们党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正确”要继承，“失误”要纠正，“探索”要继续，在继续探索中开创新局面，创立新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而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的条件下，创立新的思想理论。贯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两点最重要的精神，一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邓小平求实、创新的思想方法。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完全另外一套。另一个偏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个观点，以至每一个提法，都到毛泽东那里寻找根源，处处对应，甚至把邓小平独特的、开创性的发展，都说成是在毛泽东那里“早已有之”，来一个“回归毛泽东”。

诚然，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浩瀚深邃的思想源泉。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永远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毛泽东的许多论著和观点，在今天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诸如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关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的战略思想，关于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理论，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观点，关于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的理论，关于防止腐败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思想理论中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在今天还有很强的针对性，需要很好地学习、研究和贯彻。

同时，必须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逐步形成、发展和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也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主要是从特征上认识社会主义，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正确认识需要坚持，也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附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的不科学的认识需要纠正。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的独创性贡献，是从本质上科学地论述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争论了几十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界定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社会主义处在两种不同的起点上。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提出过“不发达阶段”的观点，但只讲了一次，也没有展开。长期以来，全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就解决了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问题，使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有了正确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块基石。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最根本任务的高度，也没有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阶段已经完成。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首先提出并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关于社会主义改革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会出现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情况，“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改革，“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第一个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以至世界的社会主义进程已经产生并继续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论述，关于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的论述，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述，关于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的论述，关于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述，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关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三步走的论述，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论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培养“四有”新人的论述，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关于制止动乱、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和加强党自身建设的论述，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论述，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论述，都有独创性的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完整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三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以来的 100 多年，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成为社会制度以来的 70 多年，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 40 多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确立并取得初步成功的最近十几年，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归结起来，社会主义要胜利成功，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确立党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

列宁说：“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在举了普列汉诺夫说的一条原则后指出：“他说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千篇一律地不论对 1870 年的俄国，或者任何时候的俄国，以及非洲、美国、中国、印度都笼统运用这一原则，那就十分可笑了。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列宁说得太好了！真是透彻！对于当代中国，不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吗？

毛泽东针对我们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最先觉悟反对本本主义，教育和领导全党，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寻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式和方法，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接着，依据新民主主义

革命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寻找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形式和方法，使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提倡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全党树立了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在相结合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在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列宁、毛泽东完全一致。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1）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他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13）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对此作出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4）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同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历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直接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前进与倒退、顺利与挫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认识中国，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改造中国。这里的关键是相结合。相结合就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结合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善于总结新鲜经验，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5）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也莫不如此。绝不能要求马克思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出现的事情，不能要求他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当代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候没有的，有好多条件，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没有的。现在具备了新条件，我们的认识也应该有新的发展。

当代的条件是什么呢？从国际来说，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国内来说，主要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最重要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上的重大问题，是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东欧演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瞩目的当代课题。回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课题，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对于这个当代课题，邓小平并不是单纯从书本里寻求答案，也不是从外国照搬模式，而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从中国的条件亦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从基本特征看，这一理论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从理论内容看，这一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回答了时代的新主题、共运史的新问题和实践的新课题。

从理论体系看，这一理论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的奠定基础阶段，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的形成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的确立体系阶段，具备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逻辑结构。

从理论风格看，这一理论充满了求实和创新精神，这正是理论探索和理论建设最可宝贵的精神。这一理论朴实、简明、深刻，这正是真理本身所特有的风格。

一部《论语》，集中体现了儒家学说，影响深远。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当代《论语》。当然，任何比喻都不是精确的。精确地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的“中国魂”、“民族魂”。

实践在发展，理论应当也必然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认识是不会穷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间还不长，正如党的十四大指出的，这一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七大提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口号；现在我们应当提出：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这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这是对毛泽东开创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最好的继承和发展。

（1993年8月完稿，11月修订）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注释

（12）（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第63页，第273页，第252页，第63页，第370页，第370页，第118页，第373页，第63页，第191页，第95页。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1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简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何莲女姚康乐

100年前毛泽东诞生的时候，中国人民处于被奴役、欺凌和侮辱的境地。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换了人间”，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奔向小康。这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并且震惊了整个世界的巨变怎么来的？它来自这100年间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它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70多年领导亿万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它来自于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它来自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先后指导和巨大推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认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继承和发展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理解，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新发展、新状况，大大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加强运用它的自觉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从一贯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上体现

通读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全部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始终把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始终把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

邓小平早从自身的经历，认识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引导的正确性。在延安整风时，他在北方局党校开学时所作的整风动员报告，就明确提出我们党及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指出“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几年是很幸福的。”不久，他又在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一次大会上讲，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下，增强党的战斗力量。1945年3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夕，他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还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叙述，这在党内是比较早的。

建国以后，邓小平先后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他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一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论述这样一个命题，也就是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强调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并为这个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明确反对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简单化，

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种错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度被打倒，受到诬在之灾。但他复出以后，完全抛开了个人荣辱恩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和高度实事求是精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公正、科学评价。第一、用毛泽东指出的对待伟大历史人物缺点的态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过：“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正是用这种科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形成的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的功绩大大超过他的错误。他还批评了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另一种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企图在新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第二，分析党所犯错误的责任和毛泽东的缺点错误，他指出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他一个犯错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第三，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决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混淆起来，指出两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四，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不能感情用事。毛泽东犯错误，有国际国内因素，也有认识的局限、经验的不足等问题。所以，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解决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第五，一再反复告诫大家“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荣历史。”邓小平上述重要思想也是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则。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党在实事求是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错误过程中，不仅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而且进一步维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从以上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贯坚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忠诚继承的脉络。并从中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为维护党的光辉历史，坚持和发展了党领导的继往开来整个事业所作出的重大历史功绩。

二、从进行拨乱反正上考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极其严重，我们党面临着十分繁重的拨乱反正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生动记录。

首先，最紧要的是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当时，亟须以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扫除迷雾，指明方向。事实证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难以承担这样沉重的历史任务，在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与继续搞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之

间，选择了后者，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不是一种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一条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是过去那条给中国带来动荡和灾难的错误思想路线的继续。它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化的教条，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谈，使党的指导思想偏离科学轨道。很显然，如果“两个凡是”的方针得以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得不到清算和克服，人民要求安定团结、改善生活、建设国家的愿望势必落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反对“两个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歪曲，指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观点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并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以纲领性的语言，为当时的人们从狂热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从一切靠本本来评判是非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奠定了思想基础。特别是1978年上半年由邓小平倡导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

其次，进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解决了我们长期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问题。本来，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就提出过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幸的是，这个曾被毛泽东当时认同的正确决定，被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所代替，主张发展生产的人，被作为搞“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影响下，人民依然不敢触动这个错误的口号，1978年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还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说明我们党在国内工作重点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首先触动了这个要害问题。在1978年9月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要准备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由此得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这个结论，并以中央集体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和通过。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被停止使用，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再次，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重申我们党和毛泽东历来提倡的“有错必纠”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强调指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都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能拖泥带水。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邓小平还亲自领导教育、科技和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提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还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知识分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要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恢复和发展了党关于教育、科技、文艺和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

从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反映的邓小平引导全党进行的这场拨乱反正，所拨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论、路线、思想、方针、政策之乱，所反的是回归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之正，都清楚地显示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从共有的“活的灵魂”上剖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不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还应该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活的灵魂”上加以剖析。

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的字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同样十分重视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还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还为恢复、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三个方面坚韧不拔的努力。一是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完整、系统、科学的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这样四个基本要点加以连贯起来把握，使之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成为完备的理论形态，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十分强调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发展。三是在具体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求真务实中走自己的路，从具体内容上为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比如，勇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重视实效，“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主张“摸老虎屁股”，一抓到底等。

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经常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3）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在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经验总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不要加以坚持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予以了明确的回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顶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我们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把

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14）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强调必须同妨碍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各种弊病作斗争，必须坚决改革现行制度的弊端，同时，从思想教育、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等方面采取措施克服影响党联系群众的种种思想作风障碍。他还与毛泽东一样，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正确地估价了领袖个人在群众中的作用，他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个人的脑筋就可以会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5）。

被《决议》确立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我国经济建设的立足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当然，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有益的先进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6）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还强调推进对外开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关起门是不行的。”（17）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确实确实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从主要思路和内容上比较

在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中，他曾提出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思想。邓小平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有哪些贡献。……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所以，只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与毛泽东思想相关部分的思路和内容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一，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点的分析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是适应的，但还有许多不完善的方面。应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肯定了上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并把它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引导全党正确作出了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决策。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两者的思路有惊人的相似。一是都强调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强调“如

果不结合，那就不行。”（19）邓小平也强调“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20）二是两者都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历来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则说，不但中央和各级党委，就是每一个具体单位，“也都要实事求是。”（21）三是两者都强调“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厌恶照抄照搬，反对本本主义，并以农村包围城市，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也指出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这种相似性，也是继承性的表现。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作过深刻的探索。在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指出过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对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我国国情进行过分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萌芽。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引全党在《决议》中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第四，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毛泽东认同的党的八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根据这一判断，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实际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以后，毛泽东提出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70年代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着眼点都在发展生产力上。所有这些，都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根本任务内容的根基。

第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提出企业可以搞一点“独立王国”。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赞同开办一些私营企业，认为一定限度的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在国家领导下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在1958年底在1959年初的几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了那种不重视价值规律，不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并强调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是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基石。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阐述的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就是毛泽东在世时领导全党确定的。至于强调对外开放，吸引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早有论述，他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提出要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还强调“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23）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阐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阐述的党的领导核心的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改进执政党的党风；阐述的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依靠人民军队；阐述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我们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的相关内容里直接找到它们各自的源头。

第八，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早在 50 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考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台湾的现行制度可以不改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可以安排蒋介石到中央任人大副委员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中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以此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各重要部分的内容都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内容中找到基因、胚胎、萌芽和源头，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立起来的。

五、从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好的思想观点，而且，对新时期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正面回答，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社会主义所处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区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偶而，也提到“初期阶段”，对我国目前所处阶段特征作过初步分析，但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不仅明确作出了我国处在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而且系统阐明了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基本特征、基本路线、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体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上，毛泽东虽然作出过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没有贯彻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给予了科学回答，并把它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都要一心一意、矢志不移地抓好经济建设，提出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途径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对抛弃苏联模式、改革原有体制有过一些可贵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既没有继续深化，也没有在实践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任务，并把改革提到第二次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并在实践上进行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使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系统化了。

特别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结 1958 年刮“共产风”的教训时曾经予以强调，提出过一些震聋发聩的思想观点，但是总的说来，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传统观念，发展到后来还要对中国很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加以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转变，在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4）

并且由此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在实践上可以充分利用市场和计划两种经济手段，把二者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很显然，这对毛泽东思想是个重大发展。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在他的晚年打开了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通渠，但由于他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原因，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则从时代发展的高度着眼，明确地把对外开放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理论原则和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兴办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区等方面迈出很大的步子。与此相适应，在对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分析以及对外的方针路线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关内容加以比较，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有关内容的发展具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理论的核体由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还是《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都讲它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尽管继续得到发展，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少好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始终没有转过来，反而出现了较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实现了这种转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是理论的内容由一些宝贵零碎的、不完整的思想观点变成为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体系。尽管毛泽东讲过社会主义可分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但只讲了这一次，以后再没有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讲过允许发展一些私营企业，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讲过以后，转瞬即逝，再无说起。而在这些宝贵的，零碎的、不完整的思想观点上建筑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已经是形成了包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理论体系了。三是理论的实行上是将没有做、反对错了、没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改正过来和做好。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当前我们要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一种是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把两者看成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任务渊源关系，甚至把它与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另一种是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承认它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不承认它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不承认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些错误的观点，认真地学习好、领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要用毕生的精力去躬行实践。

“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26）让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为建设好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省委宣传部)

注释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9页，第246—247页，第268页。

(11)(12)(14)(16)(18)(20)(21)(22)(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5页，第262—263页，第36页，第40页，第123页，第133页，第109页，第113页，第242页，第142143页，第372页，第261页，第113页，第133页，第372页，第26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00页。

(15)(24)《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21页，第98页。

(17)《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5页。(1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理论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赵绍敏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历史条件下最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它不仅决定着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前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也是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既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艰苦探索的一项基本实践，又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一项最重要的要求。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 and 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这一理论，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武装全党，这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主题和科学理论体系，我着重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作一个阐述。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

毛泽东和我们党历来重视对时代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时代，是一切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也称为大时代。它包括若干发展阶段，如现时代、当代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既涉及整个历史时代的问题，又涉及当代的问题。

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我们坚定地认为，从 20 世纪初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一伟大时代的起点就是 1917 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代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在 70 多年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由一国变成多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本世纪晚期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历史曲折，也没有改变这一时代的历史走向。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是难以避免的，但它终究改变不了时代的主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依旧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大趋势。

同这一根本特征相联系，我们时代还具有另外三个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历史性竞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时代。

列宁曾经这样指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

这也就是说，全面认识我们时代的特征，才能正确详细地估计和把握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特点及规律，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和历史环境。

在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条件的同时，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对当代条件的研究，因为我们是在当代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建设和实践活动的。在当代，世界的主题已经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从本世纪初到 70 年代，这一阶段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这个时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个风暴时期。进入 70 年代以后，战争与革命的风暴过去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成为了世界性的两大潮流。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随着当代世界主题的转变，世界格局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的特点，一方面，是美苏“两极”对峙的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的格局，即一定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新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还尚未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确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上述条件的变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百年未遇的极好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极严峻的历史性挑战。

80 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使经济迅速发展，1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9%，综合国力水平有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历史的跨度上看，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晚起步二三百多年，加上建设时期中有 20 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耽误了经济发展的时间，进入 80 年代后，又面临世界范围蓬勃发展的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新浪潮的挑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下，世界出现经济日趋国际化和市场经济迅速重新组合的客观趋势。在这一新的情况面前，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沉缅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经济框架，以缓慢的速度发展，要么迅速转变和调整发展道路，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后者。特别是要看到，我们所处西太平洋地区的高速发展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压力。构成该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日本和“四小龙”、东盟国家，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在本世纪 60—7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10.9%，目前在发达国家中仍居前茅。亚洲“四小龙”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新加坡 1965—1980 年为 10%，1981—1990 年为 6.4%；香港 1965—1980 年为 8.6%，1981—1990 年为 7.1%；台湾 1965—1980 年为 9.9%，1981—1990 年为 7.6%；韩国 1965—1980 年为 9.9%，1981—1990 年为 9.3%。东盟国家中的泰国，1989 年达到 12%，1990 年为 10%，1991 年为 8.6%；马来西亚 1989 年为 8.6%，1990 年为 9.8%，1991 年为 8.5%；印度尼西亚 1989 年为 6.5%，1990 年为 7.4%，1991 年为 7%。如果 90 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更快一些，达到 8—9%，我国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被动地位。

综观西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善于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了一条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道路。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子。我国要加快发展，也必须借鉴这些经验。事实证明，

当今的市场早已是国际性市场，市场的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又必须依赖于和将大大推动经济的科技化；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化，又是以法制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现代社会是一种法制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法制。我们只有加速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和法制化的进程，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优势，在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的历史浪潮中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希望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夙愿。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以上述新的时代条件和我国国情为其基本客观依据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剖析，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第二个阶段，是列宁突破了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必然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断，创立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第三个阶段，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使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确立了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不仅第一次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通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条件下获得新的重大发展的两个主要标志，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伟大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伟大革命，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新的丰富的时代内容。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精髓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整个理论的一条红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两块基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这一理论揭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改革开放是这一理论最鲜明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是立国之本；党的基本路线既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既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又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特殊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因此，它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必然对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指导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必将不断推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三、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卓越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创立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把这一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联系起来，是符合这一理论形成过程的事实，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认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坚持这一理论，都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即首先尊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同时承认领袖人物和杰出个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其历史作用体现在我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和他的卓越贡献，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1975年1月至12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全面整顿。全面整顿的基本思想，就是大胆揭露矛盾，通过整顿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全面整顿的实质就是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整顿工交企业的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整顿工作和劳动纪律，整顿铁路系统，恢复科研机构和学校教学秩序，并在整顿中落实政策，纠正一批冤假错案，使整个形势很快好转。

第二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共两年多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刻论述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以此为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充分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讲话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一期间，围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还针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特别要提出的是，他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这对于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共3年零9个月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理论、思想观点，主要是反复阐明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他强调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农村经营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按照“四化”要求选拔中青年干部。他在1979年3月3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他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关于起草《决议》的九次谈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坚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间，他明确指出：“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1979年12月6日，他还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国民收入人均达到一千美金，实现“小康”的主张。在他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第一次明确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郑重结论。

第四阶段：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集中地阐明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及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他就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984年10月，他针对农村改革指出，这“是一场带革命意义的改革”。1984年10月10日，正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前夕，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把

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5年3月28日，他在同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1986年4月9日，他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谈话时再一次强调了 this 命题。他说：“我们把改革当作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984年11月，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通过不久，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实际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85年，在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时，他又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1）从而，把改革、革命、解放生产力联系起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第一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2）此后，他多次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理论。其间，他还进一步构想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完整地表述了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70年间，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的设想。这标志着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成熟。

第五阶段：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共5年时间。这一期间，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回答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他这一期间的思想、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这一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邓小平这一重要谈话和他一系列论著中理论、思想观点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的理论、思想观点，可以说是一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论”。建国、立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完成的宏伟业绩。当建国、立国基本问题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要解决的主要是治国、富国、强国的问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治国之纲。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治国之本、治国之道。推行现代化、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治国之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多样性的统一，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辩证方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治国、富国、强国的科学理论。坚持这一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就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能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注释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12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第351—
—352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84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第113页，
第108页，第274页，第373页。

见1986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据1984年11月21日新华社讯。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渊源、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思考

陈文坚徐文学

党的十四大的基本精神和伟大意义，就在于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这一理论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当前在某些干部和群众中仍然存在一些模糊思想。有一些人囿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怀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怀疑我们搞改革开放是否是搞社会主义；也有人怀疑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是否是社会主义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不得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为了回答这样一些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开始，画出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和发展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独特道路的轨迹，从而以历史和理论的逻辑，既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又阐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开拓、创新的贡献，以廓清某些糊涂认识，纠正某些错误思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设想

马克思一生不懈地追求推翻资本主义、创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曾先后有过两种设想。

（一）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基础，总结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中，创立了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1. 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的；2. 它主要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科学设想的一般原理。正是由于这个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因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需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步骤，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程序来说，这是社会形态一般的正常的发展，而不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某些历史的跨越现象（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或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之为“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在欧洲几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作理论准备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

生。”

（二）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由于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化迅速发展，马克思到晚年也没有看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相反，他看到了东方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开始进入革命高涨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逐渐东移，于是他把期待革命的目光转移到贫困落后而又充满矛盾和危机的东方。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他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而不能看作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他开始提出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为了证实自己这个新的观点，马克思晚年转向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1881年，他在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以后，得出结论：

“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下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

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1882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更明确表示：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过西方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光辉的思想：像俄国这样一些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又强调“跨越”的两个重要条件：

一是在政治上，东方国家首先必须进行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论是什么性质与形式的，必须纳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支持和互相促进。

二是在经济上，东方落后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因此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落后的小农生产变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实现现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存在两种设想：

一种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由于它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所以一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但是，一方面这个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实的；另一方面还由于这个理论“并不是对一个已经历史地存在着的社会形态分析的产物，而是对新社会将由之脱胎的旧社会母体进行解剖的结果。这种理论带有超前性，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科学预见”，其“内容有些属于普遍真理，至今仍然适用；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实践的发展已不适用；有的在当时也并不完全正确。”因此，20世纪产生的生产力普遍落后的社会主义各国，以这个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就不得不产生失败或失误的历史悲剧。

另一种是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由于这种设想是马克思在晚年探索中的思想闪光，还来不及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

邓小平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以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本质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开拓性发展。

二、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和剥削国际化在迅速发展。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开始把经济剥削的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被相当程度地“转移”到殖民地国家和其他落后国家。从而，使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政治和经济迅速陷入危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加速激化，导致了人民革命情绪和革命形势高涨。于是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争夺世界市场、向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转移”危机与矛盾的总斗争的爆发，在它们统治锁链的薄弱环节涌现出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在苏联这个20世纪初期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诚然，在苏联建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性，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曾产生过失误。1918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这在客观上虽是一种战时应急措施，但在主观指导思想上就反映了企图借助国家垄断制（单一的国有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党政、政企不分的政权形式，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强制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虽然列宁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自己批评了这个失误，并告诫全党：“我国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从理论上深刻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影响到在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一再程度不同地重犯类似错误，如斯大林模式，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

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国家

资本主义（或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具体形式有：1.租让制，即由政府通过合同将工厂、矿山、资源等租让给资本家（主要是外国资本家）经营；2.商业式的小业主合作社制；3.商人的代销代购制；4.租赁制，即国家把某些企业、森林、土地在合同的基础上租给国内资本家经营。可惜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的上述设想并未完全实现。传统的看法认为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被迫暂时退却的权宜之计。这是失实之论。事实上，这是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创造性探索，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一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吸取资本主义经济、科技成果，用我们今天的的话来说就是“对外开放”；二是“承认商品市场的必然存在，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以市场关系为桥梁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个探索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却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先河”，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毛泽东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继列宁之后，毛泽东是对落后的东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者。

在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存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信奉马列主义，尊敬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及其所首创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堡垒——苏联。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建设也应“以俄为师”；而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穷二白，对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所以既需要苏联的援助，又需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因此，我国在建国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是深受苏联影响的模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无论在革命或建设中，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图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50年代中期，苏联暴露出一些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由于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体制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摆脱不了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影响，使探索走上了弯路，搞成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没有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光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奠定了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毛泽东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所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中

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进行了“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八大上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通过《论十大关系》等报告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从而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特别是在他晚年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弯路，直至“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等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决策，从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实事求是路线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结晶。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深刻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它赖以创立和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源泉。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会不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第一个把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是毛泽东。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如何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它们的具体环节、具体形式科学地、恰当地区别开来。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花大力气去巩固、发展和完善；同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确实存在着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环节还需采取有力的措施，经常地、自觉地加以调整和改革。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才能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中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虽然还处于提出问题、初步探索的阶段，但它已经是一种萌芽状况的改革思想，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改革大潮的先声；同时，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今天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要两步走的思想，为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7年2月毛泽东就清醒地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他此后还多次指出，三个五年计划只打下一个基础，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大约需要50年到100年。1959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并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根据毛泽东的这种设想，1963年9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的逐步形成铺设了一块稳定而有力的奠基石。（四）毛泽东关于向自然界开战的思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先导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为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此后，毛泽东为实现这种转变作了一系列的努力。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1957年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月，他在天津等地的讲话中又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此时，毛泽东把经济能否搞上去提高到是否可能被开除球籍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五）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倡导一条“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由于党实行了这条群众路线，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条群众路线，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力量源泉，并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党在新时期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从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强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第二，党制定了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第三，在新

的历史时期，党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例如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城市中的厂长承包制、职工全员资产承包制、外向型经济，等等，无一不是首先是群众的创造，再经过党的集中、总结和提高，制定政策，形成理论，予以规范化，然后大力推广，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容。实践证明，生机勃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由亿万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种创造在理论上的升华和系统化。

（六）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根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倡导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当年毛泽东坚持这条原则，用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大把它写进党的基本路线，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不照搬外国模式，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和三资企业，搞特区和开放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提高了生产力。对外开放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这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二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三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四要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种种艰苦的探索，虽然在总体上说是没有成功，但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继承和重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国际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新的理论和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坚持、继承和发展，而是在新时代的新开拓、新突破、新创造，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范畴内增添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新理论。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邓小平坚持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充分认识具体国情，在实践中开辟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苏联模式的统治，从实践上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元化模式。其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当前生产力不发达的具体国情，确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根据我国国情的这个历史定位，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建设跨世纪的战略决策。这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从而突破了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产生极坏影响的“直接过渡”论。其三，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认识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却不能逾越，从而制定了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实现了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的东方社会吸取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又发展了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与市场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传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封闭式的模式。

（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突破性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是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实践中没有搞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生产力。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些崭新的观点不仅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这个理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各国，就是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离开了生产力的水平，片面追求制度的先进性、生产关系的纯一性和体制的高度集中性，结果形成了僵化的模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而且还导致了严重失误，甚至失败。这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鉴于这个教训，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同时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更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一个根本标准。这些观点既是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角度来考虑的，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无限动力；没有从特殊的角度为东方“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来考虑过发展的动力问题。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体制改革，其本身就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但列宁早逝，改革没有完成，更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斯大林基本上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以抽象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生产关系的纯一性为其本质特征的，同时又由于急躁冒进思想作怪，片面地追求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制度的“完善”性和所有制又大又公的纯一性，这样就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距离和矛盾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建设上失误时，又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信条，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错误方针。所以毛泽东最后还是滑向了阶级斗争动力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和毛泽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解决矛盾的着眼点要放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因而他首先确立了生产力标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并以此为导向，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之间还存在一种僵化的体制，正是这种僵化的体制极大地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作出了改革的决策，用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完善并不是抽象的完善，而是以体制为“中介”，通过对僵化的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更适应现实的生产力，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邓小平 1992 年在南巡重要谈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自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的理论，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个思想，开拓性、突破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是对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贡献

马克思在晚年曾经指出落后的东方社会必须置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国家调节下的市场来组织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以上仅是两位革命导师的思想闪光，并未成为实践的现实。自斯大林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各国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起了用国家权力强制积累资金的作用，但以后却越来越显得僵化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建国后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党作出了改革的决策，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究竟要确立什么目标模式，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才明确。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认识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我国历来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十多年来老是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上打转。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用唯物辩证法来剖视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属性但又交织难分的经济现象，从 1979 年开始一再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放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至此才真正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空前的创举，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和路线基础，同时还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误和挫折的低潮中，高高举起了一面不屈斗争的旗帜，一盏走向胜利的明灯。由于 20 世纪先后诞生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不顾自己生产力落后这个国情，教条式地把这个带有超前性和科学设想性的理论当作具体的制度、体制和道路，搬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另一方面又由于深受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通过国家垄断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实行一种教条主义的超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导致了失误，甚至失败。现在，中国的改革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们从教条式的理论、僵化的体制和封闭式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由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今天，它们正在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遭受挫折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上空，开始出现了新的曙光。因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拨乱反正，而且也作为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拨正了航向，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石嘴山市委党校，市委讲师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1 页，第 2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29 页，第 130 页，第 451 页。

邢责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 1067、1068 期。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710 页，第 525 页。

王东：《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张式谷

一、第二次革命具有同第一次革命一样的伟大意义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4 年的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是从一个很高的认识起点上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在中国彻底实现革命的历史使命为己任的党。在我们党 70 多年的历史，已经完成了和正在经历着两次伟大的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35 年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 100 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一个备受欺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是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伟大的革命。

然而，中国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任务还没有结束。1949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始走上了新的伟大革命的征程。这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由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说前一次革命还只是一出长剧的序幕，那末这场新的革命则已经和正在进入长剧的高潮。毛泽东在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时，曾经多次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或者比喻为一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他指出，其第一步或上篇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或下篇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上述当代中国两次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全应该这样说，第一次伟大革命是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必要准备，第二次伟大革命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必然趋势。诚然，这是两个性质和任务不同的革命过程，但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仅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还由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领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具有开拓探索意义的努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后来我们党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

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他又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正是从阐述两次革命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当前这场新的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分析了第二次伟大革命的主要特征。正因为这样，报告一开始便具有根强的理论性、思想性，用一种新的视角考察和总结了 14 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把这些基本经验提到一个很高的认识层次上。这就使报告不仅具有振奋人心的气势，而且具有发人深思的意蕴。

把 14 年的基本经验概括和归结为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何在？我的体会是：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和内容，以便适应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要求，努力摆脱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动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以革命的精神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同时，还在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领会、牢牢掌握在 14 年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继承和发展了在中国第一次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创的宏伟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从而成为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报告把 14 年的实践经验和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同第一次伟大革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高度评价和深刻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来研究和宣传这一理论，无疑是对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具有切实意义的纪念。

二、“改革——第二次革命”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创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进入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宏伟事业，而且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已经并正在引起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所以是一场革命性质的变革，关键在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行的，而不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量的积累和发展，也不只是对原有体制的修补、微调和改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也是改革开放，这就要求我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性质、意义作出新的分析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崭新的命题，就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来的。最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是邓小平。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观点并不是“从一个人的脑筋中”突然“钻出来”的，而是随着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逐步形成的。这一观点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的论断。1978 年 10 月 11 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

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一次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也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可以说，这是对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这一命题和观点的首次明确昭示，问题是当时还没直接涉及改革，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同志的认真领悟和充分重视。

——1982年和1984年关于精简机构和农村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1984年10月6日又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并指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认为革命的对象是阻碍四个现代化的旧的体制，并预言这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将从个别领域向全方位推进。

——1985年和1986年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命题的确立。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前景就困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1986年4月9日，在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时又一次说道，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这件事并不容易，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摸索。在这两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以后，他还其他场合多次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据查至少尚有五次之多，一般他说，革命就是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此，邓小平把当时我们已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称之为“革命”。然而重要的还不仅在于此，而是他把这场革命界定为继我国第一次伟大革命之后的当代第二次革命，从而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我们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新观点。遗憾的是当时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以致未能收入后来编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之中。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谈话一开始就精辟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

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段话，把革命与改革、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连贯起来，赋予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命题以更加严整、更加丰满、更加深刻的内涵，不仅对全篇谈话收到了开宗明义的效果，而且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郑重对待、深入理解和认真掌握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使耳目为之一新，思想获得很大的解放，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三、“革命”的传统含义和新的时代内容

有的同志在论证“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说：“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从狭义讲的革命，一般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由此实现社会飞跃性发展。这种革命，是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斗争形式实现的。另一种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重大社会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无论哪种含义的革命，都具有引起深刻社会变化的特征。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广义上的革命。”这种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把我们所进行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同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冲突而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的那种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严格地区分开了；但是，它把改革这一场“新的革命”特别是把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学革命、语言革命等等”相提并论，而又归结为“广义上的革命”，以致语义含混，使人还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深刻的思想。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事业，“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是“又一次伟大革命。”（着重号系笔者所加）显然，这是同我们党领导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革命相比较而说的。因此，我认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仍然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即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过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的特殊的社会革命。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革命论同邓小平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一番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革命的论述，大致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1）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新的生产力和腐朽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即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革命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社会

生产力；(3) 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一切没有触动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都不能算是社会革命；(4) 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在阶级社会，改革社会基本制度的斗争，必然要集中地表现为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政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等。

这些基本观点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千百年来社会变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真理性是无庸置疑、颠扑不破的。然而，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上述论点看作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公式。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不断变化的生动的社会运动，结合新的实际使原有的理论得以发展。可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因循守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及教条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改革也是一场新的革命，一直缺乏充分认识。这主要表现在：

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既然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而也就不再存在束缚生产力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既然是解放生产力，那末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就等于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只能是“改良”，而不能提“革命”，也就是说只能在原有体制框架内进行调整、修补、兴利除弊，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体制，建立新的体制；认为革命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质变，而不是量变或局部的变化，改革既然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和运作机制的转换，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质变性质的革命，至多不过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和艰巨性而借用“革命”一词；认为社会革命的基本涵义只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激烈冲突和拼死斗争，因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矛盾。

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这一新理论的精辟阐述，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上述传统观念，使我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内容、性质、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和升华。

第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诚然使生产力摆脱了腐朽社会制度的桎梏而获得大解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提供了飞跃进步的可能性。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长期存在；束缚生产力的手脚，特别是束缚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尽管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相比，对生产力束缚的情形已经迥然不同，我们不可将二者同日而语。但继续打破这种束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仍然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仍然是最活跃的因素，它仍然要求摆脱各种束缚和克服各种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束缚和障碍正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对于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不可能很快认识清楚并加以解决。只有随着矛盾的发展，才会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其弊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提上日程。过去那种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承认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模式，是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因。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立志改革，并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主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多次提出和倡导过改革，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前导和发端。但是，过去所说的“改革”，往往是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而言的，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和目标模式内一定程度的调整、修补或变动，目的是进一步维护和改善这种体制模式。这种“改革”尽管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确切地说它还仅仅是一种改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第一次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新的革命”的含义。他的改革观的创造性内容和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变革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这样深刻而广泛的改革，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精神面貌、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重大转变。所以，从这场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足以同我国第一次革命相比拟，而不应同上述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性变动等量齐观。

第三，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不是指作为其实现形式和运行手段的体制与机制。社会基本制度，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要和支配地位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它规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构成一定社会之基质；体制，则是指表现一定社会基本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工作制度、管理制度；机制，泛指各项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程序、环节的总和。社会基本制度具有质的稳定性，除非该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否则，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是不会转变的。同时又要看到，社会基本制度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即属于抽象层次的东西，它的本性和作用只有通过相应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能表现和发挥出来。同基本制度相比照，体制和机制既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经建立，其优越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忽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合理的、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可以使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不合理的、不符合于基本制度本性的体制、机制则妨碍着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但是，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完善”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是那些存在着缺陷和弊端而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有体制；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则不是“完善”的问题，而是改革、更新亦即革命的问题。对于这种体制而不是对于基本制度而言，“更新”和“革命”一样，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使用的。

第四，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那末这是不是社会的质变呢？我们的回答是：首先，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把这种改革仅仅看成是“量变”，或者把量变与质变截然分开，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就是经济体制上的一次革命，是

70 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传统经济体制的革命。可以断言，经过这一场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其次，认为改革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的观点，没有注意到质变的不同层次、不同范围。我们的改革，诚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变革，却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这是社会主义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通过旧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才能真正实现。

第五，邓小平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提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时，又斩钉截铁地指明，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即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种“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据 1984 年 10 月 10 日新华社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党的十四大报告对此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和表述：“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从两个方面划清了界限，排除了可能产生的两种混淆：一是这场新的革命，决不是要否定过去革命的成功和建设的成就，决不是要削弱、摆脱或取消我们党的领导，因此，也决不是要通过过去那种急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实现；二是经过这场新的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动摇或否定社会主义，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向资本主义蜕变。如果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那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而是社会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正是防止和抵御这些情况发生的最有力的措施。四、当代中国

第二次革命的新特点

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最鲜明的特色和重要的推动力是改革开放；这场革命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这样的革命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它所采取的方法上，都同过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根本不同，它是我们党领导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全靠自己去摸索”的全新事业。毛泽东和我们党经过二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刻地认识和熟练地掌握了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彻底胜利。历史经验说明，为了正确地领导和进行当前我国这场新的革命，就需要认真研究，努力掌握它的新特点。事物的特点是该事物内在规律性的外在表现。不了解我们正在进行这场革命的特点，便无从掌握它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获得主动权。

作为一次新的革命的改革，都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通常的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革命，总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和摧毁原有的社会的基本制度。而我们的改革则不但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性质，而且是要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

第二，一般他说，通常的革命往往充满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急剧的社会震荡，往往是爆发性的，突变式的，表现为原有社会渐进过程的中断，由量变

到质变的转化，社会历史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飞跃。而我们的改革，尽管也要引起社会面貌广泛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非爆发性的、非突变式的，总体上表现为逐步前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也不允许出现剧烈的社会震荡。相反地，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须要坚决排除一切导致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如果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

第三，通常的革命，往往是原有制度之内的对抗性力量自下而上的冲击。我们的改革，则是现有制度中的中坚政治力量领导和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同时也要依靠作为这种制度社会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创造，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换句话说，它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领导力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发展。

第四，通常的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因此，一般地说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先破后立。我们的改革所以称之为革命，也包含破旧立新的内容和意义。然而，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则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应该是边立边破，立破交错，立破结合，如果不能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五，我们的改革势必触及人们的利益和权力，势必要对利益、权力的关系和结构进行调整，因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估计和慎重的处置。但是，它毕竟与通常的革命直接指向某一或某些阶级或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情形。所以邓小平说：“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以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和提高对改革的认识，提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觉性；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这场改革的特点及其规律，以便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轨道更加健康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26页，第142、143页，第351、352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见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 见《新华日报》1986年第4号，第17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

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蔡金发

对一个世纪性的伟大领袖的最好纪念，是把他的未竟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其次，在于他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打开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虽然，毛泽东的探索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却为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许多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清理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中，纠正错误，继承正确和开拓创造，终于完成了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它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提出的新阶段的历史任务，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代替旧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新一轮世界社会主义的周期运动，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新纪元。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出色地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回顾和考察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殊矛盾性，有其不同的历史任务。在这里，我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为实现其阶段性的任务，大体上花去了40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运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欧洲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上升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19世纪人类业已创造出来的优秀思想成果，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实践的经验，为无产阶级制定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理论和革命策略，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最纯粹的一般理论设定，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

第二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1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到社会制度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世界矛盾的焦点和革命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世界历史跨进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

国家里受到严峻的挑战，却在东方落后国家开辟了新的道路，并在俄国首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这一阶段里，列宁高举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仅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的理论形态——列宁主义，而且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发展为一国首先胜利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即“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第三阶段从本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是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世界资本主义诸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并在欧亚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列宁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作出了至今仍有直接实践意义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贡献。但是由于列宁身后的苏联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体制，在列宁早先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并把它绝对化、神圣化，把苏联的一国模式发展为多国的普遍模式，造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领导、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高度僵化的局面。

第四阶段从50年代后期到现在，是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到多样化发展的阶段。它的核心和实质，是要探索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建设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种社会制度在相互对峙和相互竞争的复杂关系中都着力于内部的调整与革新的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借助当代科技革命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了相对繁荣稳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优势。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在探索革新的道路上，则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各国都在探索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但这种探索在许多国家里不但没有获得成功，而且到头来还断送了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经过两代人的多方面的探索，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到多样化发展的历史任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最积极、最辉煌的思想成果。它宣告了国家集团性的单一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为社会主义向着民族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中国有句老话：“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是同一种桔子树种在不同的地方，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社会主义也是这样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必然会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特点。虽然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但它必须植根于各个国家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传统的土壤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是很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即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必然要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多样化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必经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以新的理论形态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仅表现在它成功地解决了新阶段提出的历史任务，而且还表现在它以新的理论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首先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四大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特别是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令人深思。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里取得胜利。这是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说，世界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 1918 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两半：一半是德国具备着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一半是俄国具备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20 世纪实践的社会主义未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思想轨迹发展，像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马上就提出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的新问题，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首先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观念，承认“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他曾经设想，“以市场、商业为基础”，通过发展“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列宁的探索在苏联的往后发展中被打断了，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了。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探索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进行了历史性的拨乱反正，终于找到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连续不断的探索，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到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到形成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的理论勇气。党的十二大提出 12 个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定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党的十四大在十三大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五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科学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9 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次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的

最新的理论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意义。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新的理论形态，还在于它用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四大阐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9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有些是前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提出的、或没有完全解决的观点。如：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的模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革命统一战线；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而大部分则是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未曾遇到和未曾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主体、两种补充：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三项基本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四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三步走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先富后富的辩证法；一个领导核心三种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依靠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等等。所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连同上面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新的理论形态。

再次，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新的理论支柱，只有这样，才能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支柱？这个理论支柱又是什么呢？我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台柱，三大理论基础。正是这三大理论柱石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还处在初始阶段）的理论，提出和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使得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落后国家，都不能搞纯粹的社会主义，不能搞马克思原先所设定的那种完全的属于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从而纠正了过去那种远离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脱离人民群众觉悟的程度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关心，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做法，把社会主义再一次置于现实的科学基础之上，使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现实主义的理论光芒。

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新的重大发展。这两大理论的确立，进一步揭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不同于

传统观念的和以往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理论基点：一是“两制分开”，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是应该也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二是“两权分离”，即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应该也是可以适当分离的。理论上的这种剥离，不仅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奠定了深厚而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深化改革的实践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根据“两制分开”的原则，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能改变的，而社会主义体制则需要根本改变。这样，它就顺理成章地回答了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诸多问题。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原理，在这里也就豁然开朗了。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者占有生产资料，体现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性质；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由企业去组织生产和经营，实行政企分开，赋予企业以独立的自主权，并承当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障碍，而且也是适应现代的社会化生产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有如《资本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对于列宁主义。没有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内容的社会政治理论形态，是不完全的、缺乏生命力的理论形态，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是不能视之为相对独立的新的理论形态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新阶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形成奠放了最后一块基石，而且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重要内容。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自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断言，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试验已经宣告失败，21 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消灭的世纪。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们，也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是“空想”，想用“空想”这个非同小可的字眼来铲除前此以往的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得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前苏联一些地区和东欧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在于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这种情况有如马克思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时所说的，“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又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真正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

我们可以这样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三十年的分裂，改造社会主义的真正运动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不论是以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兴起，还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列宁、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走到了尽头。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宣告了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运动形式的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历史现象曾经迷惑了不少人，至今仍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对此，邓小平曾经适时地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其实，在苏联东欧陷于毁灭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而是过时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里用得着马克

恩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讲过的一句话，“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原则是永存的，运动形式则是多样的。本世纪的最后10年，是社会主义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自我更新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且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能够作为新时代和新纪元标志的东西，不仅仅是一种新理论，而主要地是一种新的实践，严格地说，划时代意义的东西不是完成于纯粹的抽象的理论之中，而是完成于实实在在的实践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价值。伟大的理论，产生于伟大的实践，又指导着伟大的实践。党的十四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4年改革实践，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正是这一伟大实践，使得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使得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世界风云剧变的严峻考验，显示出自我更新的强大生命力。总之，正是这一伟大的实践，给了社会主义以新的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把科学社会主义推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巨大的物质世界，这是没有疑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还将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往后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这也是没有疑义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起点的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特征的烙印。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尚占据着世界历史的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自主和自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不能不改变传统的历史面貌。列宁曾经做过这种尝试，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西方一些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以前，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其经济关系或经济体制的类型，只能实行上面集中、下面自由贸易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的这一思想由于当时的条件不够成熟、又由于列宁只有短暂的实践而未能实现。长期以来这一思想一直被人们置于遗忘的角落里，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又一次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的新一代的社会主义，比较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有着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它已经不再是向着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向发展的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而是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在这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纯政治上抽象对立的两极，而是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关系。社会主义不再以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来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帮手，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绝不再是简单地排斥和否定资本主义，而是要同资本主义结伴同行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此，现代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带着有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第二，它已经不再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企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将不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生产和分配，而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生产和分配。企业将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这种社会主义是企业市场社会主义，它不仅主要地要通过企业的市场竞争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而且还要借助和依靠市场来同资本主义发生经济联系，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它已经不再是传统观念的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事实上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社会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实际历史进程，还没有能够提供足以马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物质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而阶级的消灭则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所以，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应该把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放在首位，而应该把创造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物质基础摆在首位。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能不在原有存在的阶级差别的基础上适度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要有资本主义因素、成分的存在，就必然会有剥削现象，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有某种扩大和发展的趋势。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四，它已经不再是封闭的、僵化的狭隘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而是开放的、高度灵活的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主义不再是作茧自缚、闭关锁国，脱离世界市场，远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竞争，把社会主义经济推向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吸取养料、经受考验，以求发展壮大。因此，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将越来越受世界市场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受国际社会生产状况的制约，从而也就将越来越变成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了。也就是说，一国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不仅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而且还有待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所以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直接地同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它既不能超越自身的发展阶段，也不能超越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毫无疑问，建设这种开放的社会主义要比以往那种封闭的社会主义更长期、更艰巨、更复杂、更伟大。同时，也更具风险，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闯出了一条新路，树立一个榜样。事实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还不甚理解，还不能跳出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但在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兴，并不是没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

况正如党的十四大所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注释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1页，第50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3页，第367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8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4页。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0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6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5页。

